

求真雜誌

第一卷 第六期

要目

時華萊士『和平』演詞之分析……………海明	內戰之透視及其出路……………海明	論收回香港九龍問題……………康君	論官僚資本……………陳人白	官僚制度下之教育……………陳覺玄	美國操縱世界的命運……………劉少嚴	答張大軍先生論維新運動……………唐虞世	秦漢大一統與先秦諸子的結局……………嵇文甫	評嵇文甫先生的道家與小農……………李季	再答李季先生論老孔思想……………歐伯	李季的邏輯與態度……………蔡尙思	論古典主義戲劇……………冰夷編譯
----------------------	------------------	------------------	---------------	------------------	-------------------	---------------------	-----------------------	---------------------	--------------------	------------------	------------------

求真雜誌出版社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十月一日

文 誼 金 筆

久寫不壞



永遠保用

上海文誼金筆廠出品

廠址泰康路四八十一號 電話六八〇〇一

Established in 1917

報 論 評 氏 勒 密

THE CHINA WEEKLY REVIEW

has earned a recognized reputation for its progressive and impartial views, unexpurgated news reports, and fair, unbiassed reviews. Stay up to date by regularly reading China's oldest and most popular English-language weekly, Enter your subscription today.

The China Weekly Review,
160 Chung Cheng Road (E),
Shanghai.

Please enter my subscription for a period of 3/6 months, for which I enclose \$

Name:

Address:

(Street)

(City)

Rates:—Shanghai & Outports, 3 mos., \$6000; 6 mos. \$11,000.

Outports (airmail):—3 mos., \$8000; 6 mos. \$15,000.

求 真 雜 誌

第一卷第六期目錄

時事評論

華萊士『和平』演詞之分析……………海明(二)

從軍事政治和經濟觀察內戰及其出路……………海明(四)

論收回香港九龍問題……………康君(七)

論官僚資本……………陳人白(一〇)

官僚制度下的教育……………陳覺玄(一五)

美國操縱世界的命運……………劉少嚴(二〇)

第二次大戰與美國獨占資本之生長……………帕萊斯(二六)

印度尼西亞民族解放運動史的研究……………李雲編譯(三一)

第一次世界大戰與社會民主黨……………盧森堡著 子規譯(三六)

秦漢大一統與先秦諸子的結局……………嵇文甫(四〇)

答張大軍先生論維新運動……………唐虞世(四四)

再答李季先生論老孔思想【續完】……………歐伯(四七)

▲思想與實際▼

評嵇文甫先生的道家與小農……………李季(五五)

李季的邏輯與態度……………蔡尚思(六六)

論古典主義戲劇【下】……………冰夷編譯(七一)

近十年來科學新發展概觀……………李毓鏞(七七)

時事評論

華萊士『和平』演辭之分析

最近美國走向戰爭的趨勢，已成了國際上公認的事實。如杜魯門在國內所頒布的種種普魯士式軍國主義的措施、軍需生產之重新活躍、北極之軍事演習和佈置、地中海東部的艦隊示威、中國內戰之干涉、以及美國某將官之公然宣布『日本人將穿上美國軍服』等，這一連串的事件，再加上貝爾納斯對蘇的強硬外交攻勢，使那些最頑固的和平幻想家也不得不表示失望。但美國人民剛剛才從那次噩夢似的『民主反法西斯』的戰爭中驚醒，剛剛還聽過那些『民主』領袖們發誓：這次戰爭是最後的戰爭！他們難道願意立即又重走一遍毀滅的道路嗎？這一次漂亮的大屠殺帶給他們的是通貨膨脹、物價高漲、沒有家屋、沒有職業，最後還有全部民主權利的逐漸取消與新的更可怕的戰爭威脅。這種慘痛的教訓太新鮮了，美國那些日益趨向革命鬥爭的工人、喪失市場的農民與受了獨占資本和通貨膨脹壓毀的中間階級，是絕不願意重新走入戰場的，他們生出了一種強烈的和平願望。九月十二日，美國商務部長華萊士發表的『和平』演說，就是在這種願望的壓迫之下促成的。

華萊士演辭一開始告訴我們：『各地普通人民從未有如今日之切望和平，他們也從未有如今日之畏懼戰爭。』這確是一種真實的描寫，與我們上面的分析也完全符合。據報載，華萊士的演辭還受了美國最強大的工會組織之一——工業組織委員會(C. I. O.)支持，這與我們剛才指出的事實也相印證。但華萊士反映美國民衆的和平願望是一回事；他能否真正實現這一願望又是一回事。許多人，甚至一般號稱『進步』的輿論界，往往有意或無意的把這兩件事混做一起，因而生出不少自欺欺人的幻想。他們總是把華萊士視為羅斯福時代『碩果僅存』的『進步』人物，視他為挽回新戰爭的新舵手，現在我們就把華萊士的演辭(包括他後來發表的函件)和牠的作用仔細研究一下。

首先，華萊士指出他之不同意新的戰爭是因為他擔心：「如果再來一次戰爭的話，美國所受的損害將數倍於上次大戰。」（演辭）原子彈也並不是絕對的保障，因為「如他國亦有原子彈，也能摧毀我們的主要城市及重工業。」（致杜魯門函）軍部有一派人認為「在蘇聯擁有原子彈之前，以先下手為強，向蘇聯進攻。」但「吾人若果企圖毀滅蘇聯之一切重要城市及其重工業，或許可能做到，但此種襲擊之結果，將引起紅軍之迅速佔領整個歐洲大陸。」假如若干交戰國家都擁有原子彈，則將軍們也承認：「結果將造成足以毀滅近代文明之戰爭，屆時無一國家或國家集團能在此次戰爭中獲勝。」（函件）

這裏表明華萊士所擔心的是：進攻蘇聯無論選擇什麼時機都是一種絕望的冒險：即使能夠摧毀這個國家，但美國也不能從這次自殺戰爭中取得勝利。他隱約地指出：「這個世界將埋葬在革命的火海中。」假如第一次大戰之後，由於同一的畏懼心，使全世界的資本主猶豫了二十一年才敢發動這次新的大戰，那末，這一次他們應該更有理由慎重將事了！

但怎樣避免這個迫在目前的大災劫呢？華萊士立即提出他的辦法來：

「今日我們需要的真正和約是美、蘇兩國間的和約。在我們這方面，我們應承認我們不應更事間問東歐的政治事務，一如蘇聯的不再間問拉丁美洲、西歐和美國政治事務然。」彼此在政治上劃分一個勢力範圍，互不干涉。但是，這並不是毫無代價的，在經濟上，「我們不能允許東歐門戶關閉，也不能允許中國貿易關閉。」蘇聯統治世界的三分之一，美國統治三分之二，「但是在互相同意之下，他們的競爭應置於友好原則的基礎之上。在友好和平的競爭之下，俄國的世界與美國的世界將逐漸變為相似，俄方被迫給予更多的個人自由，而我們也更為注意社會——經濟正義問題。」（演辭）

這就是華萊士的全部和平外交方案！美國可以不經過戰爭，對蘇聯在政治上作暫時的讓步和容忍，在經濟上要求她打開門戶，應允資本主義商品的鑿子插入蘇維埃的國有經濟。假以時日，則蘇聯就會逐漸與美國變為「相似的」世界，對「個人自由」作更大的退讓。換句坦白的話來說，蘇聯就會和平地與資本主義同化。原來華萊士的廉價的「和平」就在這裏！但問題不在於美帝國主義贊成不贊成華萊士這條犧牲最小的捷徑；問題是在於蘇聯當局願

意不願意、有沒有勇氣接受這種『和平合作』的代價——『門戶開放』！蘇聯當局對華萊士演辭不作任何具體表示*，完全說明這個真理：華萊士『外交路線』的失敗與其說在華盛頓，還不如說是在莫斯科！

事實上，在戰爭結束之初，貝爾納斯，這位被和平幻想家視為魔鬼的『叛徒』，也是羅斯福的崇信者，甚至現在也是如此。但外交衝突的邏輯，過於狹隘和破爛的世界市場與蘇聯之不可忍受的緊張關係，一步一步把這位外交家推到『強硬』和『戰爭』的結論。美國獨占家們及將軍們之明白承認這個結論，並認為把牠實現得愈快愈好，也並不是偶然的。這與其說出於他們的主觀願望，還不如說是出於一個絕望的現實的推動。杜魯門之最初贊成華萊士的見解，隨後立即又放棄了牠，並不惜把華萊士的『高官厚祿』犧牲掉，是一個最好的證明：美帝國主義是不能經過『和平』的捷徑來實現牠的絕望的企圖的！華萊士的演辭充其量只不過盡了一種勸告蘇聯的作用而已。

華萊士演講還有一個附帶的、但不可忽略的動機，就是企圖在十一月選舉之前，利用美國民衆的和平願望來達到當選的目的。假如他真的達到這個目的，則這位『進步派』也只能重複羅斯福、貝爾納斯或杜魯門的過程，從廉價的『和平』濫調開始，一直走向戰爭。除此以外，這個無可挽救的舊制度還能夠造出什麼奇蹟來呢？美國的出路不是在貝爾納斯與華萊士之間；而是在這兩個政客所代表的同一帝國主義利益與美國工農利益之間來選擇。只有美國工農推翻資本帝國主義的統治，取得社會主義的勝利才能最後消滅戰爭的根源，給全世界帶來真正的和平與繁榮！除此以外，我們找不出第二個結論。正如除了戰爭以外，美國獨占家們找不出第二個結論一樣。（海明）

* 本文付排之後，史太林的談話方發表於報端，但此種談話與蘇聯當局一貫之希望並無新的出入，而且還僅限於態度之表明，尚無具體步驟提出。事實上，和平之建立並不取決於華萊士、艾登、或史太林之願望，而取決於蘇聯是否能遷就美國的『貿易自由』政策。即使在下一階段，蘇聯對美國作更大的外交讓步，這個政策不實現一天，美蘇之間的緊張關係仍是難於緩和的。除非蘇聯肯取消牠的對外貿易獨占權，將蘇聯的市場打開，但這不啻表示蘇聯社會主義傾覆了。

從軍事政治和經濟觀察內戰及其出路

假如我們把抗戰結束後至今年初的兩次談判——蔣、毛協商與政治協商——視為政府爭取戰略時間，進行華北與東北軍事佈置的政治手段，則長春之戰，東北鐵路綫的打通，就是政府軍事當局實在華北佔取戰略主動地位的開始，這次東北之戰無疑具有決定的重要性，牠是後來國共軍事力量關係的轉捩點。今年六月初的停戰和新談判，

我們已預言：這種談判無非又是一種戰略上的休戰而已。談判一開始，從政府方面的強硬態度看來，我們立即指出：『一個規模更大的內戰似乎已迫在眼前了，不管人們主觀願望贊成與否。』（參閱本誌第三期『時評』：『怎樣消除內戰』。）不久，一個全面性的內戰果然愈來愈明顯地展開了。這個內戰與先前東北的決戰是有密切關連的。

截至今天止，政府的戰略企圖已非常明顯：佔據點、線，將共軍截成幾個孤立圈，然後運用過去『江西剿共』的經驗，採取穩紮穩打、長期封鎖、各個擊破的辦法。政府軍於六月間首先將中共的『中原區』消滅，將李先念部的『逐至襄河以西』，解除後方的第一個威脅，然後進而解決蘇北，打通膠濟路，進攻冀東，直迫中條山，奪取承德。蘇北之戰與膠濟沿線戰事相呼應，目的在打通津浦路；中條山之戰在打通同蒲路，承德佔領的目的則在打通平綏路。但蘇北戰事引起了魯南共軍的南下突擊、及冀南共軍進攻隴海路，結果引起魯南的戰役、及隴海路東段的爭奪戰；晉南之戰又引起八路军占領介休至臨汾間的四個小縣份；熱河之戰，引起晉北共軍威脅大同，並迫使政府軍向冀東共軍進攻，企圖解除後方的牽制。這是七、八、九三個月來內戰的軍事發展。不可否認，甚至中共發言人也不否認，政府軍已差不多達到牠的戰略目的了。蘇北戰事，自淮陰、淮安攻陷後，已告一段落；膠濟路已快打通；魯南共軍已因台兒莊之失陷受到嚴重的打擊；承德已被順利地佔取，大同之圍已解，冀東共軍也被逐出城市。現在進一步就是繼續完成原有的計劃：進攻張家口，打通平綏路、津浦路，然後乘着戰勝之餘威向哈爾濱進迫。關於這兩個重要據點的命運，甚至連中共的發言人也表示不敢樂觀了。

據周恩來九月三日的談話：『政府意欲佔領中共五個主要區域，然後停止戰爭或繼續再打。』（九月五日大公報）二十三日，中共發言人王炳南宣稱：『中共軍隊將在全國採取大規模游擊戰術，除哈爾濱及張家口兩地外，中共將放棄一切據點。』（九月廿四日大公報）又據十九日周恩來在滬談話：『即使中共失去張家口、哈爾濱、淮陰及其他鐵路線主要城市，共產黨亦決不向國民黨屈服。』（二十日大公報）這些談話證明：中共已不諱言失去所有點、線戰略地位之趨勢，而且無形中已承認戰敗了。

據中共的解釋，此次政府之所以能進行如此大規模的內戰并取得優勢，完全是美國援助的結果，周恩來於九月廿二日向記者列舉美國對中國政府之重大援助如下：『（一）本年度六千六百萬美元之貸款，（二）勝利以來九億

美元軍備租借物資之讓渡，(三)八億二千五百萬美元太平洋剩餘軍用品之轉讓，(四)政府軍後方基地及鐵路線利用美國武裝衛兵保護，因而阻止中共軍反攻軍路陣地，(五)利用美國海軍保衛青島，(六)美國在華全部空軍基地之轉讓，外加海軍船隻二七一艘。』(廿三日大公報)

本來美國自始即支持中國內戰，此事是無可掩飾的。而中國政府之與美國完全結合，并不惜犧牲一切以達到『統一』的目的也是有目共觀的事情。但此次政府軍之勝利是否純出於美國援助，而交戰雙方本身却不負任何責任呢？我們試將這個問題平心靜氣的研究一下，希望得出個合理的結論和教訓。

軍事力量并不是一種獨立的因素，牠是反映某一特定的政治和經濟利益的。中國政府的軍事機構是建築在城市的勢力之上，而現在中國城市就是中國資本主義經濟的堡壘，中國資產階級把守着這些堡壘，經過千百條海上和陸地的孔道與帝國主義和鄉村的地主經濟連結在一起，所以中國統治者的軍事戰略基礎，必須建立於點、線之上；而維持點線的軍隊必須是近代化的、適宜於陣地戰的軍隊。此種軍隊的裝備，最近因為得到美國的幫助，已達到中國歷史上最高的發展，這是牠的優點。但由於中國經濟之落後，農業人口與文盲佔總人口的一個絕對大多數，以及此種落後經濟所反映的統治者的無能、腐敗、與極端官僚主義化，中國政府的軍事機構(中國官僚政制之一部分)自然也就成了文盲的士兵和官僚化的上層指揮官的結合品，這是牠的弱點。這種弱點，大大地削弱了中國軍隊近代化和機械化的效能，這就是中國軍隊在抗戰時期，雖然得到了美國式的裝備，但始終無法抵抗外國軍隊的原因。但這種軍隊却與滿清末期的新軍一樣，雖然無力對外作戰，却有足夠的力量對付國內一種孤立和散漫的農民武裝，特別是當地取得帝國主義援助的時候，如李鴻章洋鎗隊之對付太平天國，以及過去中國政府之對付江西農民暴動，便是一個雄辯的歷史證據。

中共的武裝力量則與國民黨軍隊相反，牠一貫是建立在農村經濟和農民之基礎上的，而農民隊伍的最大優點就在於利用散漫的農村地形進行游擊戰。這種戰術是農村經濟及農民本身的散漫性的反映。但近代歷史證明：鄉村既然已隸屬於城市，則游擊戰在戰略上也只能成爲陣地戰的輔助，沒有任何決定和主動的意義。牠是建立於落後的基礎之上的。過去十年的江西農民暴動，證明缺乏外援，牠終究屈服於嚴峻的封鎖，與殘酷的陣地戰術——『碉堡政

策」之下，這就是農村屈服於城市的最有教訓意義的例子。最近中共軍事的新的失敗，只不過重複過去的例子而已。但這是不是說，農民的武裝將絕不能對抗一種優越的城市資產階級軍隊呢？這等於說，落後的中國軍隊無法抵抗優越的帝國主義軍隊一樣，是機械的宿命主義觀點。不是的，農民的武裝是能夠抵禦城市資產階級的進攻的，不過牠必須實現一個前提條件：從孤立和散漫的環境中超渡出來，那就是說，牠必須從城市中，從資產階級軍隊本身中尋求援助和盟友——工人、士兵和城市貧民，只有他們伸出手來，說出話來，組織起來，才能解救農民的孤立地位——但這也就是說：要有一個能夠將農民的利益與城市民衆的利益連結起來的徹底的民主政綱！軍事是政治的延長，正因為中共沒有一個徹底的民主政綱、和認真推動具有實際內容的民主運動，才造成當前的軍事失敗！

這是一個慘痛的新鮮教訓！據官方發表的消息看來，雙方士兵和民衆死亡的數字已實在駭人聽聞！物質的損失尚難統計。假如這次內戰能夠替人民打開一個出路、一個自由解放的遠景，則無論怎樣大的犧牲還是值得的。但不幸，我們不但看不出這個前途，甚至覺得牠愈離愈遠了。假如政府當局竟順利地利用了中共的弱點，靠軍事取得勝利，則中國的政治局面愈益黑暗，人民所受的那種官僚統治愈加跋扈，而中共的農民隊伍失敗將給中國民衆（特別是農民）一種精神上和物質上的很大打擊，這是無可否認的。爲了澈底挽回這個悲慘的局面，爲了使中國人民得到翻身的機會，我們認爲現在能解決中國當前危機的唯一辦法，不是過去那種無生氣的妥協談判，更不能寄托絲毫幻想於美國中間人的『公正』，和中國統治者的慈悲，而是立即召集普選全權的國民會議，讓人民自己來決定中國的命運！未來的國民會議一定要認真解決農民的土地問題，爭回關稅自主權，改善城市工人和貧民的生活以及實行八小時工作制，否則即使召集一個『國民大會』也不過是一個空頭的御用會議而已，於中國大局必將毫無裨益！（海明）

論收回香港九龍問題

九月十四日，香港政府發言人發表談話，否認九龍城仍爲中國領土，及中國目前在該地行使治權。這談話發表後，立即引起中國人民的注意，全國各報的抨擊，甚至引起上海市參議會決議要求當局收回香港、九龍、澳門及其他因不平等條約而喪失的國土。而我國外交部兩廣特派員也跟着聲明：『中國政府將不放棄條約權益，九龍城

設治正在進行。』我們現在不管雙方的交涉有無結果，但這問題與中國的主權獨立、領土完整有很大的關係，是必須密切注視其發展，并爭取合理的解決的。

英國政府根據中國第一個不平等條約——南京條約，在一八四二年割佔了香港；嗣後認為香港太小，又藉英、法聯軍攻陷北京而要求清廷租借九龍。九龍城這塊小地方則在當時（一八九八年）的條約中另由專項聲明：『所有九龍城內駐紮之中國官吏，仍可在城內各司其事。』這證明該城即使在滿清被迫簽訂的不平等條約中，還是中國的領土而非租借地，是與周圍的九龍租借地劃分清楚的。英國如果用『妨碍保衛香港之武備』為口實而可以佔領牠，自然也可以用同樣的口實而佔領九龍以外的非租借地。她雖然有這種佔領的自由，但可否認這不是帝國主義的侵略行徑，却是不可能的。尤其是經過這次大戰之後，她已經承認戰時駢肩作戰的盟友——中國已不再是受人宰割的半殖民地，外國特權和不平等條約應該撤銷了；她已經和美國一起簽字在大西洋憲章之上，承認世界各國都應該自由、平等和獨立了；她已經給人們渲染成了『民主的』國家，因而對最近華萊士指出她底帝國主義政策的演詞起了強烈的反感。但事實上却不幸得很，她爲了維持印度尼西亞被統治被奴役的殖民地狀態，竟不惜派飛機軍艦去幫助荷蘭壓平印尼的民族解放運動。而對今天的盟邦——中國，雖然過去列強所得的特權和許多不平等條約都已聲明放棄了，但她還死死把持着香港、九龍，不肯放手；現在，還要進一步用那些最不名譽的不平等條約來勉強辯護，企圖把九龍城這塊彈丸之地也併吞掉！這種厚顏可恥的行徑太明目張胆了，和她的『民主諾言』太相矛盾了，以致本來聲明『決不藉投降的機會，忽視國際合作和盟邦主權』的我國當局，現在也不能不有所表示。

但我國政府直到今天還沒有完全取消過去滿清皇朝所被迫簽訂的不平等條約，直到今天還只是『依照一八九八年北京條約』去進行交涉，其實過去所簽訂的不平等條約早已宣布取消，我們不去收回，反而援引這些不平等條約來進行干涉，這不是一件荒唐怪事？！除此之外，我們當局顯然還有另一種幻想：希望美國在『門戶開放』及獨占中國市場的動機之下，幫助中國收回香港、九龍。關於這一點，雖然沒有官方報道，但我們可以舉出最近才知道的事實來證明。據本月十六日合衆社電稱：『伊利奧特·羅斯福所著之「羅斯福見聞錄」中謂，當開羅會議時……提及英國在華利益，羅斯福曾稱：「蔣意希望余等之支持，以使英國不致重返香港及廣東，保存其舊有之治外法權」

。『羅斯福顯然沒有『支持』這一請求，該電訊雖沒有下文，但牠却同時從側面提供了一點材料：當時羅斯福會以任何外國不許在中國享有特權一事告知史太林，『史氏答稱：世界對蘇聯主權之承認爲一主要原則……』。英國當然也要以承認她的主權爲主要原則的。這樣，在後來羅、史、邱三巨頭會晤時，便各以大家的主權爲主要原則而成立了雅爾達秘密協定。這協定後來公佈了蘇聯取得中國的旅順、大連及中東南滿鐵路の特權，自然也以承認英國的香港、九龍爲交換條件，這事是不難測知的。雅爾達密約是美國因抗議蘇聯的違約才公佈了出來的，像這樣的犧牲中國來互相妥協的密約一定還有不少——不管牠們公佈與否。這就夠說明掛上『民主』外衣的帝國主義者是最不可靠的！愈是依賴牠，泥足就愈陷得深；愈是希望牠，幻想就愈破滅得可怕！這定律已由無數的事變所證明了。

實際上，美國雖然爲了獨霸遠東，可能幫助中國去犧牲其他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特權，但另一種相反的可能性在今天看來却還要大。這就是說：爲了未來的反蘇戰爭，牠寧可讓香港繼續留在英國的手裏。對於這，我們不難舉出一個最好的例證來：不久之前英國曾宣佈建築香港爲世界最大軍事根據地的計劃，這計劃首先要在九龍建築一個世界最大的飛機場，結果因強迫當地中國居民遷出而激起大的抗議。這事雖然沒有成功，但畢竟告訴了我們：英國企圖以香港做將來進攻蘇聯的跳板，這點自然會得到美國底贊助的。美國與蘇聯的矛盾畢竟大過於與英國的矛盾，這就是妄想依賴美國而終於遭逢幻滅的原因。

香港（九龍）的住民有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是中國人，一切的風俗習慣都與中國無異，牠和中國是不可分離的。一天不收回，一天便成了中國主權不獨立、領土不完整的標誌，成了被奴役的可恥象徵！而且，由於牠是歐亞兩洲貿易的重要門戶，與廣東省息息相關，對中國經濟也起了舉足輕重的作用；尤其是牠的走私問題，威脅中國經濟的命脈更大。（據九月十九日新聞報載合衆社消息，本年一至八月份，香港棉織品和礦產出口數量，都超過入口兩倍之多，前一類在八月份竟比前多至四倍，後一類則更超過入口十倍以上，這種出入口的差額就是從禁止出口的中國境內秘密輸入的。加上黑市的港匯，對於中國乃是一種最嚴重的威脅。）此外，英國貨物經由香港而暢銷到華南、華中各地，利用香港作爲軍事根據地等，無論從那方面說來，都對中國非常不利。我們必須把已失去的權益收回！但英國不會自動璧還，美國也不會幫助我們來收回，即使幫助也只是爲了獨佔到她底口袋裏。唯一可靠而又有力量收回利權及取消一切不平等條約的，乃是中國人民大眾自己；捨此而他圖，只能是愚蠢而有害的妄想罷了。（康君）

論官僚資本

陳人白

『官僚資本』，自馬寅初先生特別而公開地提出來，指責它是『民營事業』的絕大危險，大聲疾呼『打倒官僚資本』。之後，即已引起了各方面的特別注意。近半年餘來，不少報章雜誌，座談會及政治集團等，常以官僚資本為題，進行討論，表示反對，發表各種各式的主張，這證明官僚資本已成了『衆矢之的』了。

但官僚資本究竟是什麼？它的危險究竟何在？尤其是要怎樣才能真正『打倒』它？人們雖然發表了許多意見，提供了不少主張，但綜合起來，還是很難得出一個明白而正確的結論。提出問題是一回事，理解問題又是一回事，而解決問題更是另一回事。要想將提出的問題加以正確的理解，首先就必須追究其原因及其發展的邏輯，然後才有可能得出正確的解決方案。我們的官僚資本，在當前不但是經濟上一個最嚴重的問題，而且也是政治上最嚴重的問題之一。因為官僚資本，顧名思義，與官僚政治是密切地聯繫在一起的。因此，要想認真理解官僚資本，懂得它究竟是什麼，便首先必須從歷史上去探索它的起源、發展及其與官僚制度的關係。

官僚資本的起源與發展

究竟『什麼叫做官僚資本』？馬寅初先生曾這樣地答覆道：『我對於官僚資本做不出什麼定義，我只覺得官僚資本的形成是這樣的：由官方來提倡一種事業，這事業慢慢地入於私人之手，於是官商合辦，到這事業發達以後，再把它收回官辦。』（馬氏在『上海各經濟團體聯誼會成立會』上的演辭——『經濟週報』二卷廿一期一三頁）從『官僚資本的形成』來解釋官僚資本，這在方法上是正

確的。但可惜的是，馬先生未能將這種方法加以澈底的運用，只是將官僚資本形成之一個斷片描繪了出來，因而也就只給了人們對於官僚資本一個『斷片』的印象。

其實，『官僚資本的形成』，遠不像馬先生說的那樣片面而簡單。它有其最為複雜而特殊的形成史。首先，官僚資本只是官僚制度下的一種產物，正如官僚制度只是寡頭專政下的產物一樣。但兩者之間也有一個不同點，就是：凡有寡頭（不管君主或『領袖』）專政的地方，一定要產生官僚制度；但有官僚制度的地方，不一定產生官僚資本。例如在古代的羅馬及秦以後的中國，雖然都已有官僚制度的存在，却不會產生官僚資本。因為那些時代的社會經濟還只是發展到初步的商業資本，而這種商業資本是極不固定的，因而沒有形成固定的官僚資本之可能。因此，我們又可以進一步說：官僚資本，只是在某一定歷史階段和某種社會環境的官僚制度下產生的，換句更具體的話來說，官僚資本乃是資本主義時代某些落後國家的官僚政治下的產物。某些落後國家（純粹的殖民地國家除外），一方面，不斷地遭受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侵襲、軍事打擊和政治壓迫，被逼着不得不興辦某些資本主義性的企業（如交通業、軍事工業、礦業及銀行等）來應付；但同時，本國資產階級的『原始資本積累』還遠沒有完成；——在這樣的情形底下，於是只有由

●馬氏於去年十二月在中國經濟事業協進會招待政治協商會議代表席上發表演說，痛斥官僚資本，其結語是：『今天要快快打倒官僚資本，發展民營事業，如果果太遲了，要反對，也不可能……』（十二月廿四日重慶『商務日報』）

國家的名義籌款（不論是借外債或取自人民）來進行。但國家的行政是操在官僚們手裏的，於是以前國家名義籌辦的企業，不管是『官辦』或『官商合辦』，官僚們總是起着『領導』（名之曰『提倡』）的作用，因而那些企業也就自然而然地被操縱在官僚們的掌握裏。這便是官僚資本發生的歷史根因，也就是官僚資本的起源。

此種官僚資本的起源及其過程，在土耳其、波斯、中國、甚至日本，差不多都同樣地經歷過，所不同者只是它們往後的發展過程而已。尤其是日本，因為某些特殊有利的條件，很快就由官僚資本的操縱而轉到民族資本主義發展的道路上去。而我們的中國，也因為某些特有的不利條件，却始終成了官僚資本獲得特殊發展的一個典型的落後國家。

我國自十九世紀中葉遭到西方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猛烈的經濟侵襲及幾次嚴重的軍事打擊之後（如鴉片戰爭及英法聯軍之役），滿清專制政府及其官僚們，爲了自保計，不得不不在『富國強兵』的名義之下，來『振興洋務』，開辦一些新式企業，如兵工廠、礦山、輪船公司、鐵路、郵電、銀行、乃至某些輕工業（如紡織業）等，以資應付。因此，直至辛亥革命前一個時期內，從我國現代化經濟發展方面看來，可以說幾全是官僚資本活動和操縱的時期。如就此時期官僚資本的代表們的特性分析起來，約有以下幾個主要點：

- 一、由於他們的資本的補充來源常靠外債，便特別依賴帝國主義，不惜將國家種種權益斷送給外人。
- 二、因爲他們要取得專制君主的信賴，便特別擁護反動的滿清，不惜以種種方法反對民族民主的解放運動。
- 三、因爲他們要鞏固和發展自己在經濟上的壟斷權，以此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便不惜用種種方法壓抑民營企業（如限制開礦及築路等）。
- 四、因爲他們『陞官發財』的傳統觀念，更『如魚得水』似地使用各種各式的貪污和侵吞手段從官營或國營的產業中謀

取贓物，轉變爲『私人資本』。

五、由於他們的特有作風（因循，敷衍，及無能等），凡是官營的或官商合營的企業中，都充滿着官僚化，絕對缺乏計算和效率（如管理及技術方面），致使企業本身常陷於癱瘓，甚至破產停辦。

我們如將前面的幾點特性再簡約起來說：官僚資本是買辦化的，或與買辦資本相結合的；是專制政府手中的一種新式武器，幫助它來鎮壓人民大眾的解放運動的；是鞏固和提高官僚們的經濟和政治上的地位，專門妨害民營事業的發展的；是官僚們『發財』的新領地，貪污腐化的新源泉；是國營事業的掘墳者，現代新式企業的送葬人。

官僚資本雖有以上種種危險的特性，但我們亦不應否認：滿清末年的官僚資本也曾替中國建立了一些現代的產業（尤其在鐵路交通方面，完成了幾條幹線），準備了一些經濟現代化的條件或基礎。假如以後的繼承者們能解除其弊害而善用之，中國經濟的現代化未始沒有前途。

但辛亥革命後，滿清政府雖然打倒了，繼承滿清的軍閥們，不但將官僚資本的遺產原封不變地全部接受下來，而且將官僚資本的一切弊害傳統也接受下來再加以發揮。軍閥統治時代與滿清時代的主要不同之點只是：後者還建立了一些產業，而前者則只是將它們加以更不合理的運用（如利用鐵路運兵打內戰等）；後者以全力壓抑民營事業的發生，而前者則以各種方法妨害民營事業的發展。

迨至一黨專政時代，除了繼承滿清及軍閥時代的官僚資本一切遺產和一切傳統之外，最大的變化就是：一、以『統制』之名將一切官僚資本集合和集中起來，操縱於極少數的官僚們之手；二、把某些民營或半民營的企業完全附屬於官僚資本（如以四小行附屬於四大行），使民營企業也官僚化，以增厚官僚資本的勢力；三、使官僚資本普遍展開到各方面去（如農村的貸款及所謂合作運動

等），以期壟斷全國各經濟部門及國民生活；四、企圖將中國的經濟命脈寄托於太平洋彼岸的金元帝國，以便中國對外關係的『單元化』。以上這些『變化』，我們可以稱之為『新官僚資本』的傾向，同時也可以說，這是中國官僚資本自發生和發展以來走進新階段的一種特殊的傾向。但這一傾向，由於日本帝國主義的空前侵略（日帝之決心大侵中國，害怕新官僚資本之此種傾向的成功，也是重要原因之一），一時被阻止，至少被壓縮到一個落後的地域發展去了。然而自日帝失敗後，『新官僚資本的特殊傾向』，從此更獲得了『千載一時』的良機，而它也就『敏捷地』、『勇敢地』抓住了這一良機而躊躇滿志地、毫無顧忌地大踏步向前邁進了。於此，我們的官僚資本便達到了登峯造極，展開了我們歷史上的一個『奇觀』！

官僚資本的現狀及其趨勢

現在讓我們進一步來略微檢視一下這一『奇觀』吧。

首先，我們必須重復指出，官僚資本的基礎就是國有產業及省有和市有產業等。在八二三以前，國有產業中最主要的是金融業（銀行），交通業（如鐵路、郵電、航運業），軍事工業，礦業及一部份動力業（電力）等。在輕工業方面是微不足道的。而且在交通業的鐵路中，佔着最重要地位的（就鐵路的里數言）東北的鐵路已全為日帝所有。在礦業中，不但東北（中國最大而最發達的礦業區）的礦業全為日帝操縱，就是關內大冶的鐵礦及山東滋博的礦產，也絕大部份落在日人手裏。至於省有和市有的產業，原來很有限。因此，我們可以說，那時官僚資本的基礎還是薄弱的。因而在那時期內，官僚資本還不能完全支配民營事業。尤其在輕工業方面，官僚資本的勢力更是微弱。但自日帝屈服，它的產業被我國接收後，情形就大大的改變了！

甚完全的『接收敵偽產業』的報告，略舉其大概來看吧：（一）、蘇浙皖地區——計由經濟部蘇浙皖區特派員辦公處所接收的工廠六四二廠，內被敵強佔或租用之廠一九四廠，純粹敵產四四八廠。據敵產處理局估計，蘇浙皖區所接收純屬敵產工業其現存可用資產（包括機器設備、房地產及原料和成品等）之價值，共計一千二百七十億零八千萬元。（二）、華北地區——從『華北開發公司』（以前日人統制華北經濟的總機構）接收下來的工礦事業，即有五十六個單位，每單位又包括若干工廠和礦山。其投資總額達三百六十七億八千五百萬日元。據非正式的估計，不下三十萬億法幣。而且其中有規模最大的重工業（如鍊鋼廠）和礦業等。三、東北地區——關於這一區的接收工作，至今尚未完畢。但東北的工礦業，不但遠較華北為發達，而且其規模是最為宏大的。例如，單以電力而論，該區的發電力即在一百二十萬基羅瓦特以上，即等於上海市的發電量十二倍。即瀋陽一地的大小工廠總數亦達三千餘所。其總價值至今無法估計，但比之華北敵產，當大十數倍是可斷言的。（四）台灣地區——接收下來的主要工礦業，據稱有二三六所。其中尤以製糖業規模最大而最主要。（請參考『經濟週報』三卷第一二期七—十頁）。

上面所指出關於接收的敵產的這幾點大概情形，雖然十分簡單而抽象，但人們至少可以由此獲得一個較為具體的概念，就是：我們從日帝接收過來的產業，如果以中國原有的產業相較，是最為龐大的，其中包括的重工業約佔全國重工業百分之八十以上，即輕工業中的紡紗業亦佔全國百分之五十以上，而織布業且尤過之。現在這樣龐大的『敵產』已經『接收』過來歸為『國有』了。然而這正是我們的官僚資本所突然增厚而擴大起來的新基礎！

我們的官僚資本既獲得了這樣一個雄厚而龐大的新基礎，於是它不但壟斷了國家的一切交通業和重工業，而且突然地闖入了輕工

了以前日帝的全部紡織業，並將其組織起來成爲一個大托拉斯，利用國家銀行的資金和救濟總署的美棉以及其他種種的方便（如電力及交通工具等），完全支配了紡織界，操縱了紗布市場，并毫無忌憚地在排擠民營的紡織事業了。『中蠶公司』的傾向，也差不多是如此，不過其範圍遠較狹小而已。如果再將我們的官僚資本在各方面所表現的壟斷情形和跋扈態度的趨勢列舉出來，可以得出底下的一幅縮圖：

一、在金融上，以四人行（中央、中國、交通及中農）挾着四小行及各省市立銀行支配了全國的金融事業，并以行政法令限制民營銀行的成立，以種種方法障礙已有民營銀錢業的發展，企圖完全壟斷全國金融界。

二、除操縱全國鐵路和郵電等交通業之外，并企圖完全壟斷全國航空業（如毫無理由地吊銷『大華航空公司』的牌照，就是一例），扶植招商局以摧毀其他民航空事業（如對民生等民航空公司之種種危害——文匯報八月十五日所載），把持全國公路運輸業，勢將獨佔全國交通事業而後止。

三、除已壟斷了全國的重工業（如煤鐵等礦業及鍊鋼業等）之外，并已進而操縱了紡織和蠶絲業，其趨勢將打進一切的輕工業部門之中而加以把持。

四、利用國家銀行的資金及外匯等等特權，操縱對外貿易。

五、以農貸、茶貸、蠶貸或絲貸及糧貸等等名義，壟斷農產品，剝削農民及一般消費平民。

六、最後，將操縱交易所，利用其特權，製造『消息』，用大規模的賭博手段來吸取各方面的資金。

就我們現時這種新官僚資本所已經達到的可驚程度及其顯著的趨勢看來，即就『它現時差不多已掌握了整個國家的經濟命脈，扼住了一切民營企業的咽喉』的現狀看來；就『它將蠶食整個國家的僅有財產，摧毀一切民營企業，吮盡一切民脂民膏』（以上引語均見求真第三期『論官僚制度』）的趨勢看來，這不僅僅是在我國官僚資本發展史上的一種空前前的『奇觀』，而且也是全世界上一個絕無僅有的怪物！

此種官僚資本的基本作用，依照它的傳統，正如它的生母——現時的新官僚制度——的本性一樣，是對外盡其買辦之能事，發展

外來資本的勢力，務使中國在經濟上完全隸屬於一個新的主人——一個最強有力的帝國主義；對內效其犬馬之勞，加強軍事專政的『經濟基礎』，務使中國人民大眾永久居於奴役地位，陷於萬劫不復的悲慘狀態之中。至於由它本身所產生的無比貪婪，腐敗、浪費與無能，那不過是其附產品而已。

國營與民營的問題

由於官僚資本既是在『國有產業』的基礎上，在『國營』的名義之下產生的；同時，官僚資本不但已與民營資本對立起來，而且有加無已地，極盡橫暴地在危害着民營事業，排擠它，浸蝕它；因而便發生了『國營與民營』的問題。這一問題雖然是一個陳舊的問題，但在現時官僚資本如此畸形膨脹和異常跋扈的情形之下被提了出來，却含有重大的現實意義，值得重新來加以討論。但本文爲篇幅所限，只能在這兒略表大意。

國營與民營的問題，在西方先進資本主義國家中早在半世紀以前就已被提出了。因爲西方的資本主義經濟，在十九世紀末即已發展到了最高階段的帝國主義。於是某些改良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便主張變某些民營企業爲國營，希圖以此來減少私人獨佔資本過份地壟斷國家經濟，威脅國民生活，并由此逐漸地走上社會主義。這在客觀上是多少反映了一般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總趨勢，——即由私有的資本主義經濟必然要進至公有的社會主義經濟的趨勢。單從這種客觀上的反映說來，『變民營爲國營』的主張是含有某種進步的意義的。但主張『變民營爲國營』的先生們却有一個致命的弱點，就是：他們不知道國家究竟是什麼？如果國家政權的性質不改變，將某些企業『由民營改爲國營』又有什麼益處？正因此，西方的那些改良主義和社會主義者們，雖然提倡了『變民營爲國營』的運動已有好幾十年，但其結果總不外是以其改良主義的花樣替獨佔的資本主義裝飾罷了。

我國關於國營與民營的問題，也早在辛亥革命之前即已成了爭論的問題。但我們那時所爭論的與西方恰好相反：在西方是主張『變民營爲國營』，而在我們則是主張『以民營反對國營』（所謂以『商辦反對官辦』）。這裏的原因已如我們前面所說，我國的新式企業一開始即是由官僚包辦起來的。所以後來逐漸積聚起來的資產

者及其代表們，便主張以『商辦』來反對『官辦』了。這種反『官辦』的運動，在當時的政治上是含有進步的意義的（如四川和湖南的鐵路風潮，曾作了辛亥革命的前奏，就是事實的表現）。但從我們落後國家的政治和經濟發展律（綜合律）說來，以民營反對國營的觀點，就不見得正確。因為落後國家的資產階級來得太晚了，它絕不能像西方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的資產階級一樣，能有那樣從容不迫的優裕的時間和優越條件，一步一步地踏上資本主義發展的道路。因此，落後國家經濟的發展，必須以國家的全部力量有計劃地來從事建設，才有可能。所以落後國家的經濟發展問題，首先是一個國家政治改革的問題。

現時人們對『國營與民營』問題發表的許多意見，除了一些技術上或枝節問題上的不同點之外，本質上仍然是站在『民營』的觀點上反對『國營』，重複了辛亥革命以前的老調。從當前現實的政治觀點上說來，以民營反對官僚資本的專橫還是具有相當的進步意義的。但如果從經濟學的原理上，從我國經濟發展的前途上說來，以『民營』反對『國營』，不但毫無進步意義，而且是倒退的。因為主張『民營』的人們，是完全站在資本主義自由競爭，自由發展的觀點上，然而這種自由競爭自由發展的資本主義時代，已老遠地落在我們的背後去了。這對於我們這種受帝國主義壓迫的落後國家說來，尤其是如此。尤其在現時，在國家從日帝接收了一宗龐大的產業之後，要想將這宗產業（即令是像輕工業的紡織蠶絲等業吧）如數交給『民營』，不但道理上說不過去（因為這是全國人民在抗戰中付了極大代價的一種補償品，不好讓少數資本家拿去經營謀利的），就是事實上也很難辦得通的（例如：某些產業應該讓給某些人經營，及以怎樣的條件出讓？都是很難決定的）。最後，就是將這大宗的產業讓給『民營』，試問在現時全國經濟陷入深刻的危機，行將臨近總崩潰的時候，『民營』又有什麼把握呢？不是有很多『民營企業』，正陷於掙扎、停滯而感沒有出路嗎？！

因此，我們應當指出：如果因官僚資本以國有產業為基礎或憑藉它而橫行霸道，營私舞弊，就作出結論說：這是國有產業本身的罪過，是『國營』的不對，應當將國有產業讓給私人資本家去經營（『民營』），那就未免『因噎廢食』了！因此，我們又必須指明：現時橫在我們面前的問題，已不是什麼『國營與民營』的問題。

而是怎樣將『國有產業』從官僚們的掌握裏搶救出來，變成爲名符其實的『國營』問題了。

怎樣解決官僚資本問題

如果人們承認我們前面所陳說的一切，是合理的，是符合於客觀的歷史事實的，那對於怎樣解決當前官僚資本的問題，就會得出如下一個邏輯的結論：

官僚資本，既是某種專政下的官僚制度的產物，并依靠它的存在而存在，依靠它的發展而發展的，則這種官僚資本的一切罪惡便是官僚制度及其所依靠的專政本身的罪惡之一種表現。因此，官僚資本，絕非單純的經濟問題，而澈頭澈尾是一個嚴重的政治問題，是與專制政治下的官僚制度緊相聯繫着的。所以官僚資本的問題，必須從政治上去謀取解決，換句話說，必須首先解決官僚制度及其所依靠的專制政治。假如專制政治及其官僚制度被廢除了，政治真正民主化了，『國有的產業』完全放在人民大眾的監督下，由人民自己選出或委託的代表們來經營和管理了，換句話說，『國有產業』變成名符其實的『國營』了，則我們現時無惡不作的官僚資本也就自然被送進墳墓，將成爲一個歷史上的名辭！否則，把官僚資本問題從政治問題分離開來，企圖從單純的經濟觀點上去謀取解決，例如以所謂『民營』去代替或對抗『國營』，這不但在理論上是倒退的，而在事實上也是空想的。站在這樣的觀點上，無論你怎樣『大聲疾呼打倒官僚資本』，高談『發展民營事業』，於事實上是毫無結果的，官僚資本還是『我行我素』的。

澈底廢除官僚制度及其所依靠的軍事專政，實現真正的民主政治，乃是澈底解決當前官僚資本問題之唯一有效的途徑，此外一切的道路都是走不通的。換一句話來說，只有將反官僚資本與反官僚制度及其所依靠的軍事專政結合起來，爲實現人民大眾的真正民主而向前奮鬥，那時官僚資本的問題才會與其他的民族民主問題一同獲得解決；也只有如此，我們的國民經濟才有可能脫離傳統的官僚資本的羈絆與毒害，而躍上一個新時代的前途，一個按照民衆需要的，有計劃的，集體主義的，名符其實的『國營』經濟的

官僚制度下的教育

陳覺玄

八年抗戰以來，中國的教育，比諸戰前，不獨沒有進步，反呈現倒退衰落的現象，這是我們不必諱言，而應當深加警惕的事。追求當前教育失敗的原因，就有各種不同的說法：

一·有人說中國自清末辦新教育以來，迄今四十多年，沒有一貫的教育宗旨，在清末以『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實』五項為宗旨，民國元年改為『注重道德教育，以實利教育，軍國民教育輔之，更以美育完成其道德。』四年，袁世凱又改頒『愛國、尚武、崇實、法孔孟、重自治、戒貪爭、戒躁進』七項。十七年，大學院又定為『三民主義的教育』。這樣經過四次變更，中間還有廢除教育宗旨，和『黨化教育』的說法，更令人無所適從。宗旨不能確定，教育便徬徨歧路，不能依一定目標前進，勢必至於頓挫，至於衰退。我們以為教育宗旨應當隨着時代改進，不是一成不變的東西，在前清君主時代提出『忠君、尊孔』來擁護他的封建政權，至民國以後，應當加以改正，袁世凱想盜竊國柄，又提出『法孔孟、戒貪爭、躁進』來做護符。現在所定的『三民主義教育』，其目的是期『民族獨立、民權普遍、民生發展』，如果真能做到，至少要比以前進一步，不能因前後經幾次變更，就認為這是眼前教育失敗的原因。

二·有人以為教育制度錯誤，是失敗的一種因素。民初的學制，由清末沿襲而來，清末的學制，多抄襲日本，日本又仿諸德國。十一年改用『新學制』，分為三級，初級、中級各六年，分為兩段，中級可採用三三制，四二制，或二四制；高級由四年到六年，中級用選科制，高級用學分制。十七年大學院提出的『整理學制案』，限制中學選科制，高級參用學分制和學年制，於普通中學外，注重職業教育，又形成了雙軌制。現在又有人提倡中級的五年一貫制，前後三次變更，不外模仿歐、美，未必適合於中國的需要，這是教育失敗的第二個原因。我們看學制應隨時改進，這也是補偏救弊的辦法，雖多模仿先進諸國，總較舊時的書院、私塾之不分年級、科別的好得多了，未見得有大的錯誤。況自二十六年抗戰以後，學制並沒有改革，足見這八年

教育的衰落，主因不在學制了。

三·有人以為經費短絀，是近年教育失敗的唯一原因。自民國成立以來，由二十年度到二十三年度，這四年之中，中央歲支的教育經費，在預算總支出額中，沒有超過百分之二點五。二十四年度增列義教經費二四〇萬元，邊省文化補助費五〇萬元，省立私立專科以上學校補助費七十二萬元，並原有經費四千三百餘萬元，其總數共為四千六百八十餘萬元。二十五年，增列教育建設費五百萬元，生產教育費八十五萬元，其總數為五千四百九十餘萬元，較之國家總預算額，仍未超過百分之五以上。五五憲草中雖定教育經費中央為百分之十五，地方為百分之三十，但據教育部本年度的報告，全國教育經、臨各費總數五·一二五，六六萬餘元，約佔全國總預算百分之十，比戰前雖增加了一倍，而在物價不斷猛漲的影響之下，反更形短絀，這是教育失敗的第三個原因。我們以為經費窘迫教育不能發達，但尚未到現狀不能維持的程度。試看北洋軍閥時代，民八到民十年間，北平常三五個月不發經費，各學校至罷課請願，而彼時的教育，並未衰落到現在的地步。足見經費不充足是教育不振的因素之一，而不是惟一的原因了。

四·有人以為因經費短絀，致設備缺乏，教員品質不齊，是失敗的原因。城市學校，沒有圖書儀器，鄉村各校沒有教具，甚甚連桌椅黑板都沒有。又以及各級師範畢業生人數太少，教員多不合格。有以中學畢業而教中學，小學畢業而教小學的尚屬勉強，還有私塾先生，私塾讀過幾年的學生而濫充充數的，其學識之陋，品格之差，更不待言，這種人才的問題和物質的問題，確也是失敗因素之一。但是我們看日本東京在一九二三年大地震後，其學校設備之簡陋和師資的缺乏，也出人意料之外，而各級學校照舊維持，並未有見到衰退，足見物質和人才雖是決定教育的因素之一，但不是惟一的重要因素。

五·有人以為教材的失當和教法不良是今日教育失敗的原因。自十七年教部編訂中小和師範學校的課程標準，二十八年又頒行大學各院系科目表，

三十年又擬定各科教材綱要，從此各級學校課程和所教的內容，完全遵照部章，整齊畫一，不容稍有出入。考其所定科目，不失之繁瑣重複，則偏頗不全，毫不顧及各地方的社會情形和實際生活，致各校因師資設備不齊，不得不勉強敷衍，徒具形式，內容空洞，學生忙於上課下課，無暇自修，課外毫無活動，這種『死讀書，讀死書』的教學法，必致學生陷於『讀書死』的地步。但自抗戰以來，因為紙張的缺乏，用書本教學，已屬難得，還有連書本求不到的，更有什麼教學方法可言？故教材與教法不良，也不能算是教育失敗的主因。

上述五種說法，皆是只見到當前教育失敗的一端，未見到全體，就是只見到教育的表象，未看到本質，都不能說出失敗的癥結。根據這些任何一種說法來謀補救，枝枝節節來謀解決，適如頭痛醫頭，腳痛醫腳，不能找出病源，絕不能根本治療，要想起死回生，挽救這一危機，實在是勞而少功的事情。

然則當前教育失敗的主要原因究竟在什麼地方呢？

我們以為教育是社會事業的一種，社會本質就是決定它的主導因素，其他的因素皆是從屬的派生的，試看西洋教育史，就隨着社會階段而有種種變化。在紀元前五世紀，希臘因為城市發達，雅典就在殖民地市，奴隸所有者的社會中，推行公民教育，羅馬至紀元前一世紀以後，成了富豪的共和國，在富民的階級社會中，就有摹仿希臘的摹仿教育。歐洲中世紀，南歐自由市發達，在這前資本的商務社會中，就有市民教育。近世自產業革命以後，資本主義抬頭，在這資本社會中，就有主張普及國民教育，促進生產，發揚民族文化的國民教育，第一次歐戰後，歐洲產生兩種極端相反的社會形態：一種是蘇聯的社會主義，就有社會主義的計畫教育；一種是德、義的法西斯主義，就有集權的統制教育。

中國古代教育，先秦以前，禮記王制有所謂『上庠、下庠、東序、西序、右學、左學、東膠、虞庠』及學記所謂『家塾、黨序、術序』等制度，都是漢代的傳說，其真象已不可考。至兩漢以後，中央所設的太學和地方所設的郡國學，都以教授經學為主，通一經就可以補官吏，這是君主專制下的官吏教育。唐宋以後，學校和科舉分為兩途，官學私學又分兩途。官學在中央有國子學、太學，在地方有州學、縣學，也以造就官吏為目的。民間的私學，多數還以教人博取功名利祿為目的，少數在識字習算，便於應用，科

舉則以經義詩賦取士。明、清兩代改用八股，都是只重聲律格式，毫無內容的文字，和人生日用全無關係，宋、明兩代，私人講學的書院很多，其所講的理學，多屬於形而上的心性問題，和人生實際也無聯繫。這是君主專制下的形式教育。晚清變法，試行新式教育，以『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為大目的，這是落後衰腐的中國在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猛烈侵襲之下，企圖保存『國粹』的復古教育和摹仿教育兩種的表現。

由上所述，社會背景對於教育所起的決定作用，可以斷定中國目前是什麼社會，對於教育又起什麼作用呢？

中國自辛亥革命後，雖推翻了滿清的專制王朝，代之而起的是北洋軍閥，社會基層則有各式地主，中間承上啓下的則為各層官吏，這三種勢力構成的社會，仍然是一個變相的專制官僚制度統治的社會。

經此次抗戰以後，國人的希望，外面將帝國主義者的勢力推翻，國內把封建殘餘的勢力解除，使我國成為民主主義的新中國。奈在抗戰期間，國際交通被日寇封鎖，致國內物資缺乏，物價飛漲，法幣貶值，政府只得用統制物資和通貨膨脹兩種政策來應付，結果却成就了官僚資本。貪污之風普遍流行，政治日益腐敗。在這官僚和地主上下敷衍欺蒙的局面之下，其影響及於教育，約如下述：

一、虛造報告，推行新縣制後，政府即頒發『國民學校法』，嚴令短期成立保國民學校或中心學校，各鄉鎮公所實在無法照辦，而又不能不奉令填報，遂照表格亂填數字，呈報縣府，縣府呈省府，省府轉中央，中央加以統計，就發表報告，如說三十二年度，後方推行國民教育的十九省市，共設中心小學、國民學校二十五萬一千三百六十一所，學生一千七百八十三萬零三百六十四人。這樣成績，實在斐然可觀。但考諸實際，究有幾分確實性？竟有非吾人意思所能及者。邱椿教授說：『地方教育的統計數字多半是虛偽的，例如某縣小學校的數目，在官廳報告上是四百二十八所，早已達到每保一校的標準，其中只有四五個區中心小學略具規模，二十九鄉鎮中心小學則為讀『三字經』『百家姓』的私塾。其餘大多數所謂小學，或僅有校長而無學生，或僅有招牌而無校長，或並招牌亦付缺如。若有不懂世故的視察員，按着官廳編製的小學校長名單，到某村去拜訪某小學校長，必有踏破鐵鞋無覓處之感嘆。所以全縣有學生有教員的小學，至多不過五十所，其餘三百七十八所小學多是假的，這是某縣教育行政上的特殊現象？不，天下烏鴉一

一般說來，又知官廳報告我們，某地方有二萬餘所附設或專設的民衆學校，在一年內掃除文盲四十九萬人，其中女性有多少，男性有多少，階級有多少，上課的日子多少等。這些數字有多少可靠性呢？只有上帝知道。民衆學校是附設在小學內的，十分之七的小學既是假的，那麼，皮之不存，毛將焉附？其他虛偽的數字不勝枚舉，只好不說。」（教育通訊四卷一期）我國地方教育行政的需要，即此這些話是過分的諷刺？我在後方八年有半，聽到川省人士談到川省教育實況也說：「國民教育之統計數字，均非根據可靠的統計，大都就教部原計數字，損益出之，故一期之中前後報告多不相符，流毒所致，遂造成虛偽作做之風，自上而下，均僅有表冊報告，不顧實際。」證以邱君之說，足見在官僚化的教育之下，所有的教育計畫、報告，多半是科員坐在辦公室裏偽造出來的官僚文章，叫做「報告至上，計畫第一」。難怪邱君又說：「記得在某次會議席上，有一個不識時務的視察員憤慨地說：『所裏小學，都是縣府騙我們，我們又騙中央的勾當』，沒有教員，沒有學生，沒有……的地方，何必去視察？簡直是白化旅費！」像這樣官僚教育就是再辦幾十年幾百年，我國的國民教育也是永無普及的希望，民主政治也永無實現的希望。

二、這許多空中樓閣的小學，是因爲經費無着，才敗壞到這步田地的麼？不，絕不如此。據川省人士談：「中央及本省補助各縣市的國民教育補助費，在二十九年爲二百八十一萬元，三十年國教補助費列入省預算者爲五百六十萬元，師資訓練費爲一百萬元，另由教部特別補助一百萬元，共爲七百六十萬元。教育廳自自國民教育補助費以來，尅扣捏存之款，常在二三百萬元以上。」這是五年前的情形，五年以來，中央及各省補助各縣市的國民教育經費增加到多少，雖不得而知。這種經費的數目，這確確實實不能打絲毫折扣的實在數字，用了幾千百萬元的金錢，結果得到一篇虛偽的報告，這是當前教育的成績。加之抗戰期中，實行兵役制，兵役制中規定：「現任小學教師可以緩役。」於是各地土劣和紳糧子弟爲逃避兵役，不惜以大量的鈔票賄買一個校長位置。及目的已達，就出僱教員缺，不獨不折本，還可利市三倍。又巧立名目，向學生徵收費用，更可以撈一筆巨款。這樣的校長和教員，難怪流氓地痞，奇形怪狀，無所不有，有拖着鞋，做着胸，嚼着長烟桿，隨地吐痰，滿不在乎的職員；有認不識阿刺伯字母，辨不清標點，不了解國語發音，不懂「公民」爲何物的教員，有談「肄業」爲「肄業」，「乞丐」爲

「乞乞」，「眼鏡」爲「泛眼」，「鬼鬼祟祟」爲「鬼鬼崇崇」；有掛着「行動紀律化」、「學生軍事化」、「清潔衛生化」、「讀書用功化」、「生產勞動化」、「抗戰必勝」、「建國必成」、「打倒日本軍閥」、「中華民國萬歲」四句之下各加問號（？），他們以爲問號比驚歎號好看些的。（民主教育第四期載露采采救救國民教育）這是把抗戰八股當作教條後應有的笑話，可見離開了實際生活而談教育，其流弊必至於此。

諸位以爲我們以上說的話是蔑視他們？那實在是罪過。他們除去上述臨時混入的少數份子外，大多數是值得我們同情，值得我們欽佩的。試看抗戰以來，多少發國難財的商人，發勝利財的官吏，其生活是何等優裕，而堅守崗位的小學教員的待遇如何？看政府國民教育基金的報告，有「保學費，學校造產，學校基金等項」，多是不兌現的支票，又查「修正小學規程」規定，「小學教員之俸給，應根據其學歷及經驗而爲之差別，但至少應以其所在地個人生活費之兩倍爲標準」，這是戰前的規定，現在當然可以適用，我們看現在每人每個月的伙食費至少非萬元不可，加上三個月一套平價布的衣服鞋襪，每月平均需五千元。住宅月需二千元。洗澡、理髮、車費、及筆、墨、紙張消耗三千元，月共需生活費二萬元，兩倍則爲四萬，以一夫一妻一子三口計，非八萬元不易維持。實際現在小學教員最多的待遇二三萬元，少僅三五千元。試問這點收入能够維持一個人的伙食。談不到衣服住宅了，更談不到一家幾口了，何況這區區之數，還不能按月拿到，有積欠至三五月之久的，有要親自向鄉長手中去乞討，或親向老百姓手中去收取的，其辛酸可憐的情形，簡直是高等乞丐，真令人不忍多說！

三、前數年紳糧子弟因爲逃避兵役，紛紛考入中學，一般狡猾，見此中有利可圖，遂爭先設立，借以斂財，私立中學遂如雨後春筍，大都基金薄弱，不能不多收學膳雜費，於開學時一次交足。計成都區學生所交最少至二萬元上下，重慶區在四五萬元以上，又儘量多招學生，每校四五百人，每次開學便可收到一二千萬元，校長和辦事人便可拿一部份款去囤集貨物，在物價飛漲的時候，一轉手可獲利幾百萬元。即存入銀行或私家銀號，以大一分的比期利息計算，每月也可得百萬元以上，向教員、向學生、向校工則用種種方法來剝削。如少聘教員，使一人兼任幾個人的科目。少用職員校工；使一人兼任幾種職務，凡兼任的人都只拿薪金不領食米，借此，並多購平價米來出

賣，節省開支。公立學校校長，除上述各種方法外，又在學生身上剝削，致伙食逐日益惡劣，有早晚均吃稀粥，每飯小菜僅蠶豆一盤的。以營養不良，學生中腸胃病肺炎蔓延，不知殺害多少青年？師範學校又多報學生校工空額，每領食米，計每月收入比他的正薪多到若干倍。因貪污過份，激起學潮，則開除學生，解散學校，吃虧總是學生，校長雖也去職，然已大腹便便，做富家翁了。教員以薪金所入，不敷家用，不能不多教鐘點，有一人兼任兩個半專任還兼職員的，終日奔波，時間不敷支配，遂有『遲到、早退、多寫、少講、輪流告假』的五部曲。還有應聘不到職，先領路費月薪，最後請人代課的辦法，叫做『空中懸傘』。

又私立中學因多收學生，不能不降低入學程度，或免試錄取，以廣招徠，每班人數竟達百名以上，教既感困難，訓導尤為不便，至管教廢弛，學風大壞，學生有攜槍持械，游蕩街頭，出入妓院賭場，其口啣香烟，圍坐茶館，更是習見的常事。男女學生蕩檢踰閑的事，雖初中也不能免，學風不振，程度當然低落，投考大學時中英數不及格者每佔百分之八十以上，於是出賣會考試題，投考舞弊試場，及『護航』種種笑話，層見疊出，公開見於報章。教育當局和各校的辦事人對於這些學生的辦法，則有嚴格管理，把學生當囚犯看待，用軍事訓練，把他們養成馬弁，加緊課程，採用艱深課本，教他們生吞活剝，沒有方法消化。還有所謂『內務整理』，叫他們沒有精力來讀書。用『黨團組織』，利用一部份學生，叫他去監視多數學生，如有思想不穩，就加以反動派的罪名，借此排斥，更可邀功。這都是官僚政治下演出來的怪象。

四、至於大學教授的待遇，比中小學教員為優，現因物價指數上升，得隨時調整，但是薪額增加的比例，只有物價百分之四，就是物價增加到一倍，薪金則加了四元。還要自己賠墊出九十六元。現在物價指數已到了三千倍以上，而教授的薪金只在二百二十倍左右，因此，稍有辦法的人多數改就其他的職業，其困守舊業的也復兼職、兼課，還有兼營商業，或其家屬奔走市場，囤積貨物，或買賣黃金美鈔，借資彌補。他們對於課程已無法自修，不求進步，死抱着一套煩瑣的教條公式，充滿了可厭的市儈意識，如何能教育出優秀人才？創出高度的文化？難怪他們只有照本宣揚的講解，用點名、記缺席、嚴格考試來強迫學生上課，談不到討論、研究了。近年教部擬定導師制的辦法，他們也以兼任者多，無暇顧及課外的任務，多置之度外。又因

校中另有黨團的組織，無須教員多事，甚至不容非黨員的教師作出任之謀，他們惟有明哲保身，免得被人戴上紅帽子，黑名單上題名，擾亂多少心事，犧牲了多少寶貴的光陰。

大學學生加入黨團的，各有主張，各有組織，一遇到政治上發生了什麼問題，政黨間發生權利的衝突，他們便大顯身手，標語傳單，帖滿了校內外，彼此皆爭取中立份子，借以打擊對方。甚至互相栽贓誣陷，無所不為。可憐的是一些無所謂的自由思想者，便時時提防特工份子的襲擊，看文藝的書報雜誌，都要受到他們的注意。說話一有不慎，就要被他們藉口，認為思想不純潔。甚至因私仇被人陷害。這樣，把學校變成了政爭的場所。又因物價不斷的飛漲，教職無法維持日常生活，惟有把書籍衣服或日常用品送到寄賣行裏去出賣。學生見到有利可圖，遂有舉辦『聯合寄賣』的。始則每季數次，或間月一次，除抽取佣金百分之十，又出賣門票，每張百元，每次可淨餘到十幾萬元。於是各團體爭先舉辦，廣告貼滿了校內校外，直貼到城門口，街市通衢，把學府變成了市場。自『盟友』到後，男女交際跳舞的風氣，盛極一時，參加的人不能不講求衣履裝飾，有因此竊取同學的金錢鐘錶水筆的，被發覺後，身敗名裂，至於自殺。而醉心於此的人至於廢寢忘餐，把功課拋到九霄雲外。這樣，又把學校變成了交際場所。一個學校經上述三種特殊化，便沒有絲毫學術空氣，還成為教育機噐中的最高學府？

上述當前各級學校的種種現象，推其原因，都是整個畸形的官僚社會所反映出來的。中國的教育正和其他社會事業一樣，在貪污腐化的空氣之中，向前演進。還有人要利用這種社會保障他們既得的權益地位，不惜用歪曲的理論來欺騙大眾，用高壓和恐怖的手段來鎮壓大眾，凡被認為非他們派系中的校長就要遭到排斥，非派系中的教員要受到猜忌監視、警告，違反這種趨勢的理論，都要被摧殘或撕毀。這就是當前整個教育的絕大危機！我們要看這這危機的癥結，對症下藥，不要從局部的枝節上來謀解決。

要挽救這事業的危機，首先要改造社會這也不是絕對不可的事情，其惟一良藥，只有實現澈底的民主主義，第一要國家對外獲得完全的獨立自主，其次要人民能完全獲得普選權、以選舉自己信任的代表處理國家一切任務，廢止官僚政治。最後使人民大眾在生活上獲得必須的保證，這首先就要實現『耕者有其田』，叫大多數展轉在飢餓線上農民得有生機，使社會的基礎得以穩定。

第一卷第二期目錄

時事評論(五篇)	鶴臯等
民主的內容與怎樣實現民主	陳人白
維新與革命	唐虞世
波茨坦會議與德國問題	西岑
戰後世界經濟特徵	竹雲龍
戰後蘇聯之經濟	彼得F·戴勒喀著·劉少嚴譯
關於老子孔子思想問題的論爭	李季
行不得也哥哥	歐伯
回頭是岸	冰夷編譯
論英國伊麗莎白時代的戲劇	朱維基譯
英國詩歌發展的三個階段(續)	李毓鏞
近十年來科學新發展概觀(續)	謝少翁
大時代的小船(小說)	蘇閑
旅途隨筆(自重慶到上海)	劉朝真
『勝利』在珠江(廣州通訊)	編者
編輯餘談	

第一卷第三期目錄

時事評論	評『下關事件』	海明
論官僚制度	怎樣消除內戰	海明
戰後國際政局之演變	法意選舉之意義	陳人白
美國六十家族之戰爭利潤		劉少嚴
數以萬萬計之贏利		喬治·沙爾
戰後企業界的利潤將有怎樣的龐大		曉山譯
利潤與工資		謝山譯
評李季呂振羽的老莊看法		少棠譯
再論老子與孔子——答歐伯先生		蔡尚思
孔子不會革貴族的命		李季
維新運動底階級基礎和解放意義		陳振維
論文藝復興時代西班牙的戲劇		唐虞世
英國詩歌發展的三個階段(續完)		冰夷編譯
求真(詩)		朱維基譯
近十年來科學新發展概觀(三)		羅式鏞
編輯餘談		編者

由上說來，如果除去由社會改革外，我們教育界本身道難只有處於被動的地位，不能自動的來創立新風氣？不，絕不如此。我們也應盡個人的力量，並聯合集體的力量來挽回這種頹運。姑提供一點意見如下：

一、中央教育部及各省市教育廳、局應設教育評議會，由各地教育界人士及其他各界人士選舉代表組織之。共謀中央及各省市教育、立法、行政應興應革諸事宜，交教育部及各省市教育廳局執行。

二、各級學校應設教員評議會，由全校教員選舉代表組織之。該評議會應與學生會共同討論各該校行政、教務諸事宜，交校長執行。

三、各教育機關及各學校財政公開，其預算、決算皆交上述兩種評議會審核；學生會亦有參議之權。

四、各地教育官吏，由各省市教育評議會推選，交中央及省政府擇委；各校行政人員，由各級教員評議會及學生會推選，交省市教育廳、局加委。

五、寬籌教育經費，並切實保障其獨立。不受任何官府的干涉，並推行

教員及學生各種福利事業

六、建立教訓合一制，廢除特設的訓導處及軍事訓練。取消黨化教育，教員講學、學生研究，俱有絕對的自由。

七、各級學校的教科、教材，必須和社會生活打成一片，適合各地方的社會需要，使教、學、做合為一事，廢除全國一致的課程標準及一切空洞的公式教條。

八、提倡自動學習和研究的習慣，使學生對於一切問題能加分析、批判，不受任何私見的蒙蔽，提倡學生自治，發展其個性和羣性，養成其組織能力，庶他日能為自治模範的公民。

許多人提到民主問題，都以為人民教育程度太差，知識水準不够，一旦實施民主政治，必致被人利用，恐怕比不民主更壞，這是倒果為因的說法。不知道在現在這種社會中，教育只有每况愈下的日益敗壞，絕無起死回生的希望。我們謹以萬分誠意，貢獻這點意見，供全國人士和教育界的採納。

(三十五年四月十五日作於成都。)

美國操縱世界的命運

劉少嚴

一 美國的生長

一八六七年，即距離獨立戰爭八十五年，距離『南北戰爭』兩年，『資本論』的作者在第一卷第四三二頁，第二三四條註解中寫道：『在她現在（一八六六年）的形態上，從經濟上說來，美國依然要看作是歐洲的殖民地。』二十三年之後（一八九〇年），恩格斯在『資本論』第四版的同一註文中加入這一句：『美國已一躍而為世界第二工業國了，但她的殖民地性質，依然沒有完全除掉*』。再過二十四年（一九一四年），考茨基在『資本論』新版上又補充了兩句：『這個註解也陳舊了。美國已成了世界第一等工業國，它本身已在實行殖民地擴張的政策，故已喪失殖民地的性質了。』

這個含有歷史意義的註解指出了美國資本主義在短短的四五十年內，經歷過三個劃時期的階段：幼稚、生長和成熟。當歐洲人最初踏上這片新大陸時，牠純然是一片處女地，往後在殖民的過程中，逐漸發覺這片處女地的幾種特點：無限的土地、無可估量的富藏、和缺乏任何足以形成障礙的一切舊傳統，此外還有兩大洋與舊世界隔絕的優越的地理形勢。這一切都可以保證當時舊世界的一種嶄新的勢力——資本主義勢力，能夠較平和地在這裏發展起來。當然，所謂『平和』的發展只是比較地來說，牠與庸俗的進化論者那種粗鄙和可笑的『和平發展』的觀念是沒有共通點的，因為即使具有那樣優越的物質條件，資本主義在美洲的生長還是要經過兩次很大的流血：第一次逐走英國人，第二次征服南方的土地封建貴族。由此可知，即在最缺乏阻力的地方，近代經濟的發展還要聽命於歷史

的辯證律！僅僅在北美人的祖先償付了兩次血債之後，美洲大陸所有的優美條件才得到平安發展的機會。這個時候，這些發了財的美國後代才得意忘形的叫起來：『阿美利加主義的精髓是實驗主義不是辯證法！』

正當『資本論』作者寫下他的註解時，美國才第一次採用嚴峻的保護關稅政策，才開始認真地走向資本主義的建設，但那個時候，全國的鐵路綫還不過三萬〇六百四十五里，煤的出產不過一千四百萬噸，鐵不過九十萬噸，鋼不過九千噸，煤油不過三百萬桶，人口不過三千一百萬人，都市人口僅占全人口的六分之一。這就難怪上述那個註解要這樣子寫：『從經濟上說來，美國依然要看作是歐洲的殖民地』，雖然在政治上，她已取得獨立了。到了恩格斯補寫那個註解的時代，由於南部殖民地地主之屈服、黑種勞動力之解放、國家之統一、與移民之獎勵，鐵道網已伸長至九萬三千二百六十里了，煤的生產已增至八千一百萬噸，鐵增至四百二十萬噸，鋼一百三十萬噸，煤油二千六百萬桶，人口增加一倍，都市人口佔百分之三十五以上。這就是『美國一躍而為世界第二工業國』的時候，但農產品的輸出仍占全輸出的百分之八三·二，工業品（主要是重工業品）的輸入仍要依賴於歐洲，這就是『她的殖民地性質依然沒有完全除掉』的原因。但到了考茨基時代，美國的鐵路已伸長至十九萬三千餘里，遠遠超過歐洲全部的鐵道網，煤增至二萬六千九百萬噸，鐵一千四百五十萬噸，鋼一千〇十萬噸，煤油六千四百萬桶，人口九千一百萬，都市人口占百分之四五·八，這使過去的『

* 參閱『資本論』中譯本第一卷第三六七頁

註解『從陳腐陳舊，『美國已成了世界第一等的工業國了。』。

美國資本主義這三個時期的發展也很明顯的反映在美國資產階級的對外政策上。在過去世紀的六十年代，牠的利潤主要還靠保護關稅來保障，牠的慾望還沒有超出國內市場，但到了八十年代，在工業空前發展的推動之下，美國資產階級已開始向外尋求市場，開始從『殖民地性質』轉向帝國主義的擴展。但當美國資產階級剛剛想在國際市場上尋求出路時，這個市場已大致瓜分完盡了，不僅在舊世界方面，甚至在中南美方面也沒有插足之餘地了。這迫使美國資產階級只能向較弱、較敏捷的市場進攻，這就是門羅主義生長的原因，而且也就是西班牙成了這個門羅主義的第一個犧牲品的原因。從十九世紀末起，美國帝國主義已從美、西戰爭中正式走上國際舞台，順利地奪取了古巴，操縱了墨西哥，把加勒比海與墨西哥灣變為美國的內海，侵吞夏威夷羣島，更進而佔奪菲律賓羣島。巴拿馬運河的經營使美帝國主義的擴展得到更有力的戰略地位，她今後不僅可以逐漸伸張勢力於中南美，而且還可以隨時橫越大西洋和太平洋，與舊世界的競敵爭霸。所以自本世紀初以來，門羅主義已迅速變為『陳舊』，阿美利加合眾國要提倡世界的『門戶開放』了，最明顯最露骨的例子便是她對中國的政策。但美國要想真正替她的爭霸世界的野心鋪平道路，還要經過兩次更大的流血，這兩次流血與她脫離英國統治那個獨立戰爭，無論在規模上和影響上都不能比，至於在歷史意義上則簡直完全相反：她昨天用活生的『自由、平等、博愛』的獨立宣言來掙脫殖民地的羈絆，今天她却用死板的威爾遜十四條與羅斯福四大自由來爭奪殖民地，奴役別人了。這一點也順便的證明：美國愈來愈難擺脫歷史辯證律的支配了，當然，阿美利加主義的靈魂——實驗主義也就更顯得陳舊和不中用了，不管杜威之流願意與否！

二 從第一次大戰至第二次大戰

要想徹底了解美帝國主義生長的過程和她的政策，便不能不重新回到美國資本主義經濟的研究中去。首先我們不得不尋出美國經濟從十九世紀末以來發展的主要傾向，這個傾向就是：從自由競爭迅速生長了驚人的獨占！在南北戰爭後的十年間，美國擁有一千三百萬美元資本的托辣斯只有兩家，再過十年增至四家，資本總額為一億三千五百萬元。但十九世紀最後十年，托辣斯已增至一百五十七家，擁有資本達七十億元。本世紀初（一九〇四年）突增至三百八十八家，擁有資本達七十億萬美元以上，而其中三分之一以上握在七家最大的托辣斯手中。這些托辣斯與銀行資本結了密切的關係，莫爾根最初在鐵路事業中活動，後來成了經濟交易所的金融巨頭，不久便一躍而為美國銀行業的大王。全部金融市場操縱於二十三家大銀行的手中。在十九世紀六十年代，美國的百萬富翁屈指可數，但至本世紀初，全國百萬富翁已有三千八百人，操縱了全國財產的十分之九，而其中如洛克菲爾們，摩爾根們，梅龍們，杜邦們却佔有至高無上之地位。一九三七年，美國一位保守的經濟學者菲迪南·倫保，在他那本名著：『美國六十家族』中，把美國過去半個多世紀的發展做了一個總結：『美國今天受着她的六十家最富有的家族特殊集團支配着，而這一個集團又受着不下九十家次富的家族支持。在這個富豪統治圈之外，大概還有三百五十個家族，其發展和財富較少明確，而大都收入在十萬美元以上的。』『這些家族是支配美國的近代產業寡頭的活的中心』她們才『真正是美國的政府——無形態的、不可見的、隱晦的。這是在金元民主政治中的金錢政府。』在一個最富足的王國中，全國的財富竟集中在少數大王們的手裏，無論繁榮與恐慌都不足以動搖他們，只有更增強他們的集中財富的趨勢。但另一方面，這同一最富有的國度，却經常保有兩千萬至一千萬的失業者，和另外幾千萬愈來愈趨沒落和窮困的小資

* 這三個時期的數字以一八六〇年，一八八〇年及一九〇〇年為標準。

產者。這就是美國資本主義所創造出來的最基本、最無法解消的大危機。爲了保證這些獨占大王們的特權，爲了追求無厭足的超額利潤，爲了緩和這一危機，美國的六十家族便一天比一天更兇猛、更好戰地把美國推向帝國主義和戰爭的道路。一種過遲出世的不利的歷史條件與空前無比的物質力量更造成了美帝國主義的驚人的機動性，迫使她要急於向國際舞台上爭取領導權。但正因爲美國具有無比優越的物質條件，她在發展的最初階段內可以較『平和地』積累和盡量利用她的國家資源；又在往後向外發展的階段內，可以藉雄厚的經濟力量與各帝國主義在國際市場中作『平和』的經濟競爭，這就是『民主政治』與『門戶開放』政策的物質根源。但獨占資本既然與『民主政治』不可和解，牠也同樣與『門戶開放』或國際的自由競爭不能長久並存，『民主政治』終於成了『金融寡頭政治』，『門戶開放』也終於成了美國獨占大王們的國際霸權。這就是美帝國主義終於從『和平主義』的濫調走上戰爭的原因。

第一次世界大戰雖然是英、德兩大帝國主義集團之戰，但其主要歷史意義還是世界新舊帝國主義力量交替的第一次大決戰。威爾遜總統雖然與其他帝國主義代理人一樣帶着最動人的宣言走入戰場，但其主要動機仍然是美國的巨富想從戰爭中得到利益和更大的機會。誰發動這次戰爭？『六十家族』的作者答得好：這等於問『誰藉戰爭而致富？』戰爭利益之大部分，不，差不多全部落入最富有的家族手中。從一九一七年四月六日至一九一九年十月三十一日，美國政府的全部戰時支出是三五、四一三、〇〇〇、〇〇〇美元，但從一九一六年一月一日至一九二一年七月，美國工業的純利是三八、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美元。這些利得三分之二以上握在『金融托辣斯』所支配的企業手中。至於政府的戰時支出，當然靠公債來彌補，而對於一般企業的徵稅則不僅沒有增加，反而減低！『戰爭的負擔是人民的，利益是六十家族的！』這就是美帝國主義戰爭的各言。第一次大戰結果，美帝國主義者在國際上不僅犧牲戰敗

國，而且還犧牲她的戰勝國同盟者，取得了一個債權人和第一等強國的地位，把資本的觸鬚伸張到世界的每一個角落去，這正猶如她犧牲國內人民的利益來培養自己的特權一樣。遠自第一次大戰之後，美國已開始向舊世界猛烈地干涉，她挽救她的同盟者，挽救德國，企圖藉此奴服和組織歐洲，在遠東方面，她也愈來愈積極的侵奪中國的市場。但美國企圖實現她的目的還早了一點，她不僅需要擊敗那個雖然衰老却具有傳統力量的大英帝國，而且還得削弱法國，對付她和英國所培養復元底德國和東方日本的競爭，最後，還要對付一個新生的蘇聯，這是一個潛伏的未可預知的因素。這就是說，美國要最後取得世界霸權，她還不得不償付另一次更大的血債。羅斯福就是懷着這個目的，把美國人民趕入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是誰發動這次戰爭呢？這一次我們仍然找不出比菲迪南·倫堡更好的答覆：這等於問『是誰藉戰爭致富？』據美國商務部的估計，美國光是各大企業公司的戰爭純利：從一九四一至一九四四年已達三六、九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美元。假如把全國其他所有較小公司通通計算起來，這種利得不僅遠超出上一次大戰，而且遠超出一九二九年許多倍以上。而這些獲利最多的大公司便是摩爾根、梅龍、洛克菲爾、杜邦、福特們所操縱的各種重工業部門與銀行業。我們只須指出：美國一九三九年的出口總值不過三十餘億，其中商業出口占百分之百，自一九四一年起出口總值迅速增加，達到一九四四年的一百四十餘億，其中商業出口的百分比減退至不重要的地步，而租借物資出口則增至百分之七九·三。所謂租借物資就是羅斯福根據租借法案輸出各同盟國的戰爭營養品，其主要利益，不消說，是歸於美國的獨占資本家——重工業和銀行資本家。假如我們再加上美國在戰爭中與戰後一年來對各國的貸款數字，則美國在這次大戰中無疑已達到了制霸世界的目的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與她競爭的敵人那一個一個的衰塌了，永遠成了她的債奴了。她現在不僅以同盟者的資格把大英帝國屈服，把法國降爲第二等的歐洲看門人，而且還

迫得要連軍救助她們，害怕她們完結得太快，總之，整個歐洲的國家都變為她的嗷嗷待哺的孤兒。在遠東，她已在訓練日本人『穿美國軍服』，順利地奪得了中國的市場，而且使所有東方殖民地市場都實現了她的『門戶開放』政策了。現在的問題留給美國解決的是怎樣重組這個衰敗和破爛的星球——在舊的基礎之上！

三 歷史性的危機

美國在這次戰爭中把生產力平空提高了一倍，但這種生產力的增加，不僅與整個舊世界生產力的平均降低一半，形成一個諷刺的對照，而且與全世界（美國也不能例外）人民生活水準之普遍降低一半形成一個尖銳的對比。這至少告訴我們一個真理：美國生產力的增加在整個沒落的資本主義世界中不僅不是絕對的，而且還不是相對的，而且在整個世界生產力的總和中，這種增加還不能彌補全部損失的一個小部分，這就是說，美國生產力的增加絕不能掩蓋資本主義臨死的一切病徵，恰恰相反，這種畸形的增加本身倒還是這種病徵之一。

美國資本主義生長的速率，自南北戰爭至第一次大戰之前止，指出一個不斷上升的曲線，平均每年增長百分之五以上。但自此以後，這個生長率便突然低落，而且每一次新的週期繁榮的高峯總比上一次低，比如從一九〇二至一九〇六年是百分之七·六；從一九〇九至一九一三年降為百分之四·六，一九二二至一九二九年的大繁榮時代竟降為百分之三·八。這證明美國經濟自第一次大戰以來便與整個世界資本主義經濟一樣開始衰落，資本主義擴展的有利條件已完全喪失了。兩次大戰就是這種衰落的產品，因此在戰爭中美國生產力的帶熱性的畸形的增高，並不是為供應一個健全的、穩定的、興盛的市場，而全然是為了滿足戰爭的需要。美國增加一倍的生產力是為了解破壞整個地球的生產力，這是一種自殺性的擴張！據一種可靠的統計，在這次戰爭中，美國政府每年的龐大的軍事定貨幾達一千億美

元。光是政府建築的新工廠價值已達一百六十億元之上，包括機器和工具，總值在二百五十億元之上。這就是美國戰時繁榮的一幅簡單的素描。這樣的大規模生產，其目的既然是在滿足整個世界的戰爭機構的要求，那末戰爭一旦結束，這種假態繁榮所積集着、隱伏的危機便立即暴露出來。首先，按照經濟學的法則，美國這次經濟着的繁榮把資本的有機構成提到最高點，不變資本採取直線式的向上發展，機器成了萬能，勞動力（可變資本）在有機構成中迅速退至不重要的地位，這件事本身已足以造成失業問題的更嚴重的局勢，軍隊的復員更把這個嚴重的局勢弄到惡劣不堪的地步；其次，根據過去的經驗，在每一次產業復興中，能夠『撮取大量乳精』的是獨占家們，一般的中小資產階級反而相對地貧窮化了，被排擠和吞併了；特別是那些『小人物』，好容易從戰爭投機中賺得一點小款子，迅即給高漲的物價與通貨膨脹的巨口吞掉了；最後同時也最重要的是戰爭中平空提高了一倍的生产能否順利地改變為和平生產？這個問題要依賴於國內，主要是國際市場的條件來解決。按照常理，戰爭結束之後，市場對於消費品，甚至對於製造消費品的資本商品的需要當然增高，戰時生產之能夠和平地轉為和平生產，就是根據這個原理的。但不幸這次戰爭對於整個資本主義世界所含有的自殺意義，過於濃重了。就是在美國本身也難逃其影響。本來一般的講來，美國的戰時通貨是比較穩定的，美國戰時的物資供應是比較平衡的，這是美國戰時繁榮特別厲害之賜，但絕對地看來，美國通貨的貶值和膨脹仍在加速進行，而消費品與軍需品之間的差額也驚人地表現出來，戰爭愈延長，戰時生產愈繁盛，則這種發展愈厲害。所以以貨幣額計算，美國各階級的收入是一般的增加了，但仔細分析一下，則不僅獨占家們與一般中小財產者之間，整個資產階級與工農大眾之間的收入大相懸殊，而且更重要的，名義的收入與實際收入之間也相差甚遠。資產階級還可以將其收入轉投入生產的過程，但一般平民只能拿牠去追求黑市中日漸稀少的日用品，剩餘的

部分就只好儲蓄起來，結果他們的實際收入是一天一天被通貨膨脹與物價高漲削減了，這就是說，他們的收入不僅相對地降低，而且絕對地降低了，這是美國戰後國內市場難於復元的主要原因。國內市場之狹隘化與戰時生產之過度膨脹把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生產之社會化與生產手段的私有——達到窒息和爆炸的境地，推使美國主義必須急於從國際市場方面尋找出路。

現在我們觀察一下，國際市場能否立即滿足美國的要求。在戰爭期間，由於與美國享受同等意義的戰爭繁榮，那些未受戰爭直接破壞的國家，如加拿大、中南美各國、印度、澳洲、中南非和埃及均在工業上得到很大的發展，甚至英國的工業也得到維持和補償的機會，她們這些國家差不多毫無例外地向美國取得資本商品，一部分消費品，甚至原料的供應。美國一般經濟學者堅認美國必須幫助各國工業化與工業復興，才能維持甚至擴大美國的生產，就是從戰時的經驗中得出來的結論。但他們不知道美國在戰後所遭遇的問題，在這些國家裏以更尖銳、更惡劣的形勢表現出來。她們同樣也在苦於戰時膨脹起來的工業與各國民衆的過分亦貧化太難和解了，於是通貨膨脹、工業停頓、農村衰敗與普遍的社會不安迫成一個革命的威脅。這些從戰爭中得到發展機會的國家既已如此，那些一貫受戰爭蹂躪的國家更不用說了。那末，美國目前不僅談不到充分利用這個國際市場，甚至還談不到保持牠。這是美國今天所遭逢的最大的歷史危機。

四 美國能挽救她的危機嗎？

美國的主要危機就是世界市場的危機。在這個意義上，美國獨霸這個垂死的資本主義世界的頭一天便把全部矛盾集中在自己身上。美國的全部戰後計劃無疑是想經過聯合國會議和國際銀行重新改組和支配這個世界，經過救濟總署來緩和國際的飢饉，經過進出口銀行的龐大借款來醫治各資本主義國的創傷，最後，經過『合作』來

迫使蘇聯及一切弱小國家屈服於資本帝國主義，主要是美國！她無疑是希望『和平地』吞食這次戰爭的成果，給美國的工業開創一個繁榮的機會。這就是羅斯福的全部國際『新規約』。但不幸華爾街的代理人開始認真地在歐洲和遠東推行這項『和平』工作時，便逐漸被引導到這個可怕的結論：覺得非最後再用一次原子戰爭來補充不可了。他們曾企圖藉數十億美元的借款來穩定大英帝國，但英國爲了穩定自己却迫得維持一個龐大的軍事預算并舉行不斷的軍事遠征和大示威；他們又企圖藉同樣的借款和天主教的殭尸來穩定歐洲大陸，這個大陸却愈來愈被社會主義與法西斯主義的鬥爭撕成兩片；他們正想整頓中國的市場，這個市場又受了永無了結的內戰所侵擾。他們於是氣憤憤地怪責克林姆宮的外交政策迫使他們走向戰爭，他們却不明白，正是他們所依托的這個舊制度的臨死掙扎迫使他們盲目地要消滅蘇維埃制度的誘惑和攫奪那個佔地球六分之一的市場。而克林姆宮的離奇的自保政策也正是對資本帝國主義這種盲目的衝動害怕到極點的表现。當紅軍繼續佔領伊朗北部，企圖從伊朗爭取更多的讓步並準備向土耳其威脅時，美國立即支援英國；當克林姆宮想在遠東建立勢力圈時，貝爾納斯却用一道強硬的聲明迫使紅軍撤離滿洲；但當貝爾納斯想順利地通過聯合國會議解決一些問題時，克林姆宮的外交家却要行使他的否決權；當貝爾納斯在外長會議上提到東歐的奇特狀態時，莫洛托夫却嚴厲地攻擊意大利和希臘的反動勢力並向前者索取大筆賠償，最後，當貝爾納斯考慮德國的統一時，莫洛托夫立即又發表一篇堂皇的演辭，用中央集權政府來對抗英、美所提的聯邦政府和經濟統一計劃，順便還提起那筆尚未付清的賠款。雙方的觸覺那樣銳敏，簡直使每一次會議都變成一種歇斯得里的怒罵，當然，這絕不是個人的歌劇式的表演，而是一個大流血的前奏！

所有這些徵兆都在證明：美國統治者確實已非常堅定地走向一次決鬥式的絕望的冒險，他們已公開的扶助英國和法國進行軍事的

準備，在中海和巴爾幹舉行艦隊、空軍和陸上的軍事示威，在北極進行無休止的軍事演習，在遠東也公開聲明在武裝日本人，支持中國政府進行『統一』的軍事冒險，這一切反映在美國國內的政策就是：新的軍事準備。『只有在蘇聯未懂得原子彈之前應用原子彈，在世界革命的大火災未爆發之前進行戰爭才能夠多喘一口氣了！』這就是美國挽救當前危機的辦法，這就是目前以美國統治者為代表的全世界資本主義的共通綱領——從邱吉爾到杜魯門！爲了挽救美國的工業危機，挽救資本主義的死亡，羅斯福已靠這次戰爭打了一針救急針，現在，在那樣短促的時間內，杜魯門又迫得要弄一個更可怕的大屠殺來打第二針，這個無望的制度的挽救需要付那樣高的代價，未免太過於違背人類歷史的利益了！這不是挽救危機，這是在危機的推動之下走向懸崖絕壁！

五 從羅斯福到杜魯門——所謂『兩條路線』

現在國際上已有不少人習慣於把『羅斯福時代』視爲『民主』『進步』和『國際合作』的收歌時代，他們認爲杜魯門已『背叛』了他的前任總統的政策，『帝國主義反動派』已操縱了美國云云。這種說法不是盲目的無知，便是有意的欺騙，或者兩者兼而有之。事實上羅斯福的生長是完全符合於美帝國主義在戰爭前夜和戰爭當中的要求的。一九二九年的經濟恐慌已使美國的經濟走入死巷，一九三三年羅斯福帶着他的藥方——『新規約』（New Deal）上台，與德國希特勒的上台及後來法國『人民陣線』的上台一樣，無非希望藉此挽回一個大災劫而已。羅斯福實行『新規約』的最大作用就是企圖讓獨占家分出一些麵包屑來賄賂工人貴族，勸他們提高工資和縮短勞動日，以增加購買力及擴張生產。但羅斯福憑藉美國的雄厚力量所實行的『救濟』，也只不過把失業的數字從兩千萬減至一千萬，而在『新規約』所造成的假態繁榮中，資本大王們的利

潤達到了高峯，這一點甚至連美國官方機關報也承認。那末，『新規約』並沒有替美國打開一條『新』的出路，恰恰相反，倒還和希特勒的法西斯主義與法國的『人民陣線』一道引向那個大災難——戰爭。『和平主義』的羅斯福變成了一民主反法西斯戰爭』的舵手。當羅斯福拋棄『新規約』走向戰爭時，他在國內立即迫使工人貴族（如路惠士、莫黎、希爾曼之流）償付代價：簽訂一道階級休戰書，委任他們爲工會的警察和招兵軍曹。在整個戰爭的期間，美國工人不僅已把『新規約』時代所獲得的勝利品一點一滴的失去，而且還被人束縛了手脚，眼看物價的高漲、實際工資的削減以及工作日的延長。羅斯福就是站在這種『階級合作』的基礎上成立他的『國際合作』的，這種『合作』就是讓蘇聯、中國、及其他各『同盟國』的工農像美國工農一樣，犧牲本階級的利益來遷就美國獨佔大王們的利益，羅斯福究竟是代表『美帝國主義反動派』的利益還是代表那個烏有的『進步派』的利益？只有蘇丹和騙子才提出這種可笑的問題來。羅斯福與美國其他帝國主義代理人最大不同，只不過在於他是一個最精明、最能代表美帝國主義利益的選手，竟連他的犧牲者受了犧牲之後還愚蠢地歌頌他的『進步』而已！但這并不是說，他的後繼者——杜魯門將較少地代表美國的利益，不是的，杜魯門衷心贊成羅斯福的全部『新規約』和戰時的『合作政策』，他不是羅斯福的政敵，而是他的繼承人。但杜魯門總統所處的時代不是第二次戰爭之前夜也不是戰時，而是戰爭之後。這個戰後危機的深度絕不是實驗主義者羅斯福所能預測到的。所有『合作』在戰爭的威脅之下尚能維持，戰事一旦完結，一切矛盾——資本主義臨死的痙攣便爆發起來，從國內到國際。羅斯福既然能夠從『新規約』走到戰爭，他也能從戰爭走到杜魯門的『反動政策』的，所幸的是他畢竟死了，所以他的靈魂也就成了一個『進步之神』，受許多俗人崇拜。

人們指責杜魯門的最大罪狀是拋棄羅斯福的『合作』而走向

『衝突』，甚至新的戰爭，因此他們指出美帝國主義內部已產生了『羅斯福的進步路線』與『范登堡——貝爾納斯的反動路線』，而杜魯門則總是支持後者，又因為最近華萊士發表了一個『和平』的演講，他們便認為『他是羅斯福的碩果僅存的代表』了。事實上，杜魯門——貝爾納斯都非常忠實地在繼承『羅斯福的路線』，他們維護聯合國會議，國際銀行計劃和種種國際會議，這些都是羅斯福未死之前議定的；他們在這些會議上非常頑強地維護美國的支配權和利益，這也正是羅斯福過去所做過的，成問題的僅僅是羅斯福過去爲了戰爭迫成一種『合作』，現在則杜魯門和貝爾納斯可以不受『戰時合作』拘束，儘量維護美國的特權而已，但這也正是羅斯福的未竟之志。人們如果怪『聯合國』不能合作，與其埋怨杜魯門的『反動』，不如埋怨整個資本主義過於腐朽矛盾，過於緊張和複雜，世界市場過於狹隘、革命的威脅與蘇聯的存在太難於忍受，還無比切實些，因為沒有這些因素，聯合國會議——外長會議——和平會議就不會充滿無生氣的爭吵，美國的將軍們就不會立即宣佈準備第三次大戰，杜魯門就不會實行強迫軍訓，貝爾納斯就會和氣地和莫洛托夫擁抱。可惜，美帝國主義在這種戰後的國內外矛盾的推動之下，也只好走一條『反動』的道路。當然這種絕望的死路並不是全體美國人民都願意走的，最近美國工人鬥爭的激化，證明美國國內反戰的情緒非常濃厚，華萊士的演講只不過把這種不可悔的情緒翻譯成一種適當的警告吧了。但假如美國工人相信華萊士這一類政客是『和平的』、『反戰的』、『合作的』、『進步的』、『左派』，把他擁上台，那末他們將無誤地重蹈十三年前的覆轍，因為那時他們也同樣把那個『進步的』、『和平的』羅斯福擁上台，結果償付了五年的血債；將來華萊士所能做的也只能是在一個更無望的基礎之上，更拙劣地重演羅斯福的故事而已。這就是人們所虛擬的美帝國主義那個『進步路線』的實際意義！

六 美國大罷工的意義

美國統治者常常以充滿自信和樂觀的神氣，嘲笑舊世界的階級衝突，他們總以阿美利加的調和精神自豪，并稱之爲阿美利加主義。事實上這種調和之可能僅僅因爲阿美利加具有雄厚的物質力量而已。當美國從廣大的處女地中開創了一個繁榮局面之時，她是有足餘的力量來緩和國內的階級矛盾的。但當一九二九年的大恐慌永遠終結了這個健康的階段之後，美國便突然被國內的風起雲湧的大罷工削弱了，換一句話說，她也開始『歐洲化』起來了。戰爭前夜，從一九三三至三七年的時期內，美國工人開始發動第一次猛烈的罷工運動，他們這次鬥爭的最大特點便是擺脫以『美國勞工聯合會』爲代表的舊式職業工會，創立了一個嶄新的富於戰鬥性的產業工會（C. I. O. 即『工業組織委員會』）和創造靜坐罷工的新武器。這是美國工人鬥爭的一個新的紀元。不久由於美國正式參加第二次大戰，打斷了這次工人鬥爭的發展，所有工會領袖（路惠士、慕黎之流）通通擁護羅斯福的戰爭政策，所有罷工都被宣布爲非法，並用嚴峻的辦法（如強徵入伍、監禁、佔領工廠等）懲罰一切罷工者。但即使在這樣殘酷的強迫『合作』的壓制之下，工人們仍然此起彼伏的發動『非法』罷工，對物價高漲提出抗議。從珍珠港事件以來，罷工的數目便年年增加，至一九四四年六月進攻歐陸之前數月，罷工的數目達最高點。雖然這個時期的工人罷工多份是無領導和失敗的，但至少表明美國工人的戰鬥精神並未因工會領袖的出賣和戰爭的迫害而喪失，他們仍有勇氣向世界上最強梁的資產階級的『國內統一』挑戰。這就難怪戰爭一旦結束，美國工人階級又立即發動了一個新的罷工週期，其規模之大把全世界的資本主都嚇得口呆目瞪。

美國全國在業工人最近已達五千五百七十萬（民生產管理局的統計），加上失業工人，要佔全人口的半數以上，其中已有一千

三百五十萬人參加了工會（A. F. L. 佔七百萬，C. I. O. 佔六百五十萬），這就是說，有組織的工人較之過去十年陡增了三倍，而且現在還在增長中。這可以說是資本主義世界中一個最強大的工人階級。去年歐戰方告終結，罷工運動便突告猛漲起來，橡膠業、汽車業先後發動，至今年年初，捲入罷工的已有鋼鐵業、製罐業、鐵路業、海軍船塢……影響工人達一百六十五萬人。四月份以後，煙煤礦及無煙煤工人又相繼舉行大罷工，海員工人也起而響應。最近又因為物價管理取消引起物價高漲，海員工人又爆發一個空前的大罷工。差不多所有重工業、輕工業和交通工業都受了罷工的浪潮侵襲，捲入罷工的工人數以百萬計，美國的工業復員陷於麻痺狀態。迫得杜魯門急忙在議會中通過一道嚴峻的反罷工法令。這是一種嚴重的社會恐慌的開始。目前美國罷工工人所要求的雖然只是經濟的改善，但由於世界市場之不安和衰敗，這種改善的希望較之戰前渺小得多了，他們即使爭得一點工資的增加，通貨膨脹迅即將牠奪去。這是美國工人的鬥爭愈來愈激烈，規模愈來愈大的原因。美國統治者現在第一次經受一個狠狠的威脅，喪失了過去那種盲目自信的精神，客觀的形勢將一步一步迫使他們要與罷工工人處於正面對敵的地位，這個時候，工人的鬥爭將從反資本家的經濟鬥爭領域移到反政府的政治鬥爭領域。

過去長期『和平』時代所遺留給美國工人的保守特性便是：缺乏政治的獨立。他們追隨在工會官僚之後，總是在兩大資產階級政黨——共和黨與民主黨之間選擇自己的候選人，寄托『改良』的幻想於牠們身上。但這一弱點已隨着『和平』時代的終結而開始加以克服了。最近 C. I. O. 之組織一個『政治行動委員會』，便是工人走向政治獨立的表现。在工會左翼的推動之下，隨着工人鬥爭的激化，一個代表工人利益的政黨出現并不是一件很遙遠的事情，一個新的時代必然有一種新的結合，當美國工人階級開始在政治上脫離資產階級的影響和支配時，新世界將替全人類打開一個新遠景

。我們的希望就在這個上面，而絕不是在美國資產階級的烏有的『進步派』上面！

七 結 論

美國在十八世紀六十年代利用舊世界的矛盾（英、法的衝突）取得政治獨立，十九世紀後半又利用歐洲的戰爭、混亂、反動與經濟恐慌得到經濟獨立，本世紀初，特別是經過第一次大戰的培養，使她開始從事於世界市場的爭奪，這次新的大戰又把她抬高到世界霸主的地位上。她是一貫以犧牲舊世界而長大起來的，但她終於受了這個舊世界所牽累，她制霸於這個舊世界的時候就是她開始衰老、潰爛的時候，這是歷史辯證律對於這個實驗主義國士的最後而又最致命的懲罰。美國高據於這個星球之上，現在突然感覺得過於孤單和淒涼了，假如羅馬帝國在古代奴隸社會的歷史中佔據了一個最後的獨一無二的位置，阿美利加帝國顯然成了資本主義奴隸社會的羅馬帝國了。所不同的是遠在美帝國主義掌握霸權之前，資本主義制度已被爛不堪，在歐、亞之間已生長了一個致命的社會主義國家，這就是今天，美國一走上世界霸主的皇座之後，便立即準備與那個帶威脅性的蘇維埃國家決戰的原因。無疑的，美帝國主義勝利的頭一天便渡着古羅馬盛極而衰的一段痛苦生涯——不僅國內的奴隸，甚至她控制下的全世界奴隸都威脅着要起來反叛她，而迫在眉梢的那個社會主義革命的怪物將證明比之古日耳曼的野蠻人要更無情地終結這個新的羅馬帝國。美國工人階級勝利還是美帝國主義勝利？這個歷史問題操縱着今後整個人類的命運！一九四六年九月二日完

美國人口一半生活在水準以下

一九四五年，全美國所有家庭的半數是每年收入不到二千元美金！每星期在四十元以下的。三分之一以上家庭的收入是三千美元以下。而九百三十萬戶是迫得要靠年中不足一千元美金過生活的。以上就是最近聯邦儲備局的統計數字。他們尚未計及因生活費膨脹而引起的實際收入縮減的數字。另一方面，該報告又指出：美國百分之十最富有的家庭却擁有全國所有流動資金的百分之六十。

第二次大戰與美國獨占資本之生長

柏萊 著
仁 昌 譯

一 美國大獨占家發戰爭財

第二次世界大戰並沒有實現那應允過的「四大自由」。牠也並沒有帶來持久的和平、富足和安定。但牠却使美國的大商業變得更龐大。牠却使財富和經濟權力集中於巨大獨占業的手中。

這些獨占業占有美國大部份工業、運輸業、原料、食品生產和分配、以及金融機關，而牠們自身則受美國六十家最富有家族的一個小小的寡頭貴族支配着。牠們占有本國之大部分財富。牠們統治着她。而目下進而統治全世界的也正是牠們的武裝力量 and 經濟侵略。

美國小軍需廠組合 (Smaller War Plants Corporation) 最近發表了一個報告，這個報告是替參議院的小商業委員會預備的，牠的內容就是敘述上述這個統治的寡頭貴族在本國占有多少財富，以及經過第二次世界大戰，牠們把牠們的所有權和支配權增加了多少的。這個報告題為「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之經濟集中」，共計三五八頁。

『經濟貴族』養肥了

羅斯福於一九三三年開始他的總統生涯，他答應「把金錢據客驅出國外」並攻擊「經濟貴族」。但據上述這份參議院的報告最後的證據指出：「經濟貴族」在他的和平時代的體制內養肥了，又在他的戰時統治期間增長了空前的財富和權力了。該報告證明：「大商業，特別是那些龐大公司的相對的重要者，在戰爭期間內猛烈地增大，而小商業的地位則低落了。」

一九三九年九月，第二次世界大戰開始之時，美國一切可用的生產事業的價值約四百億美元。但光是二百五十家最大的公司已佔去這些資產的二百

在戰爭期間內，生產事業增加了二百六十億美元，其中三分之一是美國財政部從美國人民的腰包裏掏出來的。據這個報告說，在這些事業中，其中值二百六十億的戰時生產，有二百億元，只靠略略經過改編，就可用作和平時期生產品的生產了。這樣，今天就有「約六百億美元的總數充作戰後的有用事業了。」

那末，是誰操縱着這個龐大的生產機關呢？「這個報告問」：「答覆這些問題，只須審查一下全國二百五十家最大製造公司的股份便成」；其中有三十一家是受五個金融業的集團操縱的。

「假如這二百五十家工業巨富最後獲得聯邦津貼的可用事業八十九億美元，則牠們的股權要達到三百八十五億美元，佔全部可用事業百分之六六。五，幾等於戰前七萬五千家製造公司擁有的三百九十六億美元。」

今天，美國二百五十家龐大的公司佔有製造生產事業的三分之二！

但事情還不止此。其中三十一家公司占有總值一百八十二億美元的事業——全國生產機關和裝備的百分之三十。而五個金融集團，——即：摩爾根——第一國民銀行、梅隆、洛克菲爾、杜邦、和克利維爾集團——則占有這十三家公司。

大商業受兩次大戰的幫助，牠們所走的方向，由下面另一種輝煌的數字指出來：

一九三四年，保有五十萬美元以上製造業資產的公司——該報告稱之為「工業巨人」——操縱全部製造業資產的百分之三十七。一九四〇年，這些「經濟貴族」操縱了百分之四四。一九四二年，受戰爭之賜，二百〇五家公司占有全部公司工業資產的百分之四十九。

公司愈變龐大，他們所賺得的全額利潤比其也愈大。該報告稱：「收益最大者——收入五百萬美元以上者——愈來愈重要。例如，一九一八年牠們專制所有製造業公司純益總額的百分之三四。二。在不景氣時代，收益最大

者的主要性減退。但自一九三四年以來，該股最大者已趨高牠們的地位，而一九四二年，得到每年純收益五百萬美元以上的公司，已佔總額的百分之五〇·七。

占有資產的百分之四十九

相反，羅斯福及後來杜魯門答應要加以拯救的小商家迫得愈來愈無出路。『收益最少者——每年純收益在二十五萬元以下者——其重要性年年衰落。一九一八年，這個集團獲得所有製造業公司純收益總額的百分之二三·四。一九二九年，牠們的比重已低至一九·一了……而到了一九四二年，牠們的部分已減至僅僅百分之十一·六。』

在整個經濟中，其相對的地位得以增進的唯一集團，是保有一千名僱員以上的最大商行。一九三九年，這些商行僱傭了全部工資收入者的百分之三十。『到一九四三年，這些數字已升至百分之四十四。』

但僱有一萬工人以上的「幾個巨人」——一九三九年占有全就業人數的百分之十三，一九四四年，則佔總數的百分之三十一。』

如是，戰爭賜給大獨占業的不僅是財富和生產事業的較大一份——牠還賜給牠們一個無比更大的直接支配權，支配工作人員的生命。

對「小人物」的致命打擊

同時，戰爭還給那些小商家一個致命的打擊。『戰爭幾年的紀錄指出大商業的重要性不斷增長，而小公司的地位則不斷衰落。這一半由於五十萬家零售、服務和建設商行的全部喪失。』

一九一九年和一九三九年占有美國大部分財富並統治她的小小集團，今天占有更多財富了。

一九三九年僅僅一萬人（全人口的百分之〇·〇八）便占有全部公司股份的四分之一，七萬五十人（全人口的百分之〇·〇六）占有一半。

百分之二的大享股東占有二百家最大非金融公司的百分之六十的優先股。

僅僅八個家族和互相連鎖的金融集團——包括梅爾根系、梅龍系、洛克菲拉系、杜邦系和孔恩·羅比系——在二百五十家最大公司中整整操縱了一

百〇六家和牠們的總資產的三分之一。他們就是占有美國大部分財富的人。戰爭對於他們是有好處的。

二 獨占資本之前途

參議院小商業委員會，在牠那篇洋洋大報告『經濟之集中與第二次大戰』中，用豐富的材料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戰如何光是令大商業發財，又這些巨大獨占業如何獲得更大的權力和支配權。（參閱上文）

該報告於是問：『這種戰時的（財富和經濟權力的）集中將對和平時期的經濟發生什麼影響呢？戰時造成的集中將受抑制或增長，抑或經濟將恢復到戰前的狀態呢？——我們不應忘記，這個經濟已達到高度的集中了。』

該報告稱：『在兩次世界大戰當中，美國大商業的相對重要性猛烈地昇高起來。軍事貨單主要是送到大商行裏，牠們積聚了龐大的利潤和操縱了大多數工人的命運。』

照樣發展

第二次世界大戰不僅繼續維持這種歷史的原樣方式發展，而且比之往日更迅速地發展。『證據是非常明顯地證明：大商業將能夠利用另外一大批戰時的發展來增進牠們在戰後經濟中的比重。這些發展包含生產改良、科學研究、戰時廣告、增殖的流動資本和新事業。』

大公司通過戰爭能夠『藉豪華的廣告宣傳，在公眾眼前保持牠們的公司名字、牠們的商標、或牠們的牌子。這些字號大都經過戰時的努力出了名而採取所謂法團的形式。而且牠們大都是受聯邦政府津貼的，廣告宣傳在繳稅之前便在支出項下報銷，因此縮減了公司的納稅。』

但這些比較上說來也只是戰時大獨占業對小競爭者所獲得的小小便宜。最大的便宜之一還是流動資本之增加與積集在少數幾個『工業巨人』的手中。

『在戰後的頭幾年，大商業將有幾十百億現金，能夠用種種方法來改善牠們的地位……一九四五年中，各自保有一億美元以上資產的六十三家最大的登記過的製造公司已增加牠們的流動資本達八十四億美元，比一九三九年

所有登記的製造公司的流動資本總額還要多，而且由於上述的理由（過分利得稅的退還政策），一九四五年末，牠們將擁有近一百億美元的高度流動資本。

利用這筆資本，這六十三家公司就能够照限價購買全部政府所有的生產事業，或者——牠們就能够購買各自保有三百萬元以下資產的七一、七〇〇間小製造公司，這些公司代表美國製造公司總數的百分之九十四。

該報告總結起來說，獨占業更進一步增長的前途是：『經濟集中在戰後幾年大概將比戰前更高，這全由於大商業在戰時獲得的生產改良與科學研究；大商業流動基礎和一般金融力量之增加；戰時大商業在公眾眼中保持其字號和商標的能力；最後還有這一事實，即：大商業將多份比之小商業，在牠們戰時興建的事業中，獲得較大一份，不管經濟的情形是繁榮還是蕭條。』

最有意義的，就是該報告指出：『在製造業中，歸併和攫得股權的速率，在一九四五年末季比之以往十五年任何時候都要高。』

經濟權力，決定美國人民生死的權力這樣可怕和愈來愈大的集中於占有財富和特權的小小寡頭貴族手中，將怎麼辦呢？

該參議院委員會的報告恰在這一點上停下來。牠用兩句簡單的話來總結牠的主張。牠只是不加發揮地說，雖然上面搜集的事實指出大商業將『大概』還要增大，但不應作出結論，認為這是『不可避免的。』『集中不僅能够被抑制在牠目前的地步；牠也能够實際被抑低到這個水準之下。』

給小商業的麵包屑

怎樣辦呢？該委員會用一句話來答覆：『這需要一個反托萊斯的政綱，一個小商業的政綱（包括金融救濟）和一個在規模上從來想像不出的特別幫助小商業的、盈餘處置政策（Surplus-disposal program）。』

實際上說來，這個『實際』抑低獨占業的政綱就是——丟幾片麵包屑給那些小商人，移讓若干政府建造的事業給他們，以及幫助小資本家變得更大、更有力去抵抗大公司的競爭。至於『反托萊斯政綱』——在法律書上的反托萊斯法，目前却不能施行，因為大商業連政府也支配了。

自托萊斯生長以來，這個政綱已成了弱小資本家們的烏托邦政綱。事實上，牠就是回到小規模生產時代的政綱。這個時代永遠過去了。唯一的道路是前進。人民需要而且也有權利獲得更多和更好的事物。而

要想到這些事物只能藉助於大量生產和在一個廣大和集中的規模上進行的有組織的生產。

問題不是生產的龐大和集中。問題是誰來支配生產。獨占操在幾個驚人富有和有權勢的家族和集團手中，這是在資本主義制度之下的一種不可避免的發展。在資本主義的『自由企業』的制度之下，大沙魚吞掉小沙魚。這就是參議院委員會的報告證明毫無問題的事實。

但今天僅僅用來令獨占家們發大財的大工廠、大事業，同樣也能够用來為大眾謀利益的——假定支配權從私人 and 私人集團方面剝奪，放在工作人民手中的話。

社會主義的答覆

對於資本主義獨占——牠引起帝國主義戰爭與法西斯主義的諸般害處、牠的蕭條和失業、牠的通貨膨脹、牠的生產限制——唯一的答覆就是社會主義。

大托萊斯和獨占業必須被沒收——從私人的利益中把牠們奪過來。牠們必須變成整個社會的財產。牠們必須在計劃經濟，在工人自己管理之下進行生產。為少數人的利潤而生產必須讓位於為大多數人的需要而生產。

私人利潤制度的完結將是私人獨占業的完結。

美國出版自由下之出版獨占

美國新聞紙、期刊和書籍的出版，具有高度的集中……新聞紙的諸系統操縱了所有日報發行的百分之四十、星期日發行的百分之五十。日報發行總額的百分之二十一操縱在八十一家報紙的大系統手中——海爾斯特系、彼得生·麥高梅系、史克立浦斯·霍華德系、保爾布洛克系、立達系和干尼特系。

三大組織——合眾社、聯合社和國際新聞處——實際上操縱了供應全國的新聞採訪和分發的事業。

而在全美國八百八十六家廣播電台中，有五百零八家操縱在這些大新聞公司手中。（摘自參議院小商業委員會之報告）

印度尼西亞民族解放運動史的研究

李雲編譯

一 民族運動發生的背景 印度尼西亞人的民族運動到一九〇八年才開始發

所謂民族運動，並非僅指反抗，或排斥異民族的暴政及榨取就算。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民族，都很清楚的認識，必須要造成一個獨立的民族，從征服者和支配者的異民族統治之下，解放自己，以建設獨立自主的民族為基礎，來指導這樣的鬥爭的，才可以稱為現代的民族運動。

現在首先把印度尼西亞民族運動發生的基礎及動機來說明一下：

經濟的背景 印度尼西亞七千萬的人口中，從事農業者佔九成以上。但他們只能耕種少數土地，過着半飢餓的最低生活。此外他們有些被歐洲人及華僑所僱用，作農業的勞動者，有些在都市裏當苦力，客商，乞丐等等，至於可以稱為中產階級的中下級官吏，教師，自由職業者和其他小工業者，佔全人口中極少的部份。

政治的背景 荷人掌握一切大權，所謂島民的政治生活，只殘留於他們所住的村落內。一九〇三年，依據地方分權法，允許州及自治市的自治，於是印度尼西亞人才有資格參加政治。一九一七年，人民參議會成立，由島民中選出議員，有的還充當高級官吏。但是全體島民事實上毫無政治權力，一切的政治權力，依然操於荷人的掌握中。

宗教的背景 印度尼西亞諸島的住民，十分之九是回教徒，回教徒的宗教信仰，非常堅強，對於異教排斥最烈，極端歧視荷人所信仰的基督教。歷史上反抗荷人的戰爭，可以說是回教徒反抗基督教的戰爭。所以宗教的信仰的團結，在民族運動上佔着相當重要的地位，是不能否認的。

社會的背景 荷人認印度尼西亞人社會是個奴隸社會。這種蔑視，并非產生於地位不同，或貧富懸殊的社會內，完全是基於人種的優越觀。有句話說：「荷語不配馬來人的嘴，」連學習荷語皆被禁止。到二十世紀民族運動發生後，荷人態度才稍有改變，才替印度尼西亞人開闢初等、中等教育的途徑，設立專門學校，以荷語為教育工具。然而這些動機并非要提

高印度尼西亞人的程度，主要目的完全因產業和行政上的需要罷了。因此，這些人種的不平，和社會的高低，當然會發生民族平等，撤除民族高低的民族運動。這民族運動的原動力，無論在殖民地，半殖民地，都是一樣的。

華僑和印歐人 在印度尼西亞民族問題上所不能輕視的，就是華僑和印歐人的問題。

華僑的數額 自十九世紀末葉起，就高速度的增加着。一八六〇年不過二十二萬人，至一九〇〇年，為五十三萬人，一九三〇年為一百二十三萬人，現在約有一百五十萬人至一百八十萬人左右。彼等不但在貿易、國內商業上佔有優越勢力，就是在砂糖、橡皮、栽培業、小製造業等，也奠定了基礎。這樣不但妨害了住民的商業，甚至連島民舊有的手工業，也一步步被剝奪了。於是印度尼西亞人對華僑的惡感一天天增加，而成爲民族運動主因之一。

不過印歐人問題才確是印度尼西亞特有的民族問題。

父親如果是荷人，其混血兒爲歐洲人。因彼等自以爲白人，態度非常驕傲，不喜就低的職業，因此失業者，貧困者，日漸增多。一九〇〇年，混血兒充當下級官吏及辦事員的，增加了，但是因印度尼西亞人的教育進步，混血兒的經濟地位漸漸被印度尼西亞人所奪取。於是荷人與印度尼西亞人之間發生了擁護印歐人立場的運動。一九二九年，和印度尼西亞民族運動站在同一戰線上，確是值得玩味的問題。

二 民族運動發生的原因 印度尼西亞的民族運動，爲什麼由一九〇八年起始？現在來分析其原因與幾個要素：

知識份子的成長 自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荷蘭在爪哇的行政機關擴大了，少數的荷蘭官吏不敷分配，不得不用印度尼西亞人充當下級官吏，就是土木、衛生、國營事業，教育等，也非借重印度尼西亞人不可。組成印度尼西亞人的知識份子主體者，約有官吏二十萬人以上，地方自

治官吏三十萬人，教員四萬人，和醫師律師記者高等學校學生等等。

一九〇〇年之恐慌 一九〇〇年至一九〇一年間，各種農作物收穫的減少，家畜病的蔓延，咖啡、糖的暴跌等等，荷印全面陷於恐慌狀態，使貧窮的印度尼西亞人經濟狀態，益感不寧。此外，在印度尼西亞因資本主義企業之發達，由土著農民中發生了勞動階級，如各農園之農業勞動者，從事開採錫、煤等之勞動者等等。因所受到的待遇十分惡劣，只能得到一般殖民地人民吃不飽的工錢，於是自一九〇八年起，爪哇的勞動者爲要求改善勞動條件而發生了暴動。

華僑的民族運動 華僑也促進了印度尼西亞人的民族運動，其原因有二：一因華僑被荷印政府利用，對原住民榨取更甚，使印度尼西亞人的民族意識上發生反感，成爲民族運動的對象。二因華僑的民族觀念、覺悟和要求，使荷印當局一步一步地讓步，成爲印度尼西亞民族的良好榜樣。

一八九九年，日本人在法律上享受到和歐洲人同等的待遇，華僑格外受到了強烈的刺激。於是一九〇一年，華僑就組織學校委員會，進歐洲人所開的學校者突然增加。一九〇五年，華僑自創學校，以英語代替荷語。荷印當局深爲恐慌，乃設立以荷語爲教育工具之華人學校，并由財政上、技術上來援助之。一九〇七年，華僑在各地組織華商商會，荷印政府不得不在教育上、經濟上讓步。

一九一一年中國革命，華僑的狂熱，非筆墨所能形容。因荷印當局禁止懸掛新生的中華共和國國旗，各地華僑突然發起反抗運動，在各地暴動。當局雖欲以武力鎮壓，但恐有傷華僑感情，不得已承認設立中國領事爲主要讓步，復取消對華僑活動上的種種限制。

這在印度尼西亞知識份子羣裏是個極好的模範，故有如此一句話：『只要是華人能够辦得到的事情，我們也沒有辦不到的。』無疑地華僑的動作在印度尼西亞民族運動上增強了新的力量。

日俄戰爭和亞洲民族的覺悟 日本明治三十七——八年（一九〇四—五年）的日俄戰爭，強有力的刺激了荷印民族運動的發展。以一個渺小的日本，擊敗了雄稱世界最強大之一的俄國，這勝利喚醒了亞洲各國的民衆要反抗白人的支配。印度尼西亞民族運動就在日俄戰爭後第四年，即一九〇八年，開始發動起來。

三 印度尼西亞民族運動發生的時代 『美麗的努力』的誕生一九〇六

年，爪哇的原住民醫師麥斯·黃亭·斯允拉·烏晒大 (Makherdjawa Mas Wahidin Soediro Oesata) 欲使印度尼西亞人脫離悲慘的境遇，提倡着一種啓蒙運動，主張在爪哇貴族間，首先創立子弟教育基金。這事得到了很大的同情。一方面巴達維亞的醫學專門學校學生，也熱心地支持這個運動。其他有地位者及富有者，凡要子弟入學校的進步分子，也起而響應。他主張組織『美麗的努力』團體，以普及教育爲宗旨的一種教化團體。

因這團體熱心活動的結果，白推查爾呼的農業及獸醫學校，斯拉巴雅 (Soerabaya) 的市民夜校等的學生，陸續地參加，就是多數原住民官吏也很贊成他的宗旨，奇怪的連喬庫着 (Djoekja) 沙羅兩公國的官吏，也紛紛加入。

一九〇八年十月，各支部代表在喬庫着開大會，分成了急進的青年派，和年老的穩健派。官吏支持後者，所以在大會上，穩健派占勝。穩健派——官吏派得勝後，其主要目的非運用直接政治的方法，而是發達教育，督促爪哇人民努力向上。大會後，其勢力更進一步，一九〇九年，該會得到法人資格，有支部四十處，會員超過一萬人以上。

回教系同學聯盟的盛興 爪哇的民族運動的第一個萌芽由知識份子間生長起來，但是第二個萌芽是由瀕於沒落的中產階級中生長起來的。

印花布業在爪哇人的工業中最發達，歷史亦最久。到十九世紀後期，受外來品的競爭影響，復有華人勢力侵入，使經濟更陷於困苦狀態。

一九〇七年麥羅洲刺烏愛翁地方的巨頭赫祺，塞瑪夫弟 (Hadi Samanhedji) 聚集麥羅洲的同業組織回教系同業聯盟，以團體力量，擁護同業的利益，一面抵抗華人的侵入，一面想獲得原住民的獨立地位。因此立刻在各地似雨後春筍般的成立支部，然後成立了聯合會，選舉赫祺，塞瑪夫弟爲聯合會會長。

一九一三年一月二十一日，該會在斯拉白亞 (Soerabaya) 開會，改選巧可樂·阿米諾篤 (Tjokro Aminoto) 爲總會會長，事實上作了全國的指導者。以後勢力逐漸膨脹，無形中消滅了最初的經濟性質，一變而具有政治的性質。一九一五年首先公佈關於成立人民參議會法律，廢除關於政治、結社及集會等法令，而在麥羅洲成立回教系同業中央聯盟。一九一六年正式得到政府承認，成爲名副其實的全國的政治團體。

該會就在一九一六年六月，在盆童 (Bandung) 地方開第一次全國大會，參加者有支部八十餘，會員代表三十六萬人，盛況空前，選巧可樂阿米諾篤為會長。從此該會一躍而為民族運動的唯一有勢力的主體，論性質，最初是穩健的，對統治者荷人取協調的態度；論目的，是緩進地達到印度尼西亞的自治理想。

印度黨 在一九一二年，回教系同業聯盟運動由經濟性一變而為政治性的時期，印歐人和島民知識份子間的急進人物，在盆童地方組織了印度黨 (Indische Partij)，主持者為混血兒獨威斯狄開而 (E. F. E. Pouwes Dekker)。他是在十八歲時參加南非戰爭的一個熱血漢。一九一二年，他發表一篇論文：『我們有久住的天然特權，這是在籍的歐羅巴人，印度人及印度尼西亞人的印度。』他說明由荷蘭來居住者和久住於印度尼西亞者間的利害感情，提倡和久住於印度尼西亞者的協力團結，而主張印度獨立。

一九一四年開創立大會時，總督伊登蒲而夫不但不承認，獨威斯狄開向自己政府宣言的規約反而將其逮捕。因此把印度黨解散了，改為印度尼西亞黨，以最溫和的團體繼續存在着。

四 社會主義的影響和人民參議會的成立 在印度尼西亞民族運動過程中有二個很大影響：一為社會主義運動，二為人民參議會的成立。

回教系同業聯盟給與社會主義的影響 在印度尼西亞輸入社會主義的是荷人 (H. J. F. M. Snee vlie) 到爪哇充當斯瑪倫 (Semarang) 地方的貿易公會書記。而且他在一九一四年五月同蒲倫獨史推狄而 (J. A. Brandseder) 狄開而 (H. W. Dekker) 等協議在斯瑪倫 (Semarang) 地方組織印度社會民主主義聯盟，發行機關報『自由言』 (Het Vrije Woord)，公開活躍於政治舞台上。印度社會民主主義聯盟有少數黨員，起始帶有左傾的革命色彩，一度和『印度黨』提攜，對回教系同業聯盟運動非常注意。回教系同業聯盟的推進勢力是中產階級和農民尤其是富農，被荷人和華人的資本主義支配着的荷印特殊事情，容易傾向社會主義。一九一七年十月，在巴達維亞開第二次大會，決定了該黨綱領中的第二條：『考慮多數印度住民處於悲慘的狀態中，回教系同業的中央聯盟不絕地對萬惡的資本主義 (het zondig kapitalisme) 鬥爭。』很顯明的證明回教系

同業聯盟業已受到印度社會民主主義聯盟的影響。

嗣後荷人技師巴爾斯 (A. Baars) 為荷印共產黨的指導者，計劃曠使斯瑪溫 (Smaoen) 達爾沙諾 (Darseno) 坦·瑪刺格 (Tan Malaka) 等使回教系同業聯盟走向革命的社會主義方面去。因為該聯盟壓根兒非荷印勞動階級運動，實質上仍然是小資產階級的急進運動罷了。

一九一八年大會前，兩派間尙稱融洽。然而急進派攻擊回教系同業聯盟所信奉的回教，結果內部分裂，經過一九一九年十月的第四次大會，和一九二一年三月的第五次大會，意見分歧得愈加激烈。在十月第六次大會時，幹部派攻擊信仰共產主義者為破壞者，指摘反資本主義的活動基礎的口號為不當。結果急進派敗北，加入印度共產黨的回教系同業聯盟黨員被該聯盟開除。由這樣的分裂，號稱有二百五十萬黨員的聲勢赫赫的回教系同業聯盟運動，迅速地衰弱了下來。

人民參議會的成立和民族運動 依據一九〇三年公佈的地方分權法，允許州及自治市有自治權。在州會及市會內，一部份由一般住民所選舉的，與一部份由政府所指定的島民議員，和荷人有同等發言權。

以後回教系同業聯盟和其他民族運動者的政治要求，同時因歐洲大戰爆發，社會的思想的情勢不同，荷政府遂於一九一八年決定成立人民參議會 (Volksraad)。

人民參議會當然不是純粹的議會，是一種諮詢機關。但不可否認的這議會煽動了印度尼西亞的政治熱，增強了民族的政治運動。於是印度尼西亞的政治團體乘機擴張勢力，到一九一七年組織『政治委員會』。

一九一八年十一月，第一次人民參議會開會時，恰巧歐洲諸國的革命風氣抬頭，出席人民參議會的印度尼西亞議員，受此衝動，很嚴厲的抨擊政府，主張擴大政治的權利。十一月十六日，有社會民主勞動黨 (由印度社會民主主義聯盟脫胎之改良主義者政黨的議員庫拉梅爾，提倡組織議員的『急進團結』 (Radicaal Concentratie)，加入了回教系同業聯盟和『美麗的努力』等議員，向參議會和政府提出很多的改革案，甚至要求於一九二一年，在印度尼西亞設立純粹的民主主義議會制度，而且聲明如果不實行，則急進團結對於破壞治安的責任決不負擔。政府不得已設立『印度政體修正委員會』，急進團結的代表也參加此會。

一九二二年，荷蘭的憲法，和統治的行政都修改了，印度尼西亞成

爲荷蘭王國之一部。對於這次的修改，雖然『印度政體修正委員會』的意見也被採入若干，但急進派對此並不滿足。於一九二三年瑪琪溫（M. J. D. M.）大會後，該黨的人民參議會議員，決議排斥人民參議會，對議會活動感到絕望，而加入共產黨的『不合作派』（Non-Cooperators）。共產主義時代，印度共產黨的成立，印度社會民主主義聯盟，自一九一七年俄國革命後，很迅速地完成其革命化，具備了共產黨的實質。因在軍隊內宣傳赤化和黨勢扶搖直上之故，政府藉詞危害治安，於一九一八年十二月，首先驅逐斯耐·弗禮得，其次是蒲倫獨史推。喪失了有力的荷人黨員，該黨的指導勢力當然入於印度尼西亞人之手了。

印度社會民主主義聯盟於一九二〇年五月，在斯瑪倫（Semarang）地方舉行的第七次大會，改稱印度共產黨，推選斯瑪溫爲委員長，達爾沙諾，培爾夫斯瑪，狄開而等爲新幹部，十二月，加入莫斯科的共產黨。一九二三年的印度共產黨，執了民族運動的牛耳。

印度尼西亞的勞動公會運動 印度尼西亞人的勞動公會產生於回教系同業聯盟之後。其發生也和該聯盟同樣，有幹部派和急進派衝突的事情。結果急進派於一九二〇年另外組織共產黨系的『革命的勞動公會同盟』，而且一九二二年由莫斯科歸來的斯瑪溫，企圖再接近原有的勞動公會同盟，隨於九月得到成功。印度共產黨勢力在勞動公會內格外增強了。

一九二二年五千名典當業職工罷工，和一九二三年二千五百名國營鐵道職工罷工，均是該黨一手所造成。於是政府限制結社集會權，並增訂處罰破壞法律的非經濟的罷工條文，復逮捕斯瑪溫。

該黨表面上雖失勢，然其潛勢力仍滲透於各方面。如一九二五年指導斯瑪倫地方的印刷工人和中央市民病院看護人與斯拉巴雅地方的碼頭公司，金屬工業等罷工，甚至推動到爪哇的歐人經營的砂糖工業。政府不得不採取彈壓，再逮捕達爾沙諾等指導者，分別監禁或放逐。以後共黨的活動格外非法，結果爆發了一九二六年的大暴動。

人民同盟（Sarekat Rakyat） 一九二一年共產黨員被回教系同業聯盟開除時候，受其影響的該聯盟的地方支部和支持共產黨方針的回教系同業聯盟的指導者對立。這運動謂『人民同盟』，成爲共產黨的外圍團體。牠對回教採取中立的態度，不妨害教徒參加，也不以信奉共產主義理論爲條件。印度共產黨企圖通過人民同盟，農民小資產階級。

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在喬庫着（Djokja）地方開印度共產黨大會時候，該黨有三十五個支部，一千四百四十名黨員，勢力超過三十六個人民同盟支部的三萬會員。在該大會中，印度共產黨爲強化革命運動起見，把同伴組織的人民同盟解散，盡量吸收活動份子以供驅策。

一九二六年的共產黨暴動 十一月十二日夜巴達維亞等地突然一齊爆發印度共產黨的暴動。在巴達維亞占領電話局，復企圖襲擊監獄，由於軍隊的出動而立刻被鎮壓了。盆培滿州的暴動尤爲激烈，至十二月五日，纔被鎮壓。次年一月一日以八打爲中心在各地暴動，騷擾了整個的爪哇。

自這次暴動後，風靡印度尼西亞的民族運動的共產主義運動，立刻在政治活動上大受挫折，站不住脚。印度尼西亞的民族運動，此後不得不脫離共產黨的影響而向新的途徑邁進。

六 印度尼西亞的獨立要求 『真正』民族主義運動 自印度共產黨毀滅後，無力的回教系同業聯盟，和『美麗的努力』兩黨不能成爲民族運動的支柱，從混亂的廢墟上產生出新的民族主義政黨來領導印度尼西亞民族運動。這完全和從前的運動毫無關係，而以青年學生及知識分子等組成。牠不以解放殖民地被壓迫民族的鬥爭是出於印度尼西亞民族自身的衷心要求去展開民族自立的運動。

說明這新的民族運動——蒲斯開命爲『真正的民族主義』——的諸黨派的動向以前，先把各黨派的母體——知識份子的研究團體介紹一下：印度尼西亞協會 印度尼西亞協會（Perhimpunan Indonesia）脫胎于一九二三年『印度尼西亞學生團』，在政治上是很活動的團體。逐漸的趨向左傾，和印度共產黨有相當關係，並且參加哥米鐵倫領導的殖民地被壓迫人民解放聯盟，一九二六年與該會指導者穆漢默德·赫德和斯瑪溫間成立政治協定，左傾色彩益爲明顯，荷政府隨於一九二七年六月檢舉穆漢默德·赫德等四人，判以煽動革命罪名。結果雖因證據不充足而釋放，但該協會在印度尼西亞知識份子裏却得到崇高的聲望。然而該會的主張和活動却逐漸溫和化了。

研究社和印度尼西亞國民黨 印度尼西亞協會的宣傳和會員歸國後的活動，使印度尼西亞各地的知識份子，多成了研究政治和社會問題的同志。

最早是斯拉巴雅的印度尼西亞研究社，有力的指導者爲醫師斯托滿（Dr. Soetomo）。他的政治信條雖然是民族主義，但比較穩健，他主

要的努力着重於解決具體的經濟問題。並在斯拉巴雅設立信用合作社。一九二七年六月該社以技師斯卡兒諾 (Jr. Soekarno) 為黨魁，組織印度尼西亞國民黨 (Persikatan Nasional Indonesia) 出現於印度共產黨暴動和被彈壓後的混亂政治界，到一九二八年有黨員六千名。該黨不斷和別黨聯絡的結果，在同年十二月間，印度尼西亞研究社等組織印度尼西亞民族政治團體聯合會是印度尼西亞最初的唯一的統一戰線民族運動。

印度尼西亞國民黨為推進統一民族戰線起見，高呼反帝國主義，反資本主義，打倒荷蘭的口號，一九二九年十二月政府逮捕多數黨員，把斯卡兒諾等四名處以陰謀叛亂罪，結果該黨亦隨之崩潰。

印度尼西亞黨 印度尼西亞國民黨副黨首塞爾托諾諾斯卡兒諾宣判後，正式解散國民黨，一九三一年四月在巴達維亞組織印度尼西亞黨，吸收前印度尼西亞國民黨中堅份子，宣傳獨立印度尼西亞的革命的民主主義，很迅速的擁有五十支部和二萬的黨員。

一九三一年末舊印度尼西亞國民黨為了反對塞爾托諾諾而組織反印度尼西亞國民黨，領導者是剛由荷蘭回國的穆默默德·赫德，當時出獄的斯卡兒諾倡論兩派統一而歸失敗，就在翌年八月加入印度尼西亞黨。印度尼西亞黨把貴族、官吏、資本家、知識份子及各階級的印度尼西亞人打成一片，共同參加解放民族的大門爭，而後者注重於無產階級以實現民主主義為目的的運動。僅有十二支部二千餘黨員。

七 民族運動戰線的統一 協力主義的轉移 一九三七年斯滿滿的印度尼西亞民族協會和『美麗的努力』合併組織大印度尼西亞黨，該黨在貴族、富裕階級、知識階級裏很有勢力，在一九三九年改選後的人民參議會佔六位議席，以此為據點而造成最有力的政黨。因為採取溫和、改良主義的方針，對於荷蘭政府印象極佳。

一九三七年和印度尼西亞黨的舊黨員組織印度尼西亞人民運動黨，該黨在綱領上說明『以民主主義的基礎，合法的和政府共同完成政治的目的』。一九三八年三月大印度尼西亞黨和印度尼西亞黨，印度尼西亞人民運動黨等四政黨組織印度尼西亞政黨連絡團體。

印度尼西亞政治聯盟的誕生 一九三六年七月人民參議會通過關於在荷蘭憲法規定範圍內實現荷印的自治要求，在中國荷印代表間設立圓桌會議。

本國議會對此要求，表示反對，而政府也在一九三九年開始拒絕，因此印度尼西亞民族運動的穩健派大失所望，而以新的政治運動為目標，向獲得真正議會運動邁進。印度尼西亞政黨連絡團抓住機會，在一九三九年五月成立印度尼西亞政治聯盟。該聯盟是聯合大印度尼西亞黨，印度尼西亞人民運動黨等七大政黨的大團結。此非政黨的合併，其目的是獲得真正議會的一個大政治運動。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二十五日聚集有關的二十八個團體代表召開第一次大印度尼西亞會議，發表了為獲得真正的印度尼西亞議會而展開大眾運動的目的。這是印度尼西亞民族運動史上劃時代的成功。在會議中決定真正的議會的計劃和民族旗幟。又在翌年二月發表印度尼西亞政治聯盟宣言，但荷政府對此抱極冷淡態度，輕視該運動。

以上是德軍侵入荷蘭本國前的印度尼西亞民族運動的形勢。荷蘭本國的陷落與印度尼西亞民族運動 一九四〇年五月十日，德軍突然開始進攻荷蘭本國。威廉明娜女皇以下政府要人倉皇離國避難倫敦，印度尼西亞的荷人一霎那間失去了故國。荷印政府鑒於本國入於戰時狀態，立即實施戒嚴令，嚴厲監視民族政治運動。

一部份民族運動有名的領導者宣誓效忠威廉明娜女皇。印度尼西亞的各團體對荷蘭表示同情，聲明協助政府，不妨害政府的活動，延期實行民族運動，而以協助的代價要求擴大印度尼西亞人的政治權利。

八月八日印度尼西亞政治聯盟在巴達維亞召開全體會議，要求荷印總督及人民參議會給與真正議會。并根據緊急法令決議立即把人民參議會改造成為真正的議會。十月中旬各黨代表在巴達維亞開會展開結成實現真正議會同盟的簽字運動。一方面人民參議會也要求設立王國評議會和其他改革案等，結果政府承認設置政治改革調查會，並把歷來的土著稱呼改稱印度尼西亞人。

彈壓與軟化政策 荷印陸軍司令官在本國淪陷後，一面施行戒嚴令，一面自六月十日起開始檢舉印度尼西亞人民運動黨和穆默默德·赫德領導的印度尼西亞國民黨的殘黨幹部，七月逮捕印度尼西亞回教黨員，禁止發行有民族意識的報紙、雜誌等嚴厲彈壓，同時對民族運動幹部運用軟化政策委任民族運動者為各省長官、高級官吏、市長等來削弱並分散印度尼西亞的民族獨立運動的力量。

第一次世界大戰與社會民主黨

(續)

盧森堡著
子規譯

二 八月四日德國社會民主黨議員團的變節和改變論調

現在，我們是面對着戰爭的事實，我們在受着敵國將要侵入的威脅。現在我們不再是對於戰爭贊不贊成的問題，而是對於防衛國土所必需的軍費問題，不得不議決了。假如那個以最優秀的國民的血染污了自己的俄羅斯專制政治，反而得到了勝利，那對於我們的國民，我們的自由的未來，即使不是全部，一部分總是要瀕於危殆。爲防止這個危險，就不能不期待我國的文化和獨立的安全。這就證實了我們平日所說的：『我們到了危急之秋，不拋棄我們的祖國。』不待說我們是要和國際一致，拒絕參加一切的侵略戰爭。但這樣的時候，國際也常常覺得：國民的獨立與自衛，是各個民族的權利；我們是和這個意見一致的。……基於上述的根本理論，我們贊助戰時公債的提案。

和這宣言同時，我黨的議員團，在八月四日發出了足以決定和支配德國勞動階級態度的標語：『爲祖國的危難，爲國民的防衛，爲生存、文化和自由而戰！』這是社會民主黨的議員所發出的標語！由這標語出發，其他的一切——黨和工會的機關報的態度；愛國的愚蠢的騷動；舉國的一致；突如其來的國際的解體等等，都不過是單純的結果。一切都是由於議會所決定的方針的不可避免的結果。

假如一個戰爭，真是與國民的存在、國民的自由有關，而這又是一點武器所能防衛，而且又是神聖的國民戰爭，那麼，一切都明白，一切都非忍受不可。凡是要達到目的的人，當然要要求手段。戰爭是像一個有技術組織的巨人所幹的殺戮行爲。而去實行組織的殺戮的時候，對於一般大眾，不能不製造和這殺戮相應的興奮狀態。這是從古以來所有的交戰者所不可或缺地用過的方法。實行的狂暴，適應思想感情的狂暴；思想感情的狂暴發於實行的狂暴之先而又要伴隨於其後。所以八月二十八日，哇勒·牙可白以德國的打殺者的漫畫；黑姆尼茲、漢堡、共爾、佛蘭克福、哥堡及其他各地的黨機驟報，以它們的詩和文，來煽動愛國的情緒。對於還可能挽救他們的生存

與自由的無產階級，施以精神的麻醉劑；而對於俄羅斯、法蘭西、英國的兄弟，則在他們的胸坎裏插進一把兇器。其他一切的煽動新聞，又比他們更徹底，竟要求領土的合併；這簡直是想將戰爭與人道、殺戮與博愛、軍費的表決與社會主義的各國民間的和平，混爲一談。

但假如八月四日德國社會民主黨議員團所發出的標語，完全正當，那麼，勞動階級的國際，不但對於這一次的戰爭，即對於一般的戰爭，都將要承認。近代勞動運動成立以來，到此才開始在無產階級國際共存的法則與各國國民的自由、生存的利益之間，橫着一條深淵。我們才開始發現各國國民的獨立與自由要受限制；各國的無產階級要互相格鬥，互相殺戮。我們一向都相信各國國民的利益與無產階級的利益是調和一致，是同一的東西，不可能互相抵觸。這正是我們的理論與實行的根據，也就是我們向大眾宣傳鼓動的精神。果真我們的世界觀，在這麼重要的點上，犯了絕大的錯誤嗎？這的確是我們國際社會主義的死活問題了。

世界戰爭，並不是我們國際理論的最初的試驗。我們的黨，已經在四十五年之前，經過了第一次的試驗。那個時候，一八七〇年七月二十一日，老里布克內西和倍倍爾在北德意志議會，發表了如下的歷史的宣言：

一八六六年的戰爭，是爲了荷亨索倫皇朝的利益，同樣，這回的戰爭是爲了波拿巴爾特皇朝的利益而進行的統治者的戰爭。我們對於進行這個戰爭而向議會要求的軍費，不能表示贊成。因爲假使我們贊成了，無異對於那個發動一八六六年的侵略而造成這次戰爭的端緒的普魯士政府，給予信任的投票。

同樣我們也不能對於所要求的軍費，表示否決。因爲假使我們否決，對於無廉恥的波拿巴爾特的政策，恐怕會被人看作我們在承認了。

但是我們不問國籍如何，要向所有的壓迫者作戰，想將被壓迫者團結成爲一個大的兄弟團體，我們站在統治者戰爭的第一個反對者的地位，我們站在社會共和黨員、國際勞動團體的加盟者的地位，我們無論直接或間接，對於這回的戰爭，不能表示贊成的意思。因此也就不能參加投票。我們要表明我們底有確信的期待，使歐洲各國的國民，受了這一回慘事的教訓，爲了獲得自主權；爲了剷除

各國的軍隊，在各個戰場上，都必須全力以赴的。

德國無產階級的代表，在國際的旗幟之下，以上的宣言，使之明瞭真相而無疑義的餘地。而對於法國的戰爭，明快地說破它不包含國民或自由的性質。倍倍爾在其回憶錄中說，如果第二年才知道的事情，在投票的時候就已經十分了解，那對於軍事公債，也許會得到反對的決議。這話是大家所知道的。

在那次的戰爭中，一切公平的資產階級，以及國民中出奇的多數，都被當時俾士麥的策略所籠絡，都以爲戰爭是德國的死活問題，而欲使社會民主黨的指導者，離開他的立脚地。國民死活所關的利益，與國際無產階級的階級利益，是同一的東西，兩者都是反對戰爭。今日的世界大戰，到一九一四年八月四日的社會民主黨議員團，才開始顯露出國民的自由與國際社會主義個別存在這種可怕的進退兩難之狀。

可是我們議員團的聲明書中所表現的事實，則無產階級政策的基本方針，無論怎樣，是一種突發的啓示。那僅僅是八月四日皇帝和首相演說的翻譯和單純的反響。皇帝的演說中有這樣的話：『我們不是侵略的野心所可動搖的。使我們奮起的，是上帝已經賜給了我們的土地，是我們爲了本身，爲了我們的子孫，必須防衛的一種不屈不撓的意志。卿等大約已經唸過發給你們的那張印刷品，牠上面已經寫着，我的政府——特別是首相，一直到最後的一秒鐘，都在盡力避免採用非常的手段。我們爲了防禦迫在眉睫的危難，我們要以清白的良心，清白的手來握住我們的寶劍。』而白德曼·荷蘭魏格就說：『諸君！我們現在不得不防禦危險，這危險是難以測量的。像我們所受的這樣嚴重的威脅，祇有爲最高的目的而戰的人，才可以打開活路。我們是爲了和平的努力必須有結果，爲了我們過去偉大的遺產和我們的未來而戰。』這與社會民主黨下面的聲明，正是同一內容的：

(一) 我們爲了維持和平，盡了各種努力，戰爭是從外部強加於我們的。

(二) 現在已經開戰，我們必須防衛自己。

(三) 在這戰爭中，德意志國民的一切都瀕於危境。

我們議員團的聲明，說起來正是政府的聲明的精製品。如同白德曼·荷蘭魏格對於和平的外交的努力，如同皇帝的通電一樣，議員團便以戰爭勃發前社會民主黨爲和平而舉行的示威運動，作爲主戰的辯解口實。皇帝表示他毫無侵略的野心，同樣我們的議員團嘴上也掛着社會主義，反對侵略戰爭。

這股和首領叫出我們是爲最高的目的而戰的時候，社會民主黨的反響是：

『我們不知道有黨，祇知道有德意志。我們國民整個都瀕於危境，我們在危急之秋，不可拋棄祖國。』這都載在他們的聲明書中。祇有一個地方，社會民主黨的聲明書與政府的樣本稍有不同，那就是他們用那在變節之前常用的一句口頭禪，以爲俄羅斯的專制政治，實爲德意志的自由威脅。然而皇帝的通電中，關於俄羅斯是出之以感傷的口吻：『對於幾次戰爭中曾經互相提攜的鄰邦，而必須動員我的軍隊，真是痛心不過的事。德意志一向忠實地所守着的友誼，現在竟被破壞，不勝遺憾。』社會民主黨議員團對於政府的聲明所表示的唯一的獨創之點，就是將戰爭昇格爲民主的，把牠變成爲國民的光榮，發揮了社會主義的革命的傳統。

如上所述，這一切都是八月四日突然之間，才被社會民主黨所瞭解的。在這一天之前，在戰爭實際爆發的前夜，他們口上所說的都和議員團的聲明相矛盾。李爾魏魯在七月二十五日與國對塞爾維亞發出最後通牒的時候，這麼說過：

他們正在要求戰爭，即維也納宮廷裏很得勢的那個無良心的行爲。他們之要求戰爭，可以從一星期以來那些黃黑色煽動新聞的狂暴的吼叫中聽出來。他們是希望戰爭。奧國的最後通牒，表明了這個，而且是向全世界暴露。由於精神錯亂的熱狂者的狙擊，使斐迪南和他的妃子流了血，但是這難道再使幾萬的勞動者農民流血，在瘋狂的犯罪之上再加重瘋狂的犯罪，也不在乎嗎？奧國對於塞爾維亞的最後通牒，實在是對歐洲四面放火的火柴。……

因爲奧國對塞爾維亞的最後通牒，它的文體和它的要求，都極爲倨傲。塞爾維亞政府處此難局，虔誠地表示讓讓；而奧國簡直像是要求它即刻和它的國民分離。……

喚使野心侵略的忠實盟友，去實行這樣罪大惡極的行爲的，是德意志帝國的各種報紙；而白德曼·荷蘭魏格，一定約過了福爾希爾德，必要時會給他做後援，那是毫無疑問的。而同時柏林也在進行危險的賭博，和維也納一樣。

七月二十四日來布起的國民新聞：

奧國的軍隊，正在進行以全部下注的大賭博。因爲世界上無論那個國家，如果要進行民族的軍國主義的侵略主義，必定要喪失一些東西。侵略主義的集團中，奧國特別陷於破產的狀態。他們想隱蔽經濟的破滅，以戰爭的掠奪與殺戮，來充實他們的金庫。

同日德勒斯登的民聲新聞：

第一，維也納外交部的煽動者們，應該負責提出確實的證據，證明奧國向塞爾維亞所提的要求是正當。

如果做不到，那就是奧國政府，在全歐洲各國之前，由於她那挑戰的暴行，陷自身於不義。然而即便在塞爾維亞政府的承認之下，認為塞來屋的暗殺是有計劃的舉動，而那逆鱗上所載的要求，也還是從頭到尾，逸出了常軌。一定是有意辣的戰爭企圖的政府，才可向別的國家，提出這樣的不正當的要求。

繆黑尼·波斯特七月二十五日的論說：

這個奧國通牒，是過去兩百年間無可比擬的文件。奧國所提出的要求，簡直是說：內容還沒有向歐洲大眾發表的今日，皇儲夫婦的暗殺者，還沒有採用任何公式的審問，僅僅根據德密調查書，對於塞爾維亞，叫她如果是承認的話，她就自殺。

修勒斯維·荷修丹國民新聞，在七月二十四日如此地說：

奧國向塞爾維亞挑戰了。奧國想作戰，她犯了使歐洲浸沉於血海的罪惡。奧國在賭着要就全部，要就精光的大賭博。奧國在向那少總有一點軍備，無論如何也不能忍受的塞爾維亞挑戰。所有的文明人，不可不竭力反對奧國支配者這種無廉恥的態度。勞動者不待說，祇要稍為以和平和文化放在心上的人，都要極力阻止維也納所發生的殺人狂的影響。

七月二十五日馬格德堡的民聲：

塞爾維亞政府萬一接受這樣的要求，即刻就會和議會、國民隔離的。奧國的行動，可惡透頂了。白爾多特以那樣橫七八道的要求，逼迫塞爾維亞政府以及歐洲……

我們不可以計劃這一個將要擴大為世界戰爭的戰爭。如果不願意損害全世界的安寧，採取這種行動是很難的。我們不能作道德的侵略或隔岸觀火。所以歐洲諸國的報紙以及諸國的政府，對於奧國政治家的傲慢瘋狂，一定要澈底地責難。

七月二十四日佛蘭克福的民聲：

奧國政府相信斐迪南是最可信賴的良友，他死之後，想向塞爾維亞人復仇。王權至上論者的報章，藉德國的主戰論者做靠山，從事鼓勵，言論日更粗暴。奧國政府便以驕傲無比的持辭，萬萬不能接受的要求，向塞爾維亞發出最後通牒。同日的愛爾貝斐德·非來爾·布勒色：

根據半官方的維爾佛新·彼羅的電報，塞爾維亞對奧國的要求正在抄錄。據這電報說：奧國的當局，極力在發動戰爭。因為昨夜送給貝爾格萊德的通牒，是要求塞爾維亞做奧國的保護國。而在這燃眉之急的時候，德國的外交家，以為對這不正當的要求，不能有一指之助；因此使得維也納的主戰論者，理解奧國的

主張，有撤回的可能。

作林根的白爾給修·阿爾伯特·修丁默：

奧國想和塞爾維亞作戰，便以塞來屋的暗殺使塞爾維亞負一惡名，而作為道德的口實。但是這企圖太過於拙劣，到底不能瞞住歐洲的輿論。

但若維也納外交部的通牒者，相信在開戰之際，俄羅斯會參加作戰，三國同盟的德國、意大利，一定會援助他們，那卻是大大的錯誤。意大利在亞得里亞海和巴爾幹，祇想握那競爭者的奧國的弱點，決不會幫助奧國來燒焦自己的指頭。而德國的當局，即使他們有那麼蠢，想參加戰爭，敢於以國內精銳無比的兵士的生命，為了無廉恥的哈布斯堡皇家的侵略戰爭而犧牲，那也會招致國民激烈的反對。

我黨的機關報，在戰爭勃發一星期之前，對於戰爭是這樣的看法。他們所論列的，不是德國的自由與存在，而是奧國軍閥兇惡的冒險。他們不認為是爲了自由，爲了正當防禦，爲了國民的防禦而被強迫作戰；而是在對於塞爾維亞的獨立與自由，加以暴戾的威脅。

然則這麼明瞭，這麼普遍的社會民主黨的見解，爲甚麼八月四日會突然變卦？那僅僅因爲出現了一個新事實，那就是當天德意志政府向議會發出的報告書，那第四頁上這麼寫着：

在這種情形之下，今後奧國如果對於國境方面的行動，仍舊拱手旁觀，那對於她本身的威信與存在，必然是難以忍受。奧國政府把這種見解報告我們，而且要求我們的同意。盟邦對於時局所下的判斷，我們是表示贊同。盟邦對於塞爾維亞所進行的威脅奧國的存在運動，認爲有行動之必要，我們保證她必能獲得我們的承認。固然，奧、匈帝國萬一對塞爾維亞出以軍事行動，俄羅斯如果參戰，我們爲了同盟的義務，一定會捲入戰爭的漩渦。但是我們眼着奧、匈帝國利益的陷入致命的危境，而總想他們對於損失國家威信的事讓步；或者是讓他們臨到這樣的難局，而拒絕予以援助，這無論如何是不忍的。而由於塞爾維亞之繼續進行其陰謀，對我們自身利益威脅最大，那同樣是不能容忍的。假如放任塞爾維亞得到俄羅斯和法國的援助，而威脅鄰邦的存在，其結果奧國必至漸次衰頹，全斯拉夫民族入於俄羅斯的羈絆，日耳曼民族在中歐的地位，一定難以維持。假如奧國的勢力被削弱，因俄羅斯的訊斯拉夫主義的伸張而至於崩潰，那時我們東部西部所受的威脅日增，在對抗這日增的威脅時，雖然十分需要盟邦，然而奧國對於我們的幫助，已經是不足道，不足信賴了。所以我們務使奧國對於塞爾維亞完全自由行動，至於有沒有準備，沒有甚麼關係。

上面的文字是八月四日提出於社會民主黨議員之前的，這是全報告書

(白色報告書)中最有重大影響的章句，是德意志政府聲明的重要點。同一時期其他的黃色、灰色、青色、橙色的報告書的全部，關於戰前的外交史和誘發戰爭的直接原因等等的說明，都漠不關心。此時我黨的議員團，手中握住了對時局下判斷的鎖匙。在一星期之前，全部社會民主黨機關報，都是大聲疾呼，以奧國的最後通牒為導發世界戰爭的不法行為，希望德國政府對維也納的主戰論者，講求適當的防止方法。德意志社會民主主義者和大眾，都相信德國政府在奧國的最後通牒之後，在專心一意地為歐洲的和平而努力。所有的德意志社會民主黨的機關報，都認為這個最後通牒，對於德國政府和一般德國人，正是晴天霹靂。然而政府的報告書，直截簡單地這麼表明：

(一) 奧國政府在對塞爾維亞行動之前，得到了德國政府的同意。

(二) 德國政府深知奧國的行動會和塞爾維亞開戰，而且會勃發歐洲戰爭。

(三) 德國政府不但不懲息奧國讓步，相反地聲明如果奧國軟弱讓步，對於德國是不見信賴的同盟國。

(四) 德國政府對奧國極力保證，如果奧國對塞爾維亞採取行動，無論怎樣的場合，都會予以軍事的援助。

(五) 最後德國政府使奧國不必因最後通牒有誘發世界戰爭的可能而有所顧忌，使奧國完全有行動的自由。

我們帝國議會的議員團，在八月四日全聽到了這些了。而同一天又從政府的口中，聽到了德國的陸軍，已經侵入比利時了。可是社會民主黨的議員團，却斷定德國的侵入外國，是防衛德國，是爲了祖國的存在，爲了抵抗俄羅斯的專制政治，爲了文化與自由，才起而作戰。

戰爭的明瞭的背景，它那已經暴露了的表面，戰爭爆發前纏綿的全部外交技巧，陷害德國入於生死的苦鬥，招致憔悴、頹廢、奴化的魔鬼世界的叫喚，——所有這些，對於德意志的社會民主黨，難道可視為驚奇的偶發事件；在它那銳利的批判的精神上，竟是過重的要求的提示嗎？這在我黨，斷斷乎不可以這樣。我黨已經經歷了德意志的二次戰爭，從這兩次戰爭裏面，可以吸取意味深長的教訓。

在今日，無論是誰，祇要學過了初步的歷史，都知道一八六六年對奧國進行的最初的戰爭，是俾士麥很久以前就已有計劃地準備；他的政策的施展，從開始一直到開戰，都是爲了對奧國作戰。皇太子——後日的非特烈皇帝在這一年的十一月十四日的日記中，記下了宰相的意見：

(俾士麥)那使得俄羅斯與奧國開戰的計劃，已經完成了他的職務，可是在適當的時期未到之前，常常是不讓陛下太早知道。

奧愛爾在他的小冊子『色當的祝賀與社會民主黨』之中，這麼說道：『吾人可以這告白與威廉王向國民發出的告示比較而觀。』那告示說：

現在奧國和德意志的大部分，已向我們執戈。我們以為德意志的土地，有使之脫離外國羈絆的必要，所以我基於自由的意志，忘了舊時的怨恨，與奧國皇帝深深締結盟邦的交誼。邇來僅僅數年，我的期待早已被欺騙。奧國她很難忘記她的諸侯曾經支配過德意志的土地；她不願意承認正在強有力地發展着的年青的普魯士爲她正當的盟邦；她想把普魯士看作利害不相容的競爭者。她那可惡的利己心，再度發出炎炎的火焰，欲使普魯士招致衰頹、滅亡和恥辱。對於他們，盟約再沒有效用，她已經爲了討伐普魯士，召集了德意志的同盟諸侯，同盟已經發生了破綻。無論從那一方面觀察德意志，我們已經陷在揚着打倒普魯士的鬨聲的敵軍包圍之中。

威廉王在這正義之戰中，要祈禱上帝的祝福，便以七月十八日爲國民的祈禱日，在這一日這麼說：『我努力想使我的國民享受和平的祝福，而竟沒有合於上帝的旨意。』

假如我們的議員團，沒有將黨的歷史完全忘却，那麼對於八月四日戰爭勃發時政府的伴奏，那些久已聽慣了的音樂和辭句，那些活生生的往事，難道不回憶一下嗎？

不僅此也。一八七〇年接着和法國發生戰事，在歷史上這戰事的勃發和一個文件有不可分離的關係。這個文件便是那個恩塞爾的電報，那是所有的資產階級的政治學在戰爭發生時的典型的暗號，也是我黨的歷史中很有意義的插話。當時暴露戰爭是怎樣開始，向大眾指示，完成了他的使命與義務的人，就是老里布克內西和德意志社會民主黨。

『僅僅是以防禦祖國爲目的而開戰，』這話至少不是俾士麥發明的。他不過是以獨特的決斷力，蹈襲了一般資產階級政治學的舊的國際的方策。所謂輿論做成了政府的劃策的一個機能以後，若說各交戰國僅僅抵抗敵國的強烈的攻擊，僅僅以防衛祖國和正義爲目的，雖然心裏憂痛，而決不把劍解下紐帶來，這樣的自衛戰爭，何時何地有過呢？這樣的傳說，和火藥、大砲一樣，對於戰爭是不可缺少的。這樣的把戲已經太陳舊了，唯一新鮮之點，就是社會民主黨參加在內。

秦漢大一統與先秦諸子的結局

嵇文甫

一 秦漢社會的新局面與思想界的

自然淘汰

誰都知道先秦時代是中國學術思想史上的黃金時代。當時思想界五光十色，各放異彩。但一到秦、漢時代，忽然黯淡下去了。於是就有人說：古代學術滅絕，全壞在秦始皇一把火。又有人覺得這樣講法未免把歷史看得太簡單，於是另提出許多理由來解釋先秦諸子為什麼滅絕，如什麼「懷疑主義的名學」啦，「狹義的功用主義」啦，「專制的一尊主義」啦，「方士派的迷信」啦。其實先秦諸子果然滅絕了嗎？我以為他們並沒有滅絕，而只是轉化；並且這轉化的原因，既不在秦始皇的一把火，同樣也不是專就思想論思想所能說明的。在第一章，我們說諸子學說是從周末社會大轉變中自然湧現出來的。那末，隨着秦、漢間社會局面的穩定，而思想界亦逐漸穩定下去，這不是當然的推論嗎？所以要考察先秦諸子的結局，必須注意他們和當時整個社會局面的關係。

從前幾章所述，我們知道先秦諸子各以其社會階層的代言人而出現，好像舞台上的演員一樣，都各有自己的觀眾，為他們喝采叫好，倘若他們抓不住羣衆心理，叫不起座來，那末他們只有停演。當戰國時代，中國原始的封建社會剛剛崩解，正在大變革的過程中。究竟將來要變成個怎樣的社會呢？在將來的社會中，要以那些階級的人物作主腳呢？當時尚未會決定。因此各階級的代言人都出來說話，各思「以其道易天下」，遂形成百家爭鳴的局面。從後世看來，諸子說儘有空談怪論，簡直沒有實行之可能。然而當時居然有人聽信他們。譬如禪讓說，在當時就鬧得煞有介事的。梁惠王、燕易王，都曾試驗過。他們居然都要學堯、舜。又如許行的並耕說，居然能使陳相「盡棄其學而學焉」。這些學說，在後世認為可望而不可即，只當作一種好聽話頭。但在當時却具有現實性，具有很大的吸引人的魔力。那時候思想龐雜極了。究竟誰說的有實效，究竟社會要照着誰所指示的路走，實在使人迷惘難

識。然而歷史把這個問題解決了。在秦、漢大一統的局面下，思想界來了個自然淘汰，諸子學說凡不能適應這個新社會秩序的，都隨着自己喝采叫好者的失勢，而一一退下歷史的舞台了。

我們應該知道，秦漢大一統局面的形成，是自由地主作支柱的。當春秋時代，秦國還是個落後部族，中原諸國都以夷狄視之。可是一到戰國，他忽然強盛起來。他攻打各國，如摧枯拉朽。山東諸侯完全失掉抵抗能力。這是什麼原故呢？自然，這個問題的關鍵在乎商鞅變法。如第五章所述：「商鞅的政策，強公室、杜私門、明法令、務耕戰，一方面摧毀封建貴族的勢力，一方面為自由地主打開發展的前途，其政權性質顯然是代表自由地主的。」這些政策本不是商鞅所自創，李悝、吳起等早已施行於魏、楚諸國。但因這些先進國中傳統的舊勢力太大，所以新政策不能澈底的推行。倒是落後的秦國，痛痛快快的來了一個大改革，反跑到前面去了。新政策施行的結果，使秦國生產力大大增加，而軍隊的成分亦大大改變，生氣潑辣，一意進取。比着山東諸國輾轉纏繞腐化魚爛於舊封建勢力中而不能自拔者，迥然不同。秦國對六國的戰爭，乃是一個新社會對一個舊社會的戰爭，或者說一個新世界對一個舊世界的戰爭，乃是新興自由地主對舊封建貴族的革命戰爭。好比拿破崙憑藉法國新興資產階級的勢力鞭撻舊歐洲一樣，商鞅、李斯、白起、王翦、秦始皇，亦憑藉秦國新興自由地主的勢力鞭撻舊中國。秦國之所以轉弱為強，山東諸國之所以由盛而衰，不僅由於幾個政治家的活動，乃是和當時整個社會轉變形勢相關連的。

自秦朝統一以後，自由地主的統治確定了。秦始皇、李斯輩本着自由地主的觀點，「別黑白而定一尊」，積極的來了個文化統制。在這種局勢下，最活躍的當然是代表自由地主思想的法家。試取韓非學說和秦朝實際政治相比較，就知道秦朝所走的完全是法家路線。「以法為教」、「以吏為師」，其極端至於焚書坑儒，這可以說是法家主張的完全勝利。但是法家的獨佔局面是不能常保的。當秦朝末年，引起個農民大暴動，顛覆了法家的政權。繼起

的漢朝統治者，乃在「新舊雜用」，由法而轉歸於儒，終於達成個儒術獨尊的局面，支配中國歷史者千數百年。這個從法到儒的推移過程該怎樣說明呢？難道漢朝政權變了性質，不是自由地主的政權？為什麼秦朝算法而去儒，而漢以後反獨尊儒術呢？我以為要解答這個問題，須從自由地主的地位變遷上着眼。當春秋戰國間，中國原始封建社會剛剛崩解，而向來佔統治地位的封建貴族還有很大勢力。所以那時候新興的自由地主，和舊來的封建貴族是對立的。他們想爬上統治地位，就必須和貴族鬥爭。他們對於傳統的貴族文化持破壞態度。他們是進取的、革命的。試看法家反對德化，反對仁義孝弟，那樣的猛烈大胆。秦朝採用這種學說，遂想把傳統的貴族文化一掃而空，他們的措施是富有革命意義的。但不久秦朝的革命任務完畢了，自由地主的統治地位確定了。現在他們當前的問題，不在怎樣戰勝各階級以取得統治地位，而在怎樣懷柔各階級使他們安心受他的統治；不在破壞傳統的貴族文化而在吸收古代統治者的文化遺產以供自己的利用。從這種意義上說，法家的武斷政策就不盡適用了。賈誼論秦朝滅亡的原因道：

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過秦論上）

這個『攻守勢異』，我們可以說不僅是政治的，而且是社會的、文化的。從來歷史上的革命階級，當其未取得統治地位以前，無論在政治上、學術上，他們總是持攻擊的破壞的態度；但一到他們的統治地位確定了，就該轉向和平建設方面，這簡直成了一個歷史公例。秦朝違反了這公例，所以不久就失敗。漢朝的統治者學乖了，雖然『以馬上得天下』，却知道『不能以馬上治天下』，知道『詩書』也有很大的用處。在這種時勢推移下，為古代貴族文化保持者的儒家，居然又受到新統治者的垂青了。從春秋末年，到漢武帝時代，一個社會大變遷，以原始的封建貴族崩潰始，而以自由地主的統治大告成功終。其在思想上的反映，則以百家爭鳴始，而以儒術一尊終。儒家在中國歷史上常佔統治者地位不是偶然的，他是以貴族化了的自由地主為其支柱的。

除儒、法兩家外，在秦、漢間佔相當勢力的還有陰陽家和道家。陰陽家是儒家的別派，是一種新貴族學說。他和儒家合流，而為新統治者所採用，自無足怪。至於道家的得勢，情形較為微妙。我們已經說過，道家學說是小農思想的反映。當秦朝末年，山農民暴動顛覆了秦朝的政權。這時候農民勢力當然很膨脹。漢高帝以流氓出身，收穫了農民革命的果實。自他開國以至文景時代，幾十年輕徭薄賦寬簡不擾的政策，大體上總算能顧及農民的利益

，適合農民的脾胃。當時黃老學說，甚為風行，也是自然的趨勢。不過我們應該注意，漢初政權並不像某些人所說的是什麼農民政權。漢高帝雖原在農民的隊伍中，但在其得志以後，早轉向地主方面去了。這是中國歷史上每一次農民暴動後所常走的路徑，並不只一個漢高帝。其所以還頗能顧及農民利益者，仍由於剛起過暴動的農民還具有相當威力，為鞏固地主政權起見，對他們亦不敢過於漠視也。在這種情勢下，本係代表農民思想的道家學說，乃一變而為『君人南面之術』。這種微妙的變質作用，下節還要提到的。

周末顯學到秦、漢大一統以後被淘汰下去的，除農家墨花一現外，還有墨家和名家。墨家以無產羣衆為基礎，其任俠行動，集團勢力，當社會大轉變時代自然可以特別活躍。可是一到新統治者上台後，對於這些危險份子是不肯寬容的。所以墨家盛興於戰國，到漢初就漸漸消聲匿跡了。至於名家，是市民思想的反映。自周末以後，商業都市日漸繁榮，市民勢力日漸擴大。照這樣說，名家似乎該繼續發展了。然而事實上並不如此。秦、漢以後，統治中國社會的是自由地主，而並不是市民。那班自由地主雖然往往是『以末致富』，但終究還歸到『用本守之』。中國商業資本的發展，只攪亂了原始的封建社會，却並沒有把這個社會推進到一個更高的階段。他的作用是破壞的，而不是建設的，所以反映市民思想的名家學說，只能在摧毀舊封建文化時顯示其革命的破壞的作用。及自由地主的統治地位確定後，這種破壞性的學說自不能容其存在了。總之，各學派盛衰消長之故，複雜幾微，而都和整個社會變遷有關係；好像歷史上有一種自然的濼瀾作用一樣，並不是偶然的。

二 諸子學說的蛻變與混合

如上節所述，先秦各學派，因自然淘汰的結果，有的興盛了，有的衰滅了。這還只是大略的說法。其實這些學派並不是簡單的一盛而一衰，乃是適應着當時大一統的社會局面，各自蛻變其原形，而逐漸接近，逐漸混合起來了。我們知道先秦諸子主張都極鮮明，彼此尖銳的對立着。隨便一件小事，他們都各有各的看法。如『韓非子』難一、二、三、四中許多故事，處處顯出儒、法兩家的衝突，就是明證，但經彼此磨擦的結果，各自的極端性逐漸失掉，遂形成思想界的混一局面。首先有呂氏春秋作一次大綜合。其後如司馬談論六家要旨，加漢書藝文志，雖然他們也未嘗沒有自己的中心思想，但

總都持一種調和折衷的態度。我們試把這幾種著作的內容分析一下：

一 **呂氏春秋** 這是由呂不韋集合衆賓客在一種整個計劃下編製成的一大思想體系。書中對於各學派，兼容並包，斟酌去取，大體說來，吸取道家的自然主義，而並不絕禮樂學；主張法家的變法哲學，而並不反對孝、弟、仁、義；於儒家取其修行而不取其法古；於墨家取其節葬，而不取其偃兵；闢名家之「淫辭」而仍時稱述其巧辯；用陰陽家五德終始之說，却未嘗大縱迂怪之談；乃至宋輕、白圭等的學說，亦各有所採摘。例如：本生、重己、貴生、情欲等篇，分明是道家全性、葆真、貴我、賤物的學說。但是在爲欲篇却說：

使民無欲，上雖賢者不能用。夫無欲者，其視爲天子也與爲與隸同，其視有天下也與無立錫之地同，其視爲彭祖也與爲殤子同。天子至貴也，天下至富也，彭祖不壽也，誠無欲，則是三者不足以勸，與隸至賤也，無立錫之地至貧也，殤子至夭也，誠無欲，則是三者不足以禁。……人之欲多者，其可得用亦多；人之欲少者，其得用亦少；無欲者，不可得用也。

這是要利用人的「欲」以行其賞罰而統治天下。假使人都「無欲」，誰還爲君所用，那就正應着韓非所述「吾誰與爲君」的話了。這分明是法家的看法，恰和道家學說對立着。道家學說本來是小農思想的反映。其所以主張貴我賤物，全性葆真，主張「無欲」者：一方面是要揮開物質世界的壓迫，找一個精神避難所；一方面却也是對於統治者的一種消極反抗。那知道這一着竟被當時新興的統治者窺破了。他們偏不教人民「無欲」，却反而要利用人民的「欲」以行其統治之術。不僅如此，他們竟把農民的武器奪在手中作爲自己的武器，他們自己倒講起「無欲」來了。於是本來代表農民思想的道家學說，除爲統治者個人存神養生的一劑清涼散外，還成爲一種「君人南面之術」。在這一點上，試看韓非子，已經是大講虛靜無爲。至呂氏春秋中，如君守、任數、勿躬、知度等篇，正是韓非子中所講的「術」。太史公說申韓「原於道德之意」，在這些地方表現得最明顯：在這些地方，道家爲法家所「揚棄」了。

在呂氏春秋中，不僅法、道合流，並且他們和儒家也都調和起來。照極端的道家說，應該「絕禮樂學」、「絕聖去智」，照極端的法家說，更是刻薄寡恩，任法而不任人，明目張膽的反對仁義。儒家的博學篤行，和他們是衝突的。然而像勸學、用衆、不苟、自知等篇，分明是儒家學說。尙自然而不廢學，任法而又任人，這是儒家和道、法兩家的合奏。至於像察今和樂成等篇

的變法哲學，極鮮明的站在法家方面，而反對儒家的泥古；順民和達鬱等篇的懷柔政策，却又極鮮明的站在儒家方面，而反對法家的專制。還有：既講「重己」，又講「愛類」，是一揚而一墨；既講「節喪」，又講「大樂」，是一墨而一儒。如此等等，不必縷舉。總之，呂氏春秋對於先秦各學派，都有所取，亦都有所去。各家學說經過一種消毒作用，互相調和，而與新社會相應，百家爭鳴的局面從此告終了。

二 **六家要旨與藝文志** 這是批評先秦諸子最重要的兩篇文章。呂氏春秋是當秦朝統一的前夜作出來的，那正是法家得勢的時候，所以書中法家色彩特別濃厚。這兩篇却不同了。六家要旨作於術術獨尊以前，當時黃老思想正盛行。這篇文章雖然把陰陽儒墨名法道德六家平列起來，而實以道家爲中心，其斟酌去取之間頗有味道的。他說道家是「因陰陽之大順，採儒家墨家之善，撮名法之要」，極口稱讚，有褒無貶。至於對於其他各家，長處和短處都分別指示出來。表面上看，他批評各家，瑕瑜不相掩，似乎很公平。但實際上，他所指出爲某家的長處者，往往不是那一家的要義。例如他論墨家道：

墨者儉而難遊，是以其事不可徧循。然其強本節用，不可廢也。專就尙儉一義論墨家，而稱其長處在「強本節用」。至於兼愛、非攻、尙賢、尙同等大義，則一概不提。拋開其根本主張，而只就枝葉上說長道短，這還成個什麼墨家呢？他論道家最精彩。但其所謂：

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去健羨，絀聰明，釋此而任術。……以虛無爲本，以因循爲用。無成勢，無常形，故能究萬物之情。不爲物先，不爲物後，故能爲萬物主。……虛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綱也。羣臣並至，使各自明也。其實中其弊者謂之蠹，實不中其弊者謂之瘵，瘵言不聽，瘵乃不生。全是講「君人南面之術」，有些話簡直大類韓非。至於絕仁棄義一類話，一概撇開，他反而說：

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禮，列夫婦長幼之別，不可易也。（論儒家）
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論法家）

明白接受儒、法兩家的主張。這就和原始道家之「無親戚君臣上下」者迥不相同了。由此可知，在六家要旨中，不祇是拿道家折衷各家，却也拿各家來修正道家。他們是互相牽就，互相調和的。漢書藝文志是儒術一尊後的作品，其批判各家，全以儒家思想爲標準。什麼「此其所長也」，即因其合於儒家

；這樣一來，各家的特色完全失掉，也就不成其為各家，而一概消納在儒家中了。但是這樣的儒家，畢竟已網開三面，對各家的殘餘表示寬宏大度，和他在未爬上統治地位以前與各家爭雄者，氣象總有些不同。最有意味的，藝文志和六家要旨，雖一用儒家觀點，一用道家觀點，但兩者之間，也並不見有什麼根本衝突。這也是當時各學派接近調和的一種表現。

觀以上所述，秦、漢思想界大混合的形勢可以概見。在這個大混合局面中，形成儒、法、道三位一體的統治。二十四年冬天，我曾作過一篇『從王安石變法說到中國歷史上的無為思想』，其中有一段話就是發揮這個意思。其文為：

我當想漢以後的政治思想，乃是儒、法、道三位一體而歸結於無為的政治思想。道家主張無為，不用說了。孔子說：『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舜何為哉？桀已正南面而已。』這是儒家的無為論，儒家主張德化，化是自然而然而不能強為的。韓非說：『使法擇人，不自舉也；使法量功，不自度也。』（有度篇）『聖人執一以靜，使名自命，令事自定』（揚權篇）這是法家的無為論。太史公說申韓原於道德，那是很有道理的。本來儒、法、道三家的政治思想互相衝突，不能並立。儒家尚『德』，法家尚『法』，而道家尚『自然』。老子說：『太上不知有之，其次親之譽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我們可以說這裏第一等是道家的政治，第二等是儒家的政治，第三等是法家的政治。當先秦時代，這三種政治主張很尖銳的對立着。但經秦、漢時代思想界的大混合，他們各自的極端性逐漸消失了。因之其對立也不十分明顯了。自漢武帝以後，號稱儒術一尊。實際上後來的儒術已經變了像，已經打過折扣了。照極端的儒家說，也就是照原始的儒家說，君師合一，君主應該處處以身作則。所謂『主先而臣隨，主唱而臣和，如此則主譽而臣進』（司馬談批評儒家的話）。這樣純正的德化主義，後來切實遵行的才有幾人？至於井田、學校等，更當成可有可無的點綴品。儘管講德、講禮，實際上是在任法任術。漢宣帝說：『漢家自有法度，雜王霸道用之。』儒術何嘗獨尊呢？那末，你說他們行的是法家政治嗎？却也不然。照極端的法家說，也就是照原始的法家說，應該專任賞罰為治，無所謂德化，甚至孝弟仁義都在所排斥。漢以後誰敢如此主張呢？儒家興義立教，制禮作樂，兢兢業業，朝乾夕惕，本是有為的，其所謂無為，只是言其過化存神之妙而已。法家更積極、更緊張，其有為的精神更明顯。其所謂無為，只是任法不任人而已。這兩家都不是真正無為。真正無為的是道家。照極端的道家說過也就是照原始的道家說，禮法政刑，一概不用，君臣上下，一概打消。這樣的無為，含激烈的破壞意味，自非歷代統治者所

肯採取。漢以後所謂黃老一家言，只是講清靜不擾，『以柔道治天下』而已。漢以後的政治，三家兼採而彼此相消。有儒、法兩家的君臣上下，禮法政刑，而道家自由平等的精神打消了。有儒家的親親尊尊，崇倫德化，而法家整齊畫一綜覈名實的精神打消了。有法家的任法而不任人，而儒家修身尊賢、化民成俗的精神打消了。老子說：『法令滋章，盜賊多有。』於是乎不必講法了。又說：『禮者，忠信之薄，亂之首。』於是乎不必講禮了。以道家的精神打消了儒、法兩家的有為，同時却又以儒法兩家的精神轉化了道家的無為。漢以後的政治，是德治嗎？不是。因為人君並不修德。是法治麼？不是。因為人君並不守法。然則是無治嗎？更不是。因為明明有君臣上下。裝着周、孔面貌，運以黃老精神，構成申、韓體段。這樣一種君主獨裁制下的官僚政治，非儒，非法，非道；亦儒，亦法，亦道。三位一體，相融相消，而總歸於無為。漢以後的政治是無為政治，而這種無為政治，實為儒、法、道三家的化合物。（全文見河南政治月刊王安石研究專號）

這樣講漢以後儒、法、道三位一體的統治局面，可算是十分明白了吧？總之，先秦思想界的局面，既為當時社會局面所決定，那末，現在社會條件變動了，思想界的局面亦自當隨之而變動。各學派有的消聲匿跡，有的蛻變其形貌而與他派相混合，都和當時整個社會變遷整個階級結構有關係。單拿秦朝一把火或者單就思想論思想，是解決不了這些問題的。

求真雜誌 合訂本

發售預約

自第一卷第一期至第六期，合裝一巨冊。封面用厚紙精印。全書一百萬言。計五百面。定價國幣壹萬元；預約期間，七折優待，並不另收郵寄費，至十一月底截止。

答張大軍先生論維新運動

唐虞世

張大軍先生在前真雜誌第五期發表了『與唐虞世先生論維新運動』一文，對於我在同一雜誌第二期和第三期發表的兩篇文章，提出了幾點不同意見，來同我討論。這二篇文章居然能引起張先生底注意，我是引為榮幸的；我更加喜歡同張先生討論這個問題。

張先生文中分為三節，分別提出三點不同意見。在第一節，他和我討論維新運動底階級基礎問題。我認為這是資產階級的運動，他認為這是封建官僚地主階級的運動。在第二節，他和我討論個人和歷史關係問題。我的文內關於康有為、梁啟超、孫文、章炳麟諸人說了很多，他則認為我過於重視個人作用了。在第三節，他和我討論資產階級與改良運動問題。他引了我一段話，但刪去前後文句，引起了誤解。

現在仍分三節回答他。

維新運動究竟代表甚麼階級利益？——這是三個問題中最重要的一個問題。我在第二文中說：

『康、梁底維新運動，就其本質說，則是代表中國新興的資產階級利益，則是企圖將政權從土族或地主階級基礎移置於資產階級基礎之上。這是中國有史以來第一次出現的資產階級運動。』

請注意，這裏以及其他地方，我僅備說：『資產階級』或『新興的資產階級』。我並不說『民族資產階級』。為甚麼呢？因為『民族資產階級』一個名詞，在幾十年間文字的應用上，意義是非常含混的。至少牠含有下列幾種意義：第一、『民族資產階級』是指本國的資本家。凡在中國經營工商業的資本家，祇要不是外國人，都可納入這個範疇。在此意義下，牠就同我用的『資產階級』一個樣了。第二、『民族資產階級』是指買辦以外的本國資本家。中國第二次革命前後，人們用的就是這個意義。第三、『民族資產階

級』是指經營近代機器生產的資本家。這個意義比前更加狹小些，但也常有人用。第四、『民族資產階級』是指那些不能參加官僚統制，為美國帝國主義所拋棄的資本家，他們的工廠和商店正在陷於破產之中。這是現在人們最通用的意義。如果我的文中要用『民族資產階級』名詞時，我是必須首先說明用的那一種意義的。

張先生頭腦中輕輕把我的『資產階級』概念換成他的『民族資產階級』概念。我不知道，他所謂『民族資產階級』是屬於那一種意義的呢？他沒有明白說。但根據他的文章，我們可以看出：一、他是把買辦除外的，二、他是注重近代機器生產經營者的。康梁底維新運動是否代表張先生心目中這種『民族資產階級』利益，那不關我的事，我的文章說的並不是這種『民族資產階級』。因此，張先生列舉的種種反駁理由，我就無需要答覆了，因為他反駁的是另一個人，是將維新運動認為代表『民族資產階級』（張先生心目中的）利益的人，而不是我。

為甚麼一般人（不僅張大軍先生，而且是一般的人）一聽到『資產階級』立刻就混同於『民族資產階級』的呢？這中間牽連到一種錯誤的政治路線問題。『資產階級』一類馬克思主義術語常見於報紙、雜誌中成為中國通用的術語，是從五四運動後期開始的，那時『新青年』宣傳馬克思主義，而中國共產黨在醞釀組織中。可是此時也已醞釀着一種思想，認為：中國資產階級是能革命的、是還保存着革命性的；不革命的或反動的，祇是其中的買辦分子。於是把買辦屏出『資產階級』以外，而採用『民族資產階級』名詞來容納那些『還有革命作用』的資產階級。這個錯誤思想或路線早於中國第二次革命以前就成立了。

中國共產黨在第二次革命中就是執行這個路線。可是，在革命底實際行動中，與共產黨設想的相反，不僅買辦是反動的，連『民族資產階級』也是反動的。被認為代表『民族資產階級』的某一集團一天比一天更顯露其反動性了。對此，共產黨有兩種不同意見：一部分人堅持舊的路線，認為『民族資

產階級』既然還有革命作用，那麼現在這個一天比一天反動的集團就不是代表『民族資產階級』，而是代表買辦，同北洋軍閥一般。必然有另一集團出來代表『民族資產階級』，而這個集團才是真正革命的。另一部分人則認為那個一天比一天反動的集團，不僅是代表買辦，而且是代表『民族資產階級』。我們現在明白，後一種意見是比較正確些，可是當時代表這意見的人並未會做出必要的結論，並未會斷言整個資產階級都無革命作用。共產黨繼續舊的路線。結果葬送了中國第二次革命。

革命失敗後，人們並未會學得這個教訓，而且變本加厲。現在人們固執着區分『官僚資本』和『民族資本』，把中國民主希望寄托於『民族資本』身上，有些人以為牠是能革命的，惟有牠能代表中國資產階級，買辦和『官僚資本』都不是資產階級。於是造成了混亂。

必須澄清這個混亂。我們必須站在資產階級以外來看資產階級。我們不可爲了樹株而忘記了森林。

其實，我自己的文內說得很明白，我所謂做維新運動基礎的中國資產階級，其中成分子：

『海外華僑富商及其國內家族，通商口岸直接與外國人交易的商人（買辦），舊式商業資本家，官僚資本下發財的人，士族自身改營商業者等等。』（見《真雜誌》第三期）

這裏，不僅包含買辦在內，而且沒有包含那些經營近代機器生產的資本家在內，因為運動發生時這種生產開始不久，數量也很小，如張先生文內所用力證明了的。

但是沒有包含近代機器生產在內的資產階級，能算資產階級麼？能做維新運動基礎麼？能發動甚麼資產階級運動麼？

能的！能的！張先生！西歐歷史上資產階級啓蒙運動，甚至革命，正是以這種資產階級爲基礎呀！

十六世紀宗教改革運動發生於德國，普遍於歐洲。馬克思主義一向認爲這是資產階級運動。但十六世紀歐洲有近代機器生產麼？荷蘭革命和英國革命毫無疑義是資產階級運動，但那時還未有『產業革命』，更無從有近代機器生產。十八世紀法國啓蒙運動，是人們常常拿來同中國維新運動相比的，可是那時法國也沒有近代機器生產，至少不是以那經營近代機器生產的資本家爲運動基礎的。自此以後，不錯，近代機器生產出現了。張先生心目中

的『民族資產階級』也就跟着產生了。

所以我們談到資產階級及其運動時候，應當把眼光放大些，應當看看西歐歷史。『資產階級』不是別的，就是西方中古時代的『市民階級』羽翼豐滿了的。牠有組織、有自覺，能與封建社會中互相鬥爭的地主和農民兩階級鼎足而立，而要求參與統治國家，或單獨統治國家。這樣的階級，在帝國主義未侵入以前，中國還沒有，或雖有種種原素，但未會形成一個階級，如西方那樣（請參看求真雜誌第一期『中西文化不同之基礎』一文）。帝國主義侵入後，經過幾十年長久時間，那些原有的原素和外來的原素才漸漸結合形成了中國資產階級。沒有帝國主義侵入，即使有華僑富商及其國內家族，也不過是孤立的原素，有了帝國主義侵入之後，這個原素就可和其他原素結合而成一新階級了，其餘可以類推。有了資產階級，中國才談得上從前資本主義轉變至資本主義呀。這個轉變是長久的過程，並非『立刻』，至少我沒有說『立刻』的話，不知張先生文中何所據而云然？

把康、梁底維新和曾、李底新政看做『在本質上相同』，看做『同樣是較進步的封建官僚地主階級緩和危機及社會矛盾』，看做舊統治階級底臨死掙扎，——這是很錯誤的。曾、李新政確是可以這般看法，因為曾、李及其後繼者，即後來與康、梁敵對的人，無論如何施行新政，但這『新政』祇限於『堅甲利兵』，並不觸犯政治制度，即不改變統治階層。康、梁維新就不同了。維新首先要求的是政制的改革，其他一切改革是以此改革爲前提的。維新要求憲法、要求議會、要求責任內閣制，即虛君制，總之要求西方資產階級所實行而有效的統治制度。如何能說這與曾、李新政是『本質上相同的』呢？維新運動惹起反對的，實在不僅有『皇族』，而且是差不多全體舊統治階級，漢人比滿人反對的還更厲害些。僅僅從『皇族』反對來說明維新運動底失敗，未免太『低估維新運動底價值和意義』了。

我在求真雜誌發表的諸文中僅說『資產階級』，而不說『民族資產階級』。爲避免誤會起見，我必須說明，在某種情形下，未嘗不可以將資產階級分類，而說明其各自對於某一問題的立場。但在我們現今討論的問題上，我們就必須拿整個資產階級來看的。

張先生認爲我過於注意『人』的問題。他說：『個人只是歷史的參攷資

料之一，特別強調地依據對人的分析而制定這一歷史過程的階級基礎和解放意義，却是並不完全可靠的。」

張先生不知何所見而云然？我的文章具在，其中都是從客觀的、階級鬥爭的歷史來解釋維新和革命的。我並未會根據個人來判斷歷史。例如康有為和梁啟超都是士族出身的，都是受士族教育的，如果根據他們個人來判斷維新運動，則我應當做出如張先生一般的結論，說這是「封建官僚地主階級底臨死掙扎」了。然而我認為這是士族領導的資產階級運動。

但若以為「人」的因素在歷史上毫不重要，那也是錯誤的。一種歷史運動必有幾個代表人，這些代表人出身、活動、著作，是必須加以研究和分析，才能正確瞭解此運動的。「人的變動性」並無害於這個研究。我們決不能因為人常變動，就把個人因素屏於歷史研究之外了。即以梁啟超而論，梁啟超是以思想善變著名的，但這並無害於我們將梁啟超看做中國資產階級底思想家。

從「人」的問題，張先生引我們到了廣東是否更早發展資本主義，更早成立資產階級，更早表現資產階級野心問題。我想這問題是無須討論的，因為這是凡研究中國近代史的人所公認的問題。試想廣州通商起於何時，而其他諸口通商又起於何時？

張先生又說我「太不重視民族資產階級成立的內在因素。」我不懂得他所謂「內在因素」是甚麼？我認為中國社會本已含蓄了「資產階級成立的內在因素」，帝國主義侵入漸漸促使成形罷了。至於「民族資產階級」，則又當別論。

我的文中提起南亭亭長、我佛山人小說之處，張先生說是「片面的觀察。」他認為這些「譴責小說家」並非代表資產階級反對舊統治者，而是「激於民族主義思想」。這裝，張先生不懂得：這些小說家底「民族主義思想」正是以他們的資產階級思想為前提的。中國近代民族主義運動正是資產階級運動呀！

三

張先生引了我下面一段話：

『大抵社會矛盾未發展到飽和點，統治階級還有可能改良其制度以延長其統治時，總是用維新方法，如歷代底政變，甚至禪讓，但矛盾若發展到了飽和點，

農民工匠及一般貧民就暴動起來，他們不要改良，祇要革命。』

但他刪去了前面兩句話：『這兩種方法，中國歷史常常交替應用着。』他又刪去了後面一句話：『這是從過去中國歷史看得出來的。』張先生若是沒有刪去這前後三句話，讀他文章的人就可以明白，我那段話中說的是維新以前的中國歷史，即尚沒有資產階級出現以前的中國歷史，對於維新運動是不能適用的。那段之後，我接着說：

『但是帝國主義侵入之後，中國改觀了，因為產生了一個新的階級，與地主和農民鼎足而立，——資產階級。牠對於士族底政權，既能採取改良的方法，亦能採取革命的方法。』

我的意思很明白：與過去歷史不同，從今起，「被統治的」階級也能用改良即維新方法了，這個方法不是「統治的」階級專有的了。張先生雖然認為上引那段話是「正確的原則」，可是他拿來當作「超歷史的法則。」

最後，張先生提起了康、梁維新和孫、章革命之關係問題。我認為這兩個運動具有同一的階級基礎，即資產階級基礎；資產階級所以從維新走上革命，是為事變發展所迫成的。他反對我這樣說。他認為維新時代中國資產階級還沒有成長，還沒有力量，所以與維新無涉，到革命時代，就有此力量了。但他不知道這兩種運動是同時發生的，起初維新運動雖然扶搖直上顯得革命運動無力，但維新一經挫折，革命就立即抬頭，立即代替維新勢力，而且超過了。如果不拿政治鬥爭經驗和教訓來解釋，而拿經濟成長和力量來解釋，這是解釋不通的。

總之，張大軍先生懷抱了「資產階級即是民族資產階級」之成見，拿着顯微鏡，在維新運動以前的中國歷史中仔細尋覓「中國民族資產階級」，他尋不着，或雖尋着但僅有「萌芽」，於是斷言維新運動與此「萌芽」無關。那麼究竟是甚麼階級做此運動基礎呢？他很容易地便說是：封建官僚地主階級，或其中較進步的部分。他的錯誤正是直接從那個成見出來的，其他一切問題，連個人作用問題，改良問題在內，則是間接從那個成見產生的。

感謝他的批評，我才有機會又加一次揭破這個成見。

一九四六年九月二日

關於老子孔子思想問題的論爭(五)

老孔思想問題的論爭，愈來愈激烈，誠覺可喜。然最近細察論爭雙方之來稿，間有太過意氣用事，甚之夾雜與學術論爭毫無關係之詞句，互相斥駁！此種作風，亟需及時制止。我們在『創辦宗旨』中，曾經鄭重聲明：『對於任何思想，任何創作的討論與批評，本誌都堅主採取嚴格的科學態度。凡一切無謂的攻擊或漫罵，均須避免，以期不致違背忠於「求真」精神。』茲重申原意：謹請參加論爭的朋友、學者、作家特別注意及此。尤懇來稿勿過一萬字。否則，為篇幅所限，礙難發表。

（編者）

再答李季先生論老孔思想

〔續〕

歐伯

七 孔子究竟代表什麼階級

我們在前面已經明白地指證過：李季先生把同情農民反對封建貴族的老子說成爲最反動的封建地主階級代表，是一種何等荒謬的曲解！然而對於真正代表封建貴族利益的孔子，李先生却又將他描繪成爲反對封建貴族的『士和自由地主』的代表或革命家了！『別有會心』，『顛倒黑白』，李先生於此可算達到了最高峯！然而李先生所以達到此種登峯造極的荒謬曲解，其根本原因仍然是由於他那根深蒂固的機械觀。

在李先生看來，彷彿社會的階級關係完全像機械的配置一樣：某一階級或等級出身的人，便一定代表那個階級或等級的利益而不可移易似的。老子既出身於貴族，便一定是代表封建地主階級的利益（『貴族出身而又做慣柱下史的老子絕對沒有意思要人類返到自由平等的原始社會裏去』——見『行不得也哥哥』）同樣，孔子既出身於士（『孔子及其弟子都是士閥庶及人閥

出身』），也就一定『代表士和自由地主階級』的利益（李先生甚至於斷定：『孔子爲士的代表，這是誰也承認，不會有爭執的』——以上引語，均見『再論老子與孔子』一文第六節。）依此推論下去：出身於資產階級或小資產階級的，一定代表資產階級或小資產階級的利益；出身於工人或農民的，一定代表工人階級或農民層的利益。但根據李先生的這一機械邏輯，我們怎能解釋：何以出身貴族的米拉波，會起而領導過資產階級的法國大革命？出身貴族的托爾斯泰，竟感同情於農民而反對代表貴族地主的沙皇制度？出身於小資產階級的馬克思和列寧，竟成了無產階級的偉大領袖？反之，何以許多出身於農民的人們常常替官僚貴族地主忠實地服務？不少出身於工人的人們，常常變成了資產階級的走狗？顯然地：歷史的事實，客觀的階級關係及其利益的代表關係，與李先生簡單而機械的頭腦所想像的要遠爲複雜和辯證得多。就一般說，階級的利害固然是其代表者的思想和傾向的決定因素。但就個別的人說來，其思想和傾向并不一定常常代表其所出身的階級。有時

甚至相反：出身甲階級的人往往轉到乙階級或同情乙階級而變成了它的代言人或領導者。因此，我們觀察和判斷某一思想家和政治家所代表的階級性時，固然須要注意他的『出身』，但絕不可單憑這點來作唯一的或主要的標準。我們寧可說：『判斷某一思想家或政治家所代表的階級性時，最主要的，含有決定意義的，乃是他的思想和政治主張的本質究竟是反映了那一階級的意識和利益？』但異常不幸，李季先生判斷孔子的思想所代表的階級性時，竟完全忽略了這一『最主要的標準』！而只是機械地注意孔子及其弟子們的『出身』并『旁搜博引』地以此來『證明』孔子『出身士閥』即是『代表士和自由地主階級』。也正因此，李先生便鑽入了牛角尖，將黑的說成白的了。同時，如果讀者明白了李先生這一基本的錯誤，——即從某階級出身的人一定代表那個階級的機械觀的錯誤，——則對於他判定『孔子代表士和自由地主階級』的一切『論據』和『解釋』，也就自會看出其膚淺、機械和歪曲之所在了。

但機械思想牢不可破的李先生，對我們前面這種辯證的說明，也許又要大叫其『牛頭不對馬嘴的宣傳式論戰法』吧！我們爲了使他以後不致隨便亂用這套『護身符』來掩蓋自己的錯誤，對於他那原無足道的煩瑣『論據』也就不用耐着性子來揭破一番。先讓我們抄錄他在『二十年前』所寫現在又重抄出來的自鳴得意的一段妙文來看看：

『封建制度最重要關，不得互相逾越。孔子及其弟子都是士閥或庶人闖出身，并非貴族。……就國閥講，他們應該本『思不出其位』的主張，始終安於士閥，不得有非分的希冀。然而事實上，孔子對於『千乘之國，由也爲之……』，『方六七十……求也爲之……』。……孔子做過魯國的司空和司寇，子貢爲齊魯聘吳越，位居卿位，宰予仕齊也是卿，他們師弟簡直闖入貴族閥閥了』（求真一卷三號第四頁）

李先生以爲這段『從前批評孔子的話，現在看來仍然是對的。』但『對』在什麼地方呢？即令『對』，又與『孔子代表士和自由地主階級』有什麼關係呢？實際上，這段話的本身便是機械思想或形式邏輯的產物。『封建制度』固然『最重要關』，但并不是絕對的，即絕對地『不得互相逾越的』。如在春秋初期，正當封建制度最盛的時候，然而管仲和鮑叔牙却曾以『士』或『庶人』的資格而作到了齊國的卿相。『百黑奚舉於市』，『孫叔敖舉於海』，這也是以『士』或『庶人』而躋於卿大夫之例。像這類的例子還有不少。

由此可見，春秋末期的孔子及其弟子們，以『士閥』或『庶人閥』出身而作到大夫或卿相，『闖入貴族閥閥』，也就無足爲奇了。何況所謂『士閥』，正是封建社會中的知識份子，是那時的官吏（就算是『事務官』吧）的候補員，所謂『士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就是這個意思。而且我們還必須知道，所謂『士閥』，在封建貴族的等級制中，雖列在最低級，但本質上還是在『庶人閥』之上，是屬於或准許『闖入』貴族閥閥的。因此，有能力的士或『學而優』的士，不但可以，而且應該闖入貴族閥（如卿，大夫等）之中。李季先生『帶着特有的玄學眼鏡』，把什麼都看成『絕對』，以致對於孔子及其弟子們由士而陞爲官吏，躋爲卿大夫，便也以爲這是『逾越』了『封建制度的閥閥』，破壞了封建制度，其實這不過是『逾越』了李先生頭腦中所想像的那種『絕對的封建制度的閥閥』，破壞了他的烏托邦的封建制度而已。

我們姑且退一步說，孔子及其弟子們以『士閥』而躋爲卿大夫，算是『逾越』了『封建制度所最注重的閥閥』。難道由此就可以證明這是『孔子代表士和自由地主階級』的利益在反對封建地主階級的利益嗎？李先生如果用『肯定』來回答這一問題，那以前歐洲許多社會民主黨人以及現在法意的社會黨、共產黨和英國工黨的領袖們之加入資產階級的政府或直接組閣，更可算是『工人階級的代表』在破壞資本主義制度，甚或是代替資本主義的制了！可是從馬克思主義的觀點看來，這些號稱社會主義者乃至共產主義者之參加資產階級的政府或直接組閣，都不過是一種可恥的機會主義的露骨表演，是背叛了工人階級的基本利益，企圖用改良主義去穩定已在動搖的資本主義制度，以便其渡過難關而已。孔子及其弟子們之『闖入貴族閥閥』，躋爲卿大夫，則算他們是代表『自由地主階級』，至多也不過是一種可恥的機會主義者同現在的『社會主義者』一樣，企圖以其改良主義去挽救當時封建制度的危機，以便其繼續存在吧了。

至於李季先生在前所批評過的那段『引證』之後，所『補充』的三點意見（求真一卷三號四七——四八頁），自以爲『充分顯明』。但實際上，只是『充分顯明』地『補充』了或加深了他的原有的荒謬見解。因爲：第一，他援引尹無宇所說的『人有十等』的說法，企圖以此證明『封建制度中的等級是多而且嚴的』。其實尹無宇的話是大成問題的，我們姑且假定他的話是對的罷，然而不管『封建制度中的等級』是如此的『多』，

如此的『嚴』，總還不是『絕對的』（理由和事實前面已指出過了），因而也就絕不足以解釋孔子及其弟子們之爲卿爲大夫，是代表自由地主反對封建制度。

第二、他說『士是封建社會中一個閹閹，尤其量可以做現今所謂『事務官』。即算只能作到『事務官』罷，但你總已承認了『士』是在『封建社會中』可以作『官』的一個『閹閹』，即有權可以『闖入貴族閹閹』中去的一個『閹閹』，因而也就是屬於、至少可能屬於貴族閹之一了。因爲士乃是有『祿足以代其耕也』的，即屬於『食於人』的階級哩！士既獲有一定的土地以爲『祿』，從土地上收取『祿』（地租）『以代其耕』，則士閹爲小地主當然是可信的。但在孔子時代的土地是否已自由買賣，因而那時的『士』是否已成了『自由的地主階級』，李先生尙沒有舉出一點可靠的史實來證明。他引韓非子說的『夫陳善田利宅，所以輕士卒也』。『夫上所以陳良田大澤，設爵祿，所以易民死命也』。及管子說的『良田不在戰士，三年而兵弱』。這些顯然是指封建貴族爲了要打仗，不得不賜給『士卒』們以『華田利宅和爵祿』等，以『易民死命』。不知李先生何以竟從這些引句中得出了『這正是新興自由地主階級的一大來源，與周初的封建地主階級是不同的』結論來？假如李先生所謂的『自由地主』，是依照科學的定義來說的，則是在土地自由買賣的條件之下產生的（從李季先生說的『自貨幣經濟發展，土地自由買賣，凡富有金錢的人都可以變成自由地主』這幾句話看來，似乎已承認了這一定義），那末韓非子和管子中所描寫有土地的士卒們，却與『自由地主』毫無共同之點。因爲他們的土地絕非用金錢買來，而是由上面的封建貴族賜予的，因而也就是不可以自由買賣的，換句話說，仍然是『封建的』。此種『封建的地主』，怎麼李先生也慷慨地賜予以『自由地主』的頭銜呢？而且這種『封建地主』，在本質上與『周初的封建地主』究有什麼『不同』呢？！很明顯地：李先生費盡氣力所搜羅出來以便證明孔子所代表的『自由地主』，恰是一種『封建地主』，這未免對於他自己的主張太過諷刺了！但對於我們的判斷——孔子代表封建貴族地主的判斷，倒是一個小小的幫忙呢！！

第三、李先生說：『孔子爲士的代表，這是誰也承認，不會有爭執的』。真好武斷！把他自己承認的東西竟誇大成『誰也承認』！孔子出身於『士閹』人們可以『承認』。但士閹的本身是在真正的『貴族閹』與『庶人閹』之間，有類於現代的小資產階級，是最不固定的。（事實上也沒有絕對固定

的閹閹）其中有可能闖入貴族閹的顯達之士，也有論落在庶民層的貧寒之士。正因此，士個人的意識是變動不居的。企圖往上爬的『士』，便要擁護當前的封建制度，至多主張加以改良，孔子正是這樣的一個代表人物。而落在庶人層或接近庶人層的『士』，則可能同情庶人（如農民及手工匠等），反對當前的封建制度而主張改革，如墨子及陳相、許行之流，便是這種傾向的代言人。李先生斷定孔子代表士，但我們要問他究竟是代表『往上爬的顯達之士』，還是代表『接近庶人的貧寒之士』呢？李先生又說：『士的量既增，而士的質也變了。』但變成了什麼樣的『質』？代表『自由地主』以反對封建制度的質嗎？不但孔子不會反對封建制度，企圖代替貴族閹，就是後來孟嘗、平原、信陵和春申諸君的名下士，也還是在拼命擁護孟嘗君等『貴族閹』，企圖維繫其所代表的封建制度的。至於李先生說：『孔門把士看做社會和國家唯一無二的中堅人物。……這正是孔子要以士閹去代替貴族閹，起來掌握政權的明證。在事實上，他們師弟也多少如願以償了。其實在事實上』，不過是孔子及其弟子們，看到當時封建制度的衰落，上層貴族的腐敗無能，認爲士的責任重大，鼓勵『士閹』中的人們振作起來（即所謂『任重而道遠』），以便自己爬上較高的貴族閹，改良改良當時已在衰敗中的封建制度而已。然而當時的封建制度，客觀上實已無法『改良』，所以孔子及其弟子們（如子貢、宰子等），雖然作到了卿相，爬上了貴族閹，但其改良的效果還是等於零。李先生的所謂『多少如願以償』，原來不過如此！

至於李先生指出孔子主張『節用』、『使民以時』及『富之』、『教之』等政策來治理國家，便也算做孔子是『代表新興的自由地主階級』之『證明』，那就更顯得他的牽強附會了！因爲像『節用』、『使民以時』及『富之』、『教之』這類改良的思想或政策，即在封建制度的擁護者中也是很可能發生的。有名的管仲之治齊，就多少採用了這一類的政策。孔子之提出這一類的政策，只能證明他是一個站在擁護封建制度立場上的改良主義者，正如現代社會民主黨的領袖們之提出某些改良的社會政策一樣。假如以李先生『考察』孔子的同樣觀點來『考察』現時的社會民主黨的領袖們，則他們也可算『代表新興的工人階級』了！

總而言之，李先生以其特有的機械頭腦，全用形式邏輯代替辯證法來『考察』孔子所代表的階級，所以其論據、其解釋、其結論，便無一不與歷史的事實背道而馳了。在我們，認爲要正確判斷孔子思想所代表的階級性，

首先而且必須辯證地從孔子思想體系的實質上去探求。

八 孔子思想體系的實質

說到孔子思想的體系，我們在『回頭是岸』一文中原已大略敘述過（求真一卷二期四五—四六頁）。凡是沒有成見的人們，當已看出孔子思想體系的實質或中心之所在。但爲了擊破李季先生頑強的成見起見，我們還是不得不來重復解釋一番。

孔子思想的實質或中心，如果用一句現代的術語來說，便是『封建制度的改良主義』，換句話說，即維護當時已在衰落的封建制度而加以改良。而封建制度的實質又是從上至下的等級制度。此種等級制度，在封建割據及封建諸侯間常起戰爭的情形下，是容易破壞和混亂的。所以要維繫這種等級制度，便必須有一種強制的而又經公認的規範，這在我們的古代即謂之『禮』。『禮』有類如現代的『法』，是規定各封建等級的『名分』之一種共認的約規，凡上之使下，下之事上以及各級封建貴族之一舉一動，甚至一言一語，均應合乎『禮』或以『禮』爲依皈。因此，『禮』在封建社會裏便成了維繫封建制度的一條鎖鏈。沒有這條鎖鏈，封建制度是無法維繫而容易陷於破裂和混亂的。也正因此，在封建社會中特別重視『禮』（這從古代著作中評判某一事件或某一人物的言行時，以『禮也』或『非禮也』作斷語，就是證明），這有類於資本主義社會中特別重視『法』一樣。其根本不同的點僅在於：前者的精義是維持封建貴族的特權，而後者的精義則在保障有產者的私有財產權而已。

但在孔子時代，或由孔子看來，正是『世道衰微，邪說暴行又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有之』的時候，換句話來說，正是『禮壞樂崩』的時候。因此，恢復禮制便成了孔子的中心思想了。所以當顏淵向他問『仁』時，他的答覆是『克己復禮。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他又說：『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由此，便可見『禮』的作用是如何地重要了！但要『復禮』，又必須從『正名』始。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爲政，子將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政？』子曰：『野哉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

孔子和子路這一段爭論最烈的對話，在李季先來看來，只『是禮讓的孔門空前絕後的吵嘴談』，其實這是孔門中關於他們的中心思想，關於他們的政治原則，即關於他們如何從政治上去挽救當時已在衰敗的封建制度之一種最嚴肅而最激烈的論爭。在這種論爭裏已充分地表示出孔子挽救和改良當時封建制度的根本態度和方法了。根本的態度是『興禮樂』，而其根本方法則從『正名』始。孔子之作『春秋』，是正名主義之一種最高的運用，因爲『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也是這種正名主義在政治和倫理上之一種具體的表現。所以當齊景公聽到孔子『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主張時，不覺恍然大悟說：『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

但孔子要挽救並改良當時已在衰落的封建制度，又究竟以什麼社會爲標準呢？換句話說：孔子的理想社會是什麼呢？孔子是經驗主義者，這當然只有從歷史的經驗上去尋求。孔子說：『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而有文獻足資徵信便只有『周』。所以他最後得出結論并加以讚美地道：『周鑑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這裏所謂的『周』，當然是指『西周』。因爲在他看來，只有西周是『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是『天下有道』的時代，是最合乎他的理想社會的。也正因此，他不僅讚嘆不住地嚮往它，甚至還自以繼承這種理想制度的開創人物之『文』與『道』自命哩！（例如他說：『文王既歿，文不在茲乎』！『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

總而言之，就孔子全部思想體系的實質或中心說來，是企圖以『正名』，『復禮』來挽救當時封建制度的頹勢，并以此去改良它，使之回復到西周的形態。我們只有理解了這一基本點，則對於孔子其他的一切主張、言論、思想和行動，才能獲得明白而正確的解釋，不致陷於『只見樹枝而不見樹林』，或各種各式的附會和曲解的泥淖之中。也只有從理解孔子思想的這種本質上，才可以正確地指出孔子所代表的階級性來。

九 關於李季先生『孔子反封建貴族』的幾點妙論

由前面對孔子思想的本質及其所代表的階級性之頗為有系統而詳細的解釋，則對於李季先生在『孔子反封建貴族的學說體系』一節中所提出的許多妙論（求真一卷三號四八—五〇頁）本已不攻自破，無須解答了。但『如全不回答，他一定以為我是辭窮理屈了』。『我如果一一回答，實近於無聊。』『因此，我只好就其中比較重要的來解答一下』（恕我套用了李季先生的公式！）

首先，我應當指出的：人們在李先生標題為『孔子反封建貴族的學說體系』中，除了碰到些鷄零狗碎的妙論之外，却一點也看不出什麼『學說體系』來。這或者就是李季先生的『學說體系』吧！

一、李先生最引以為得意且認為牢不可破的，是他的『春秋譏世卿』說。他這次引出了公羊隱公三年關於『尹氏卒』和同書宣公十年關於『齊崔氏出奔衛』的『譏世卿』的解釋，以為這就是『士閔』反對『世卿世祿』，破壞『封建貴族的世襲特權』，『想取而代之』的鐵證。但可惜李先生這種『鐵證』仍然不過是一個肥皂泡，一點也經不起一鑿的。因為他首先就沒有注意到『公羊傳』並不等於『春秋』，而只是遠在春秋作成以後的一部註解書。此種註解書的『註解』是否符合於『春秋』的原意，是大成問題的。所謂『公羊學』，在清末的一些漢學家早已意見分歧，莫衷一是。但實際上，公羊傳對於春秋的傳註，是最牽強附會，最少靠得住的。例如李先生所引出的『尹氏卒』和『齊崔氏出奔衛』兩句春秋原文，在『公羊傳』解為『譏世卿』，但在『左傳』和『穀梁傳』中却又完全是另一種解法。李先生如不相信，我們將左傳穀梁傳和公羊傳的原文一同抄出來對照看看吧：

君氏卒。（此君氏即公羊和穀梁中之尹氏）嬖子也。不赴於諸侯，不反哭於寢，不祔於姑，故不曰薨。不稱夫人，故不言葬。不書姓，為公，故曰君氏（左傳）

尹氏卒。尹氏者，何也？天子之大夫也。外大夫不卒，此何以卒之也？於天子之崩為魯主，故隱而卒之（穀梁）

尹氏卒。尹氏者何？天子之大天也。其稱尹氏何？貶，曷為貶？譏世卿。世卿，非禮也。（公羊）

齊惠公卒，崔杼有寵於惠公高，國畏其僭也，公卒而逐之，奔衛。書曰崔氏，非其罪也，且告以族，不以名。凡諸侯之大夫遠，告於諸侯曰，某氏之守臣，失守宗廟，敬告。所有玉帛之使者則告，不然則否（左傳）

齊崔氏出奔衛。氏者何？舉族而出之之謂也（穀梁）
齊崔氏出奔衛。崔氏者何？齊大夫也。其稱崔氏何？貶。曷為貶？譏世卿。世卿，非禮也（公羊）

由此可以看出：左氏、穀梁和公羊三家對春秋原文的傳註，是各自不同的。但究以何家的傳註為正確，何家是代表孔子的原意呢？這是很難確定的。但至少我們由此可以說，公羊傳的解釋，比起左傳和穀梁傳的解釋來，是最為武斷，最少靠得住的了。李先生如果還不服氣，那我們讓穀梁來作一次正面的說明：『衛人立晉。衛人者，衆辭也，不宜立者也。晉之名惡也。其稱人以立之，何也？得衆也。得衆則是賢也。賢則其曰不宜立，何也？春秋之義，諸侯與正而不與賢也』（隱三年穀梁）。『春秋之義』，既是『諸侯與正而不與賢』，則所謂『譏世卿』與『選賢』，之說，又從何而來呢？而且不但穀梁的解說如此，就是公羊也有與這類似的解釋：

『公何以不言即位？成公意也。何成乎公之意？公將平國而反之桓。曷為反之桓？桓幼而貴，隱長而卑，其為尊卑也甚微，國人莫知。隱長又賢，諸大夫叛隱而立之，隱於是焉而辭立，則未知桓之將必得立也。……隱長又賢，何以不宜立？立適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桓何以貴？母貴則子貴，子何以貴？子以母貴，母以子貴』（公羊隱公元年）

公羊在這裏的解釋，是合乎周代的封建宗法制度的傳統習慣的。但根據『立適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的這一嚴密的封建宗法傳統看來，則所謂『譏世卿』，即『公卿大夫皆選賢而用之』的說法，不全成了無稽之談嗎？

李先生會趾高氣揚地向我們示威，要我『先提出不可靠的理由來』以證明『春秋譏世卿之不可靠』。現在我們的『理由』總算是『提出來』了。因此，我們有權利再說一句：李先生這回又是上了公羊的當了。『讀書三十年』的李先生，實在未免太不細心！然而這也是李先生作文章時『東拉西扯』，不加判斷的必然後果呢。

二、我在『回頭是岸』一文中，曾說過『孔子始終尊崇周天子』，並引『郁郁乎文哉！吾從周』當做直接的證據，以為他擁護封建制度的左證之一。然而李先生却認為『這又是牛頭不對馬嘴』。他說：

所謂『吾從周』，是指從周的文物，並不是什麼始終尊崇周天子。至於從周的文物，也不是尊崇周的封建制度，不過是因周的文化比夏、商二代高，他要創

遺一種新文化，即以周爲藍本。（求真同三期四八頁）

李先生在這段話裏不自覺地犯下了三個大錯：第一，所謂『從周的文物，也不是尊崇周的封建制度』。這是將『文化』與『制度』分離並對立起來，看成兩種絕不相干的東西的最庸俗的觀點。假如李先生還沒有完全忘記他以前所學的學說，那就應當知道：所謂文物或文化，並非別的，只是社會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築物之一。因此，『從周的文物』，不就是等於擁護了周的社會基礎及其整個的封建制度了嗎！第二，所謂孔子『要創造一種新文化，即以周爲藍本』，這不但完全違反了歷史的事實，而且還直接地違反了孔子的聲言。大家都知道，孔子是自稱『述而不作』的。『吾從周』，正是『述而不作』的態度之一種具體表現，即以繼承和敘述『文武之道』爲職志的表現；第三，『從周的文物，並不是什麼始終尊崇周天子』。這也是全不懂得封建社會中之『文物』（封建制度）與『人物』（天子或國王、諸侯等）的相互關係。像在周代的封建社會中，只口頭上說尊崇周的文物，而不尊崇周天子，那就等於否認周天子的宗主權，這正是孔子時代各國諸侯的態度，然而這又正是孔子最所痛心疾首的。所以他說：『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這意思就是表示他要恢復周天子的權威，要使『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孔子之作春秋，始終以周天子的年號冠首爲綱，更使他『始終尊崇周天子』的表現。所以孟子說：『世衰道微……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

李先生這次引子張與孔子的問答（『子張問：『世可知也？』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而得出結論說：『孔子如果『始終尊崇周天子』擁護封建制度，何能說出繼周者的話來？我們從帝制時代生長出來的人都知道，在當朝統治之下講改朝換帝的事，是大逆不道，腦袋要搬場的。孔子如此說，可見他有滿肚子的變更周封建制度的心事，目中已無周天子其人』。這是一種完全缺乏歷史知識和極端的唯心主義的表現。因爲：第一，李先生完全不懂得孔子與子張所討論的問題，乃是客觀地推論歷史發展的傾向問題，這與孔子的主觀願望毫無關係。第二，孔子根據已往夏、殷、周次第相承下來的制度，而預測將來，則以爲縱或未來有繼承周統的，即『百世』下去，仍然是多少類似周代的封建制度的。但這與他本人在當時尊崇周天子，主張維護周代的封建制度，毫無違背，更談不到由此可以看出『他有滿肚子的變更周代封建制度的心事……』。李先生以自己『從帝制時代生長出來的人』，便

擬想孔子的時代也同後來專制主義的帝制時代一樣，絕對不容許談『改朝換帝的事』。但孔子所生長的却是封建時代，甚至還是周天子的權威被削弱得近於零的時代，所以他絕沒有像李先生那種害怕『頭腦要搬場』的恐怖心理。

至於李先生舉出孟子『王齊』及提倡『仁者宜在高位』的話來，企圖以此證明孔子也是同孟子一樣，目中已無周天子了，甚至『依孔子的本意，是主閔中的仁者來作天子』。這除了暴露其對於春秋戰國的歷史演變及孔門學說隨之而演變完全無知外，還暴露了一種可笑的唯心主義的推論。因爲在孟子時代，周天子在事實上已等於完全不存在了，再也無法使之恢復其天子的權威了。所以孟子爲了要維持封建制度的存在，便不得不『求其次』而去找當時有權力的諸侯（如齊宣王）來代替他。無疑地，孟子的封建改良主義是儒家中最爲急進的，因而也是最爲空想的。然而這是孟子自己的事，至多只能說這是孔門思想在一個不同的歷史階段上之一種新的發展，但絕不能將此新發展的思想寫在孔子本人的賬上去。說到要『士閔中的仁者來作天子』，那我們只好說句笑話：這可不是孔子的『本意』，而只是李先生的『本意』哩！『讀書三十年』的李先生，談到孔子的『學說體系』時，不從孔子的思想的本質像我們前面概略地指出過的）和他所發表的一些根本主張上去探求，而專『從這些微妙處去理解孔孟的用心』，無怪其鑽到『心』的牛角尖裏去了！

三、李先生說：『『禮樂征伐自天子出』，與封建時代的各國分權，完全是兩樣的』（求真同三期四九頁）。這幾句話，可以說是李先生所有用來反駁我的話中，比較具有科學常識的話。但如果企圖以此來證明孔子主張『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是在反對封建制度，提倡君主專制的中央集權制，那就又要變成荒謬了。因爲孔子所主張的『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是以西周初期的情形作藍本，而加以理想化的。在西周初，不俱武王伐紂成功後，分封了同姓及異姓許多諸侯，建立了許多新國，完成了從上至下的封建制度，並且還『制禮作樂』來維繫這一制度；就是武王崩後，周公攝政，雖然有管蔡之叛，但周公仍然以輔佐成王的資格征伐了管蔡，討平了叛亂；——這些事實，在孔子看來，正是『禮樂征伐自天子出』的具體表現。正因此，孔子才以西周來作改良他當時正在衰敗的封建制度的標準。也正因此，他才以繼承『文武之道』自命，讚嘆不置地發出『郁郁乎文哉！吾從周』的決心出來。

是在一個軍事部落社會走上封建社會的過渡期中之一種軍事集中統治的暫時現象。這種軍事集中的統治，可以幫助封建制度的形成。但當封建制度形成而向前發展時，地方諸侯分立的局勢便要取中央集權的軍事統治而代之了。所以從歷史的發展上說來，後來春秋時代之『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倒是一種自然的現象，是封建制度發展過程中之必然的趨勢。此種趨勢發展到戰國末期，便已走到了臨界點，於是又為另一種中央集權制——專制主義的君主制所代替了。然而此種君主專制的中央集權制，與西周初軍事統治的中央集權制是實質上不同的。前者是封建制度所形成的保甲，而後者則是封建制度發展到最高峯的產兒。但周代封建制度發展的此種歷史過程，不但當時的孔老夫子無法知道，就是現代的所謂新歷史家也還是莫明其妙哩！

前面對於周代封建制度發展過程的指出，雖然過於簡略，但對於我們討論老孔思想及其他先秦思想家們的思想時，却是很有幫助的。假如李季先生明白了周代封建制度的發展過程，則他關於老孔思想問題的許多妙論也就不致發生了。至少，他不會因為孔子主張『禮樂征伐自天子出』而就認定他是代表自由地主階級來反對封建貴族，提倡『君權運動』，企圖建立君主專制的中央集權了。

其實，『君權運動』乃是後來戰國時代的產物，是法家思想的基本傾向。但此種傾向也只能到戰國中期以後才能產生，絕不是春秋末期所能發見的。在春秋末期，即老孔時代，封建制度雖已衰落，但還遠沒有走到臨界點。所以春秋末期的思想，無論老子或孔子，即令對於現狀不滿，也只能把頭向過去去探求他們的理想社會來作改革或改良當時社會的標準。但到戰國的中期以後，情形就不同了：商業已逐步發展，新興的地主階級已逐步形成，封建貴族一天一天地沒落，小國一天一天地被大國削弱或吞併；農民大眾在封建諸侯的不斷戰爭與各種各式的壓迫和剝削中已一天一天地感到不能忍受；——在這一情形下，一個強有力的和中央集權的政制憧憬便自然而然地發生了。這也就是法家之反對封建貴族的君主集權制思想所以發生的客觀的社會原因。而法家思想同儒家思想根本不同的地方，即在於：後者主張『禮治』，主張『法先王』；而前者則主張『法治』，主張『法後王』。李先生完全不懂得儒、法兩家這種根本的區分，因而將他們混同起來，放在同一的『君主運動』中去了！

此外，李先生還說：『胡適之先生在二十八年前大談其孔子』却處處要保存那在紙上的封建階級』。我却曾加以嚴厲的批評。不意時至今日歐伯先生『根據有關於孔子思想的全部材料研究得出來的總結論』，『仍不外孔子維護封建制度這一套』（同上引求實三期五〇頁）。我對於『孔子維護封建制度』的論據，是否正確，已有前面所說的一切為憑。但最令人惋惜的是：李先生雖自命站在歷史唯物論的觀點上『嚴厲的批評』了胡適之先生，然而其結果竟比起胡先生來還要糟到不可以道里計！因為胡先生以其常識式的實驗主義去分析孔子的思想，雖遠沒有能達到科學的結論，但至少還沒有過份違反歷史的事實。而李先生站在歷史唯物論的觀點去『嚴厲的批評』胡先生時，却已完全走到違反歷史的事實方面去了。於此，我們不能不深嘆：一種好工具（歷史唯物論）落在一雙笨手裏，除了糟踏材料外，往往還要『削足適履』的呢！

十 關於『老孔對於後世所發生的影響的檢討』之檢討

李季先生提出基督教來比擬老子的所謂道教，我認為頗有意義。但可惜李先生沒有能作出正確的結論來。因為李先生只知道『基督教初為無產階級的宗教。過了三世紀，因為變質的關係，便變成羅馬帝國的國教。到了中世紀，牠擁護封建地主階級，到了近代，牠又擁護資產階級』。殊不知，基督教雖會由『無產階級的宗教』而變質為各時代上層統治階級的宗教，但原始基督教反抗上層階級的某些教義却仍然斷斷續續保存在下層階級之中。所以在中世末期及前資本主義時期的歐洲許多農民暴動（如捷克、英、法及德國等）和城市手工業者者的反抗運動（如法、荷等），都或多或少是在此種原始基督教，或所謂『異教』的影響之下活動起來或被號召起來的。換句話說，中世紀後歐洲的農民和手工業者們，是常常在基督教的影響或旗幟之下起來進行鬥爭，以反對其壓迫者和剝削者的。『李先生於基督教對後世被壓迫階級的此種巨大影響，不知是一無所知，還是裝作不知，竟一字不提，希望以此來抹殺老子思想之對於中國農民的影響，未免太不忠實了！』（恕我又套用了李先生的公式！）。

老子思想同基督教一樣，也因時代變遷而變質，即由代表農民的思想，

到西漢爲上層的新貴族，乃至爲國王所利用。到了魏、晉，爲一部份貴族所喜好，變成了『清談』。到了唐朝，甚至被『奉爲太上玄元皇帝，……於是道教成爲國家的宗教，……徽宗且被道士們尊爲『教主道君皇帝』。這都是事實（我在『回頭是岸』一文中沒有指出，因爲我主要地是在注意老子思想對於農民的影響一方面）。但這些事實却並沒有能妨害老子思想之仍然斷斷續續地影響廣大的農民，（像基督教在歐洲之影響廣大的農民和手工匠人一樣），使他們多次在其影響下暴動起來反對統治階級，甚至推翻了統治階級。這是值得異常重視的。

至於李先生說東漢末『張道陵自稱得安老君秘錄行符水禁咒之法，講長生之術。其實，他的來源是神仙家，和老子風馬牛不相及』。李先生企圖以此來否認老子思想對於農民暴動的影響。然而李先生却完全不知道，或者不願知道，古代農民羣衆之對於任何思想或宗教的信仰或擁護，是與智識份子大大不同的。智識份子要認真追求思想的內容，要研究宗教的教義，而農民們却只要聽見那種思想和宗教同情他們，願意幫助他們解除痛苦，不管他的真正內容和教義如何，他們就接受的。而且無知的農民之接受任何思想或宗教，又往往是在一種最原始的或最迷信的形式之下接受的。這差不多已成了一種規律。不僅以前的中國如此，就是前資本主義時期的歐洲也是如此。李先生以自己智識份子的觀點去『檢討』我們歷史上的農民暴動，以農民或其領導者們沒有能懂得老子的思想，或依照老子的思想去行動，因而就否認老子思想對於那些農民及其暴動的影響，那就未免過於不懂得活的歷史事實，不懂得農民及其暴動的本質了。

但我必須聲明：因歷代統治階級對於農民暴動情形的抹殺和掩蓋，對於農民領袖的思想和主張之誣蔑，歪曲，致使我們現在無法知道已往農民暴動中的思想和主張的真實情形。正因此，我們單憑統治階級所留下來關於誣蔑某些農民領袖的思想和主張的一些斷片，是絕不足以正確理解老子的道教或其他的宗教（如佛教）對於農民影響之真象的。因此，我們只能說老子的思想對於東漢以後的農民暴動會發生了重大的影響，這是從它們常打着道教的旗幟判斷出來的。

此外，我還可以指出一點，西漢初陳平、曹參、竇太后，尤其是文帝『修黃老之言，不甚好儒術，其治尚清靜無爲』，這也是由於受了秦末農民暴動的影響。漢朝原來就是在農民暴動的怒潮中湧現出來的。因此，初期的統

治層對於農民暴動的感印極深，所以在利用暴動而取得政權之後，不能不對農民讓些步（如劉邦的約法三章，減稅及抑制商人等政策），並盡可能設法使農民休養生息，於是老子『清靜無爲』的思想就成爲他們的應時藥方了。

至於孔子思想之爲後世專制君主及一切統治階級所尊重，視爲『天經地義』，絕非如李先生所說的，是『因爲牠是代表士閥和地主階級』。只是因爲孔子的思想是激頭激尾代表統治階級的，主張馴服人民的，堅持等級制度的。因此，秦以後的統治階級比起先秦的統治階級來，雖然變了質，雖已由『封建地主貴族』變成了『自由地主貴族和官僚』，但孔子的等級制度的基本觀念，它的爲上層統治階級服務以征服人民的思想，却是最適合於新興的統治階級的口味和利益的。因爲任何新興的統治階級，一待到將舊統治階級推倒而取得政權後，都不可避免地要從舊統治階級的統治經驗中繼承某些有利於己的傳統思想和方法下來。這也是一種歷史的定律。而李先生對此却毫無所知，所以只好『牽強附會』了！

現在我們可以這樣地指出：老子的思想，由於它原來是反映了農民的某些意識和要求，雖然後來被上層的統治階級所利用，但它仍然能繼續在農民羣衆中獲得影響，甚至往往成爲他們反抗上層統治階級的號召力；但孔子的思想，由於它從頭至尾是代表封建地主的統治階級，因而也就一直爲秦、漢以後的新興地主（還有商人及高利貸者）統治階級所繼承，而成了統治人民的正統思想的無上權威（所謂『天經地義』）。這便是我們從檢討老、孔思想影響於後世所得出來的唯一正確的結論。

十一 結 論

最後，我們在這裏將老、孔的思想再作一簡單而扼要的對比，然後以之與李先生關於老、孔思想的判斷對照一下，作爲本文的結論：

A. 老子的思想：反映農民階級的意識和利益，因而對當時的封建地主貴族的統治行爲及其制度表示強烈的反對和抨擊，主張回到原始的自由平等的民族或部落社會時代去。從老子同情農民反對當時封建統治說來，是含有進步的意義的。但他的『小國寡民』的理想社會，不但是烏托邦，而且是倒退的。但不管老子的理想社會是如何空想和反動，而他同情農民反對封建統治的思想和精神，却是最可能獲得農民羣衆的同情和信仰

的。正因此，老子的思想也就成了往後農民暴動的號召力了。

B·孔子的思想：在本質上代表封建地主貴族，雖然對於當時已在衰敗的封建制度表示不滿，而加以若干批評，但不主張改造它，只是用西周的封建制度作範本來改良它。所以無論從孔子所代表的階級立場，從他對於當時社會政權的改良主張以及他所信仰的理想社會看來，都澈底是維護當時統治階級的基本利益的，是反動的。因而孔子的思想也就成爲一切統治階級統治人民大眾的法寶了。

李季先生對於老孔思想的判斷恰與我們上面的判斷相反：老子是封建地主階級的代表，他的思想是在維護封建貴族的特權以統治農民，激頭激尾反動的。所以往後的農民暴動與老子的思想毫無關係。而孔子則代表新興的自由地主階級，其思想在破壞封建制度，企圖以『士閥』去代替『貴族閥』，甚至欲以士閥中的人來作天子，建立中央集權的君主專制政治。因而孔子的思想是進步的，甚至『革命』的。所以秦以後『新興的自由地主階級』就自然地繼承它作爲『天經地義』了。

至於從研究老、孔思想的態度和方法上說來，我是從老孔思想的本質上，從他們的哲學和對於當時社會政治問題所發表的最基本的主張上，去探求老孔思想所含有社會意義及其所代表的階級性。而李先生則專從老孔的『出身』，從他們平時所發表的某些無關重要的意見，甚至從私人的閑談中，即從所謂『微妙處去理解』他們的『用心』，枝枝節節地，斷章取義地去找尋自己所需要的論據，編出適合自己成見的結論來。這些都是我在本文中已充分地指證過了。

『且不懷成見而又具有思考的讀者，看了我上面對於老孔思想和學術的分析，階級性的鑑定，以及道儒二教影響各不相同的檢討』（再套一次李先生的公式），尤其看了我最後所指出關於老孔思想的根本異點和李季先生的見解的對照，以及我與李先生在處理老孔思想的態度和方法上的差異，究竟『同意』誰，那是讀者們自己的責任和權利。但我在這裏還須向李先生再一度打招呼：你『十五年前所開關的道路』，原是一條死巷。你雖自以爲『遨遊真理之域』，但經過我前面的詳細指點之後，證明你實際上已鑽到了牛角尖頂，再也無法前進了！朋友，『向真理低頭』是榮譽的，還是及時『回頭』吧！

——一九四六，七月廿日——

【後記】寫完這篇文章不久，即看到求真一卷四期上稽文甫先生的『道家與小農』，李季先生的『答蔡尙思評我的老子看法』及蔡尙思先生的『再評李季的老莊封建說』三篇大文，像這樣熱烈地來爭論老、孔的思想問題，總算是我們久已陷於停滯狀態的學術思想界一種開始活躍的可喜象徵吧！但爲了這一爭論得到良好的結果，并由此展開到其他的學術思想領域去。我覺得不能不對稽、特別是李、蔡諸位先生貢獻一點意見：

一、稽文甫先生的『道家與小農』，可說是一篇認真的作品。基本的觀點大體是正確的。但在方法上稽先生還不免有點機械。例如：『小農』只是商業發展社會的產物，是農民到了普遍分化後所分化出來的一個階層，這在古代社會裏是不會大量產生的。尤其以老子的思想來代表『小農』，更使老子的思想陷於極狹隘的範圍，這是很難說得過去的。其次，稽先生以爲一定先有隱者然後才有道家，這也未免過於形式。道家的思想固然與隱者有若干關係，但不一定是出於或導源於隱者。尤其以老子的思想說來，絕非單純退隱的。它一方面固然表現消極，但同時在消極之中又含有積極性。換一句話，就是老子的思想是以消極的方法去積極地改造社會，——這一點只要注意老子對於當時社會政治各方面的嚴厲抨擊和不斷提出主張就夠了。

二、李先生和蔡先生這次的爭論（指『答蔡尙思評我的老子看法』和『再答李季的老莊封建說』兩文而言），可說得是『針鋒相對的』。然而他們同樣表現了兩個嚴重的弱點：第一、兩位先生都沒有從老子的根本思想，即從他的哲學及其對社會的基本觀念和主張上去爭論，多是陷於枝枝節節，甚至咬文嚼字地互相攻擊或對駁。在方法上看，兩者也都是陷於形式邏輯的。第二、兩位先生論爭的態度，是多分帶

感情的，甚至有不少處所是近於詆譏和謾罵的。這未免已逾越了討論學術思想的範圍，減損了思想家應有的風度。像這樣依照其邏輯發展下去，勢必走到離開學術的論爭而專事個人爭吵的庸俗道路上去的。尤其李先生對於陳振維先生的態度（見『答蔡尙思評我的老子看法』中的『餘興』一節），更已遠超過了前進思想家對於好學青年應有的態度。青年人就是說錯了，你也應當以道理去說服他，何況陳先生這次的見解并不算錯。而李先生竟以『倚老賣老』、『老氣橫秋』的態度，對之臭罵一頓，把青年人參加學術討論也算作『出風頭』，——這種態度，對於青年人固然是個打擊，但對於李先生是更為有損的。

上面的幾點意見，只能算是讀了求真一卷四期『關於老

評嵇文甫先生的道家與小農

李 季

一 緒論——蔡文和嵇文的對比

讀過求真四期蔡尙思先生的再評李季的老莊封建說和嵇文甫先生的道家與小農後，覺得前者沒有回答的必要，而後者却值得批評一下。為什麼？蔡文不獨不比那篇毫無是處的評李季呂振羽的老莊看法高明，並且更加支離破碎，尤其是大學教授『婆婆經』講義氣味非常濃厚，怪不得牠的副題標出『中國虛無主義史略』字樣。凡他攻擊我的地方，只有一點使我心折，就是我引用章太炎『談者多以老莊為任權數，其流為范蠡張良』一語，忘却註明老子為戰國中期人，應將范蠡除外。其餘都是不中肯的話。例如他的最得意之處是從老子的文義助字來證明我的『錯誤』：以為陳清泉先生告訴他，『「也哉」是「決辭」而不是「疑辭」。』我要問：『吾豈匏瓜也哉？』（論語陽貨）『此何木也哉？』（莊子人間世）這都『是「決辭」而不是「疑辭」』嗎？何況『我愚人之心也哉』的『也哉』即使是『決辭』，也屬於我所指的反話一類。又如另一最得意之處是指摘我一方面說道教與老子無關，另一

子孔子思想問題的論爭』幾篇文章後的感觸。我這樣隨便寫出來，似乎太欠慎重，但我急切地期望著：凡參加這次老、孔思想論爭的先生們，尤其是李、蔡兩位先生，在論爭時應特別注意於論爭的方法和態度，免致使得這次論爭又走到無結果地不歡而散的道路上去。

（八月十日）

思想與實際

人類的思想能否認識客觀的真理——這個問題絕不是理論的問題，而是實際的問題。人類應該從實際中證明其思想的真實性，即證明人類的思想是有真實力量并能達到現象裏面的。關於離開了實際的思想是否真實之辯論，乃是純粹經院哲學式的問題。卡爾

方面又說宋真宗徽宗崇奉道教。他以為這是拿住了我的弱點，遂破口大罵！決沒有夢想到農民和皇帝的崇奉道教，是完全兩樣的。農民從道教所獲的恰為假託的部分，即符籙鍊丹一類的迷信，完全與老子無涉；而皇帝所獲的固然也免不了這種迷信，但還要加上老子人君南面之術，因此和老子確實發生密切關係。例如宋真宗：

『吾見道士柴又玄，問以無為之要。』（宋史真宗紀三）

這是老子之道，而不是假託的符籙一類的東西。最顯明的是真宗之子仁宗對王曾所說的一句話：

『道書多言飛鍊金石，豈若老氏五千言之約哉？』（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十一）

由此可以證明崇奉道教的仁宗信仰老子，遠在信仰道教之上。他因奉道教而精研老子，故深懂治術。我在檢討老子對後世所發生的影響時，提及真宗等，原因即在於此。現在回顧蔡文中這兩種有力的反攻，尚經不起我們的一擊，其他更不用說了。因此我對於他的大文不能再『管』，藉副求真屢次要求

我縮短篇幅的雅望。

稽先生的大作却與此完全不同。行文嚴肅、結構細密，確是一篇學術性的論文。內中所列的五項雖無一不是似是而非，但毛病深藏在裏面，不是一望而知的，故不容易為一般讀者所發覺。豈止於此。連我的兩位對中學有深刻研究的老朋友，也為牠所欺，說是『不錯』、『很好』。像這樣的文字是值得我花點工夫，逐項加以批評的。

二 隱士、道家和小農銜接不來

稽先生的大文第一個小標題雖是『從隱士說到小農』，但中途插入道家，使隱士和小農從兩頭銜接道家，打成一片，因以顯示道家的階級性。這種方法頗見匠心，然因取材的不倫不類，終不能做到『天衣無縫』。他首先將論語微子中楚狂接輿的一段歌辭與莊子人間世中同一人更詳盡的一段歌辭對比一下，以為：

『從論語所載的接輿歌辭到莊子所載的接輿歌辭，恰好表示出道家思想的演化過程；而道家起源於隱士，這也是最好的一個證據。』

其實這是完全不對的。崔述以為論語最後五篇

『多可疑者。……微子篇雜記古今軼事，有與聖門絕無涉者，而楚狂三章語意乃類莊周，皆不似孔氏遺書。』（洙泗考信錄卷四）

崔述這種懷疑大有道理。莊子本與儒家有很深的淵源。田子方篇載魯哀公語莊子：『魯多儒士，少為先生方者，』說劍篇載越太子惺語莊子：『今天子必儒服而見王，事必大逆，』雖均屬假託，然出於他的門徒之手，至少他的為儒而儒服是真的，他由儒歸道（道家名稱起於漢初，只好借用），和他的門徒共同捏造老孔同時，孔子學於老子，因而有孔子問禮於老子的記事，竄入禮記等書（參看求真四期拙作答蔡尚思評我的老子看法第六項）。同樣，論語中的接輿歌辭也許就是莊子一派人竄入的，故兩辭大同小異。稽先生要從牠們中間去找源流，未免有點近於滑稽。

現在即退一步，承認論語中的歌辭是出於接輿之口，而莊子中的歌辭為道家所代擬，也看不出道家的源流來。因為道家以老子為開山祖，接輿的宗旨是要逃避現實政治，所以說『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論語微子）老子的態度是在積極指導政治，是要用種種巧妙的方法去治民，並且教人

『以正治國』（老子本義五十五章），『治大國若烹小鮮』（同書五十五章），『治之於未亂』（同書五十五章）這和接輿不是恰恰相反嗎？道家怎能起源於隱士接輿呢？

講道家雖不開老子，是當然的道理。然我們也不妨再退一步，像稽先生一樣，把兩種歌辭來對比一下。他以為：

『在論語中只看見道家思想的雛形，在莊子中才大放厥辭，展開顯明的理論體系了。』

這未免墮入主觀的確心論的深淵中。自我們看來，兩者雖有詳略的不同，談不到什麼『雛形』和『展開顯明的理論體系』。論語中歌辭的主旨是勸孔子不要從政，莊子中的仍不外這一套，有什麼展開可言？至於稽先生特別提出的『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和『來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的對照，與其用文學家的口脂去渲染，說後者『就引起人一種退思，使人穆然長思』，不如說牠較前者更消極，更頹廢，來得妥當。我們即處處讓步，仍用他的話來考慮：『退思』什麼？『長思』什麼？還不是他所引證並發揮的『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這種渺茫蕭索，悠悠千古之感嗎？打開天窗說亮話，還不是悲觀厭世，勸孔子不要從政嗎？這和老子的從政態度絕對相反，並且愈發展，彼此的距離愈遠。怎能扯到『……道家起源於隱士，這也是最好的證據』上去呢？

又子路批評荷丈人的幾句話為『不仕無義。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欲潔其身，而亂大倫。』稽先生以為：

『這不僅是批評一個荷條丈人，簡直是批評道家全體了。從這裏也可見道家和那班隱士的關係。』

道家的開山祖如果不是老子而是莊子，稽先生也許可以這樣說。但他論道家，明明首引老子，次及莊子，可見他是承認老子在道家的首要地位的。老子不獨如上面所舉，有許多主張從政的話，他就是周太史儋（參看求真四期拙著第六項），是一個實行從政的人。即莊子也『嘗為蒙漆園吏』（史記老莊申韓列傳），後來才隱居不仕。稽先生怎能將子路『不仕無義』的一段話扯到『批評道家全體』上去呢？這不是當着歷史的面說謊嗎？

然稽先生對於上面的種種說法，也許還有不心服的地方，我們不妨讓莊子一派人自己來開口。莊子刻意篇提及五種士，即『刻意尚行』的『山谷之士』，『語仁義忠信恭儉推讓』的『平世之士』，『語大功，立大名』的『

朝廷之士』，以及『江海之士』和『道引之士』。第四種士就是隱士：

『就蔽澤，處閒曠，釣魚開處，無爲而已矣。此江海之士，避世之人，閒暇者之所好也。』

道家對於這五種士都加以排斥，牠是超過他們之上，所以說：

『若夫不刻意而高，無仁義而修，無功名而治，無江湖而閒，不道引而壽，無不忘也，無不有也，澹然無極，而衆美從之，此天地之道，聖人之德也。』

所謂『無功名而治』，是道家主張不爲攫取功名而掌政權，『無江湖而閒』，是主張不避世於江湖之間去做隱士，應致力於無爲而治的政治，故雖在朝廷之中，仍然閒暇。牠既明明排斥避世之人，試問怎能起源於隱士？

當然，老莊派也有所謂隱士，莊子繕性篇說：

『古之所謂隱士者，非伏其身而弗見也，非閉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知而不發也，時命大謬也。當時命而大行乎天下，則反一無迹；不當時命而太窮乎天下，則深根寧極而待，此存身之道也。』

這種隱士和伏身不見，閉言不出，藏知不發的接輿、長沮、桀溺一批人是完全相反的。他當有道之世，固然要積極參政，即當無道之世，也不甘消極，準備隨時指導政治。老莊派既贊成這種待時而動的隱士，試問怎能起源於他們所非難的山林隱士？

道家的起源既和山林隱士無關，稽先生所說的隱士的『躬耕』，和他們所過的小農生活等等，本來可以不再討論。不過我們爲澈底暴露他的牽強附會起見，正不妨詳細考察一下。首先來看接輿。關於他的說法，至少有三種。那時的論議疏以爲他與夫子之輿相接而歌，遂名之以紀其人；嚴杰經義叢鈔以爲接輿即楚狂之名若字；皇甫謐高士傳以爲接輿楚人，姓陸名通，因昭王政令無常，披髮佯狂不仕，時人謂之楚狂。像這樣各持一說，殊難確定。然這種『江海之士，避世之人』，有些像行吟澤畔的屈原，不見得會循規蹈矩，躬耕南畝的。不意稽先生偏說：

『隱士往往都是「躬耕」。『長沮桀溺耦而耕』，『遇丈人以丈荷篠』，『有荷黃面過孔氏之門者』，都是顯明的例子。』

當然，這四個人都是隱者，都是『躬耕』的人，但和楚狂接輿的風格是兩樣的。稽先生專靠『往往』兩個字把他認爲道家所自出的接輿一起包括在『躬耕』內，這種銜接法真是繫于鈞於一髮！

他又說：

『這班隱士，不管他們原來就從小農出身也好，或是從別的社會階層轉變而來也好，但總之他們都是在躬耕，都是在小農的環境中生活着。自然，後來所謂隱士，不一定真正「躬耕」。如文中子的哥哥王績，雖然列在隱逸傳，但他却有好多頃田地，還養着一些奴婢。陶淵明說是窮的不得了，然而當他賦「歸去來」的時候，也居然還有「僮僕」在「歡迎」他。至於一班閥官，偶然官運不大亨通，於是戴冠野服，做一個冒牌隱士，他們當然更不至真正「躬耕」起來，只派人代替着「躬耕」儘可以了。』

稽先生這樣注重隱者是否真正『躬耕』，表見他的精密，不過這是不夠的。就春秋時代一般文化程度講，小農不會有多少文字知識，那班隱士自然不是從小農出身（小農家庭如果能產生一個智識分子，根本不會做隱士），而是從別的階級轉變而來，尤其是封建地主的破產者或貴族的失敗者必爲最大的來源。他們的『躬耕』是否即等於小農的耕作，他們是否『都是在小農的環境中生活着』，是值得鄭重考慮的。我們首先要問什麼叫做小農？西洋對於農民有種種不同的分法。我以為除掉上面的地主和下面的佃農雇農不計，凡自有土地的農民，分爲大農、中農、小農、貧農四種，較爲妥當而普遍。總之，通常所謂小農，是不依賴他人勞動，耕種自己土地的一種農民；他的地位只比自己土地不够耕種的貧農略勝一籌。既是這樣，稽先生拿什麼做標準來斷定長沮、桀溺、荷篠丈人、荷蕢者，甚至於接輿是小農，而一定不是地主、大農或中農？即就他所特別提出的荷篠丈人來講，一方面『止子路宿，殺雞爲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另一方面，和子路所說的一樣，知道『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場面相當闊大，不但小農夢想不到，就是中農大農也有望塵莫及之勢，大概是屬於破落的地主一流。由此可以證明稽先生把隱士和小農聯繫在一起，是完全沒有根據的。

『躬耕』不是根據嗎？稽先生一定這樣反駁我。我的答案是『完全靠不住！』怎樣講呢？在以農立國的中國，『躬耕』是古代貴族、王位繼承者，甚至於帝王一種自願的勞作（第一次世界大戰中主角之一的德皇威廉第二平日自願的勞作是做木匠）。書無逸載殷高宗『時舊勞於外』，『祖甲』：『舊爲小人』，『文王卑服，即康功用功』，就是明證。漢以來的天子躬耕藉田，雖不過一種虛有其表的典禮，然正是這種躬耕遺跡的殘存。到了封建時代，我相信一般封建地主除掉偶然的遊戲性外，是不會正式躬耕的。可是破落而又避世的封建地主，要身心有所寄託，是會躬耕的。荷、丈人和

長沮、桀溺等顯然是屬於這一類型。稽先生如果嫌這種例子欠明瞭，或太孤單，我還可從他所指的秦以後隱士不躬耕的時代中提出一種證據來。那就是諸葛亮。他的父珪是太山郡水，從父玄是豫章太守，由此可以推知他是一個地主。然「玄卒，亮躬耕隴畝，好為梁父吟。」（三國志蜀志諸葛亮傳）亮的前出師表也說：「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我們相信這裏所謂「躬耕」是真實不虛，決不是「派人代替着「躬耕」」，證以諸葛亮做主帥，帥師北伐時，「夙興夜寐，罰二十以上皆親覽焉」（諸葛亮傳注），就可以知道。然「躬耕」的諸葛係自由地主階級的代表而非小農的代表，是誰都承認的。由此又可以證明，稽先生把「躬耕」和小農聯繫在一起，也同樣是完全沒有根據的。

其實即便沒有上面的種種證據，專從「躬耕」兩字的字面着想，也可以知道牠們和小農根本不能發生關係。爲什麼？「粵之無縛也，非無縛也，夫人而能爲縛也；燕之無函也，非無函也，夫人而能爲函也。」（周禮冬官考工記）同樣，我們也可以說：

「大農、中農、小農、貧農之無躬耕也，非無躬耕也，夫人而能躬耕也。」他們的躬是當然的，所以叫做耕；王公大人和隱士的身份高貴，原不必躬，竟耕起田來，所以叫「做躬耕」，躬即親身之意，「躬耕」表示特殊和鄭重。「鄭真躬耕以致譽」（皇甫謐勸論），原因就在這裏。由此又可以證明稽先生稱「躬耕」的隱士「原來就從小農出身」固不對，即稱他們「從別的社會階層轉變而來」也不對。他們那種富有智識，出身高貴，而又隱遁的生活，和小農是相去很遠的。因此，稽先生即使不專以接輿爲道家的來源，並兼認長沮、桀溺、荷、丈人、和荷蕢者都爲道家的來源，也是不合史實的。

「難道只有小農出身的人才能代表小農，別的階級的人不能轉變來代表小農嗎？」稽先生一定又要這樣反駁我。我的回答是「別的階級的人當然可以轉變來代表小農的，不過決不是這一類的隱士。」一個人決不是生下來天然成爲隱士，一定是受了政治環境或其他事物的刺激，不能和原來一樣生活下去，才逃避現實而成隱士。如用稽先生的話來說，他們的目的是在「曲全苟免。」這種人大都出身於破產的封建地主和失敗的貴族，感覺非常敏銳，眼見自身以及本階級和本階級日趨破敗，前途無望，遂流於消極，不談政治，更不肯多事。那裏能够代表小農呢？凡一個代表被壓迫階級的人的態度總

不講爭鬥，總提出關於農工利益的積極要求；又如代表無產者的許行，無論怎樣與國君交接，總是提出無產者的積極要求，叫「賢者與民並耕而食。」獨有這種隱士對於世事不聞不問，只想和高臥南陽的諸葛亮一樣，「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他們真是自顧不暇，何能投身小農，爲之代表？稽先生自己說過：「古代政治活動的方式，是爭取君主」。即使這班隱士的生活降到小農的水平線上，也決不代表小農，「爭取君主」。他們既不是出身小農，又不代表小農的要求，試問稽先生把他們和小農聯繫在一起，有什麼意義？

還有一層，我們即撇開隱士不講，道家與農民（小農當然包括在內）也是絕對不能聯繫在一起的。爲什麼？

「耕之爲事也勞，織之爲事也擾。擾勞之事而民不舍者，知其可以衣食也。」（淮南子主術訓）

這種勞擾之事是農夫農婦的職業，是他們手足胼胝的孜孜有爲。這與老莊的清淨無爲是絕對相反的。然老莊代表統治階級（封建地主），農民是被統治者，上下相反却又相成。所以莊子一派人說：

「上無爲也，下亦無爲也，是下與上同德，下與上同德則不臣。下有爲也，上亦有爲也，是上與下同道，上與下同道則不主。上必無爲而用天下，下必有爲爲天下用，此不易之道也。……天不產而萬物化，地不長而萬物育，帝王無爲而天下功。……故曰帝王之德配天地。」（莊子天道）

這段話不是倡無爲的老莊一派人主張階級制，代表統治階級而不代表農民的鐵證嗎？

說到這裏，稽先生當加以反駁，以爲主張上之無爲，正是便於下之有爲，正是代表農民利益；而農民代表也不必親耕親織，故不能否定他們的代表資格。

其實不然。蔡尚思先生企圖用「老莊派的貧窮清高」來證明牠非封建地主階級的代表（求真四期蔡文），是非常幼稚可笑的。因爲孔子絕糧陳蔡，「糶糶終身，原憲蓬戶不完，桑樞甕牖，曾子「三日不舉火，十年不製衣」（莊子讓王），子思「緇袍無表，二旬而九食」（說苑立節），何常不「貧窮清高」，他爲什麼又說儒家代表封建地主階級呢？然問題不在他們的「貧窮清高」，而在他們的意志所趨，精神所寄。老莊派批評墨子道：

「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駭。使人憂，使人悲，其行難爲也，恐其不

可以爲聖人之道。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雖能獲任，奈天下何？離於天下，其去于也遠矣。」（莊子天下）

我國學人除郭沫若先生外，大都承認墨子是代表小有產者的農工的，而站在統治地位的老莊派不滿意於他的生動死薄，「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安」，正是確切證明他爲農工的代表。反觀他們自己，老子是：

『無爲也，而笑巧。人皆求福，己獨曲全，曰苟免於咎。』（同書同篇）

『以謬悠之說，荒唐之言，無端崖之辭，時恣縱而不黨，不以矜見之也。以天下爲沈濁，不可與莊語。以危言爲曼言，以重言爲真，以寓言爲廣。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敖倪於萬物，不譴是非以與世俗處。』（同書同篇）

這又描寫出一個完全沒有拯救希望的統治階級的代表自求解脫（出世）的神情，與農民又有什麼關係？

此外，貧窮清高雖不是鑑定一個人是否爲統治階級的代表之適當標準，然服裝對於他的階級性，却可以表見幾分。荀子富國篇稱：『墨子雖爲之衣褐帶索，啜菽飲水，惡能足之乎？』孟子滕文公上稱：『諸子衣褐』。疏：『一曰短衣也，又曰袍也，馬被衣也。』詩爾風七月：『無衣無褐』。箋：『褐，毛布也。』人之貴者無衣，賤者無褐。可見褐原爲貧者或赤貧的服裝，而智識分子自願『衣褐』，一定也是代表這種人的。在另一方面，莊子田子方篇稱：『儒者冠圓冠者知天時，履句屨者知地形，緩佩玦者事至而斷。』這裏所描寫的儒服是何等堂皇。孔子也是『緇衣羔裘，素衣麕裘，黃衣狐裘。……狐貉之厚以居。』（論語鄉黨）子華使齊，毋須『請粟』，然他仍『乘肥馬，衣輕裘。』（同書雅也）即以子路和子思之窮，也還是衣『緇袍』。據論語子罕『衣敝緇袍』疏：『緇袍，衣之賤者』，可見還是『衣』，不是『褐』，還是『袍』，不是『短衣』或『馬被衣』。莊子常備那，也是證他和儒家同爲統治階級的代表。

我們將老莊派所描寫的墨子、老子、莊子以及上節所描寫的墨子和莊子的服裝對比一下，便可以看出他們各自的階級性，更可以看出極力主張無爲的老莊確是封建地主階級的代表，與勞瘁的農民是格格不相入的。

現在總括起來說，嵇先生首先將論語中接輿的歌辭和莊子中接輿的歌辭對比，說兩者是有怎樣的源流，藉使隱士與道家結合；再憑『往往』兩字將

『身刺』與接輿渾道，縹牙這俚楚狂狂在『身刺』，藉使隱士與小農結合；於是隱士、道家、小農連成一串。但依照我們上面詳細的分析，大家就可以看出這一串是由嵇先生熟練的玩把戲的手法造成的，完全是虛幻的。在實際上，這三種人是一『道』不同，不相爲謀，無論如何，銜接不來。

三 老莊的理想社會與『小農社會』何關？

嵇先生以上述不相銜接的理論爲基礎，確定道家代表小農，於是戴起這副着色眼鏡，回頭來向老莊的書中找證據。第一個證據自然是老子的小國寡民了。關於老子的小國，不是什麼『原始部落社會或氏族社會』，我在再論老子與孔子第三項，和答蔡尚思評我的老子看法第五項中，已經或詳或略地討論過，這裏自不必重說。惟應當特別指出的是，嵇先生的解釋和他人一樣牽強附會。他以『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爲』等語作爲老子『對政府是何等的不信任』的證據，殊不知老氏只不信任當時橫征暴斂的惡政府，却非常信任守道的王侯所組織的政府，所以他說：『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賓。』（老子本義二七章）『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化。』（同書三二章）他並且永遠要有王，所以他說：『故天大地大，道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處其一焉。』（同書二一章）莊子一派人也說：『莫神於天，莫富於地，莫大於帝王。故曰帝王之德配天地。』（莊子天道）王與天地道同列，帝王德配天地，試問還有終極嗎？所謂王或帝王，不能是光桿，必須組織政府，政府是國家的機關，是階級制產生後的強制組織。老子代表封建地主階級的利益，主張王與天地同其悠久，也就是主張國家與天地同其悠久，所以他又說：『治人事天莫若嗇，……可以有國，有國之母，可以長久。』（老子本義五一章）稽、蔡、歐伯先生等硬說他的政府是『無所謂政府，即有亦等於虛設』，或『惡政府』、『虛政府』、『無政府』，而他的小國寡民是無階級無國家的『原始的村落社會』等等，也未免過於自由解釋，不顧老子一書的全文了。（抱朴子詰鮑篇雖標出氏族社會的形態，但和書中神仙之說一樣，係後來的發展，與老莊原意無關。）

當然，嵇先生對於這一點是另有證據的，即莊子法儀篇所謂『昔者宓戲氏、大庭氏、柏皇氏、中央氏、栗陸氏、驪畜氏、軒轅氏、赫胥氏、尊盧氏、祝融氏、伏羲氏、神農氏；當此時也，民結繩而用之。』一大段話。蔡先

生第二次對我的批評，也引用了這段話。其實這對於他們絕無幫助。莊子或其門徒的理想社會在表面上是和老子的不同，因為他們所舉的容成氏至伏羲氏的時代，的確是氏族社會，沒有國家的。不過他們沒有考古學的知識，也並不清清楚楚知道這一點。在實際上，他們仍在追求老子的小國寡民，所以接着便說：『鄰國相望，雞狗之音相聞，民至老死而不相往來。』（胥篋）這裏提出鄰國字樣，可見他們的理想社會仍舊是國。這是第一點。他們繼續說：

『今遂至使民延頸舉踵曰：某所有賢者，贏糧而趨之，則內棄其親，而外去其主之事，足跡接乎諸侯之境，車軌結乎千里之外，則是上好知之過也。』（同篇）他們在這裏只排斥『上之好知』，並不排斥『上』。這是第二點。

他們更明白地說：『賤而不可不任者物也，卑而不可不困者民也。』（莊子在宥）民與物同被視為卑賤的東西，只求怎樣去『治』，又卑視人民，還不是和老子的意思。這是第三點。他們既然要『國』，要『上』，又卑視人民，還不是和老子的小國寡民一樣嗎？其實這也無怪其然。他們都是代表封建地主階級的人，眼睛大都只向上看，不向下看（如墨子許行雖『爭取君主』，眼睛是向下看的，故墨子要求提拔農工，加入政府，許行要求在上的人與民並耕），

即向下看，也不過是要使民衆無知無識，蠢如鹿豕；他們對於民衆誠然沒有特別惡意，有時還予以體恤，如老子說：『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老子本義四二章）這就是淮南子所謂『善為人上者，不忘其下。』（穆稭訓）但他們滿具反動心情，只願民衆退步，絕不願其進步，他們所夢想的國家是：

『南越有邑焉，名為建德之國。其民愚而朴，少私而寡欲，知作而不知藏，與而不求其報。』（莊子山木）

老子倘發見了這個『建德之國』，一定心滿意足，發出會心的微笑道：『民之易治，以其愚多。』然發揮道家學說的淮南子更將老莊隱藏的心理和盤托出來了：

『夫牧民者猶畜禽獸也，不塞其園坵，使有野心，系絆其足，以禁其動，而欲修生壽終，豈可得乎？』（精神訓）

這就是老子所謂『不見可欲，使心不亂。……常使無知無欲。』（老子本義三章）等語的註釋，不過將統治者和被統治者的界線畫得更顯明罷了。總說一句：老莊一派人認民衆是永遠應受統治的。不過不應受有為的作惡的政府的統治，應受無為的善良的政府的統治。這就是他們說來說去，離不開聖人、王、帝王、上、國一類字眼的總原因。稽、蔡、歐伯先生等沒有找着這個

頭緒，竟想盡方法去替老莊裝飾一個無階級無國家組織的理想社會，因為離真相太遠，總是經不起批評的。

可是稽先生於歐伯和蔡先生所犯的上述共同錯誤外，更犯了一種嚴重的錯誤，就是將莊子的理想社會和小農聯繫在一起。他於徵引莊子書中上述一類的話後，讀為一個神仙世界，於是總結道：

『然而這個神仙世界，顯然是拿現實的小農社會作底稿的。』

這真令人莫明其妙！莊子及其門徒的理想社會是容成氏至神農氏的『至德之世』，或南越的什麼『建德之國』，決不在當代，至少是不在當地。誰能料到稽先生最後一轉，竟說『現實的小農社會』就是這個神仙世界的『底稿』？既是這樣，莊子等的理想社會就在當時當地，他們疲精費神去描寫什麼『至德之世』、『建德之國』，固然是多餘的，而稽先生將這些說法繁徵博引出來，尤其是多餘的。因為他們儘可就地取材，把這個『現實的小農社會』

表彰出來呀！然窺稽先生的真意所在，無非認莊子等要將當時當地的什麼小農社會改造成古代『至德之世』或南越『建德之國』，那麼，『底稿』兩字不是用的牛頭不對馬嘴嗎？

還有一層，稽先生對於莊子及其門徒所處的戰國中期和末期，大談其『小農社會』，表見他並不懂得當時的實際情形。當時是一個地主世界——日趨破敗的封建地主和日趨強盛的自由地主——所以農民中是個農佔最大多數。所謂『庶人之富者累鉅萬，而貧者食糟糠。』（漢書食貨志上）這雖是描寫商

鞅用事後秦國的情形，其實也同樣是當時各國的寫照。至於大農、中農、小農、貧農，為數極少，而小農僅為四者中的一種，數目自然更少了。因此，我們雖不否認當時有極少數小農的存在。但絕沒有稽先生所幻想的什麼『小農社會』的出現。他如果不以為然，我們可提出一個反證來。

『是時李悝為魏文侯作盡地方之教。……善為國者使民無傷而農益勸。今一夫狹五口，治田百畝，歲收畝一石半，為粟百五十石。除十一之稅十五石，餘百三十五石。食，人月一石半，五人終歲為粟九十石，餘有四十五石，石三十，為錢千三百五十，除社閭嘗新春秋之祠，用錢三百，餘千五十。衣，人率用錢三百，五人終歲用千五百，不足四百五十。不幸災病死喪之費，及上賦斂，又未與此。此農夫所以常困而不耕之心。……』（同書同篇）

這是先秦關於農民的最詳盡和最有價值的唯一文獻。然牠所描寫的是佃農的

情形，而不是小農的情形。如果像稽先生所想像的一樣，當時有什麼『小農社會』的出現，致為老莊所代表，李悝何致拋棄小農不寫而專寫佃農呢？

又如太史公說：

『凡編戶之民，富相什則卑下之，伯則畏懼之，千則役，萬則僕，物之理也。』（史記貨殖傳）

這裏所謂『民』雖包括工商在內，但無疑地佔大多數。所謂什伯千萬之富，當屬於大、中、小地主和大農，至於小農是談不到的。小農於貧富兩方面都佔不到地位，在戰國貧富懸絕的社會中，完全無足輕重。不意稽先生竟大談其『小農社會』，並將道家和他打成一片，也未免太不顧及事實了。

此外，稽先生又歷舉老子『佳兵者不祥』，作為『他反對戰爭』的證據？『民之飢，以其上食稅之多』，作為他反對重稅的證據。『如此等等，都是當權者所造的罪惡，是一般農民所最感痛苦的，而老子却替他呼籲出來。』其實這都是皮相之談，未能鞭辟入裏。老子雖說『佳兵者不祥』，但在這句話的上面說：『善者果而已，不敢以取強。』（李嘉謨釋為：『故善戰者因其不得已，果於一決，而不以是取強。』——老子本義二六章）在這句話的下面又說：『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他又說：『夫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善為士者不武，善戰者不怒，善勝敵者不與。』（同書五八章）他如果根本反對戰爭，為什麼津津有味地談『果而已』、『用兵』、『以戰則勝』、『善戰者不武』等等呢？後來莊子更說：『故聖人之用兵也，亡國而不失人心。』（大宗師——注：『亡敵國而得其人心。』）可見道家並不反對戰爭。至於老子反對重稅，然並不反對食稅。果如稽先生的主張，老莊代表小農，主張無為，又以無階級制無國家組織的『村落社會』為理想社會，何以不根本反戰，何以仍贊成食稅呢？這不是自相矛盾嗎？實則這種矛盾是稽先生自己弄出來的，與老莊無涉。他說得對：『道德經五千言，幾乎字字是在利害禍福上打算盤。』老莊都是代表封建地主階級的人，深知有時非戰爭無以維持階級統治權，非食稅便絕對不能維持政府的組織，故只反對一味逞強的戰爭，一味橫征暴斂的重稅，這就是『聖人去甚去奢去泰』（老子本義二五章）的意思。因為一味嗜戰，一味重稅，使民衆受不了，會引起叛亂，推翻統治階級，故不得不把算盤打得精密些。要能做到『因民而慮，天下為門。』（淮南子兵略訓）『既以爲人已愈有，既以與人已愈多。』（老子本義六八章）才算是聖人的手法，才不愧稽先生所謂老莊的『

大智慧』，蔡先生所謂『愚聖人』的作為。這對於民衆自然大有利益，但這從保持統治階級的長治久安出發，不是從民衆或小農的立場出發的，否則什麼王、帝王、聖人、上、國一類的名義和實際應一起除去，人類才有真正的自由平等可言。然這正是老莊所不肯做的。關於這一點，我前已約略說過，但稽先生等不願意理解，故不能再詳細發揮一下。

四 道家的處世哲學與小農何關？

稽先生在一、二項中既已替道家和小農造成一種很不自然的結合（有時小農實在太說不過去，便改作『一般農民』，見稽文第二項），以後自然是向這一條路走去。但最捉衿見肘的是第三項中所列舉的三點。今試分論如下：

一、『知足安命。』稽先生說：

『一般小農，在新（商人，自由地主）舊（封建領主）壓迫箝制之下，其生活狀況沒有多大發展改善之可能，因此只好在主觀上求安慰，遂養成一種知足守分，隨遇而安的心理。他們本來沒有多少蓄儲，於是就說：

『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老子卅

六章）

『他們本來比不上旁人的力量強大，於是就說：

『強梁者不得其死。』（老子卅五章）

『物壯則老，是爲不道，不道早已。』（老子四十七章）

他於這段話之後，又引伊索寓言一隻狐狸想吃架上葡萄，吃不到，便說牠太酸的故事，以爲『沒有力量的人，自己給自己寬心，每每如此。』

這些話真是愈說愈不像樣。我們已經證明，戰國時是佃農佔最大多數，『在新舊壓迫箝制之下，其生活狀況沒有多大發展改善之可能』的，無過於佃農、雇農，『沒有力量的人，自己給自己寬心』的，也無過於佃農、雇農，稽先生何以知道老子的話不是爲佃農，雇農而發，偏爲小農而發？又貧農也比小農更受新舊壓迫箝制，也是更『沒有力量的人』，他又何以知道老子的話不是爲貧農而發，偏爲小農而發？等而上之，中農、大農又何嘗不受新舊壓迫箝制，又何嘗是有充分力量的人，他又何以知道老子的話不是爲中農、大農而發，偏爲小農而發？說句老實話，專從老子上面那些話本身來看，加在雇農、佃農、貧農的身上，固然說得過去，加在小農的身上，也說得過去，

即加在中農大農的身上，又何嘗說不過去？但我們所以斷定那些話不是爲大、中、小、貧、雇、佃農而發，乃是爲封建地主階級而發，並不完全以那些話爲標準，還有他處處替統治階級着想證明出來。例如他講『聖人之治，』（《老子本義三章》）『奈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同書二二章》）『聖人終不自爲大，故能成其大。』（《同書二九章》）以及我們從前所舉，此處不必重複的許多例子，都是他以統治階級的代表發言的證據。以此和『多藏必厚亡』，『強梁者不得其死』等語對照，便可以知道老子是在對貪得無厭和逞強好戰的統治者下警告，而不是什麼代表小農『在主觀上求安慰』了。

二、『曲全苟免』。稽先生以爲老子所說的『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是：

『肚子吃得飽飽的，什麼都不去管他，這正是小農無可如何的一種老實打算。』

像這樣不顧老子前後文意和說話口氣，任意割裂，斷章取義，誠屬世間少有。現在只須將老子前後文一起寫在下面，便真相畢露：

『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是以聖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常使無知無欲，使夫知者不致爲也，爲無爲，則無不治。』（《老子本義三章》）

聖人與民對立着，即統治者與被治者對立着，還不够顯明嗎？老子明明叫統治者一面讓人民『肚子吃得飽飽的』，一面使他們『無知無欲』，實行愚他們一下（所謂『聖人以智籠羣愚。』——《列子黃帝》），並且『使夫知者不敢爲也』，這是何等富於權謀術數的辣手段！不意到了稽先生的腦袋中，民一律變成小農，這還不要緊，從統治者口中說出來的話，竟變成『小農無可如何的一種老實打算』，未免太奇了。

三、『消極反抗』。稽先生以爲『一般小農農因受新舊統治階級的種種壓迫，縱然極力委曲求全，極力向精神世界尋安慰，但反抗意識總不是沒有的。如老子說：

『民之飢，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飢；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爲，是以難治。』（《第六、十二章》）

『莊子說：

『彼竊鉤者誅，竊國者爲諸侯。諸侯之門，而仁義存焉，則是非竊仁義聖智邪。』（《胠篋》）

『這都是對當時統治者的惡罵，足以代表農民反抗的心理。』

稽先生這裏說『一般小農』，又說『農民』，前面並說過『一般農民』，不知小農是農民中的一部份，還是等於農民全體？這樣隨便混用，實令人莫測高深。至於老子的指摘以及莊子的惡罵，都是以統治階級代言人的資格，責備本階級中的暴君污吏，巨蠹神姦，雖也可以替小農以至一般農民吐一口怨氣，但並不是站在他們的立場上說話，否則必不以他們爲統治對象，兩言『難治』。如果把那句話描寫爲代表小農反抗，那就是說：『我們做小農的不容易被統治，是由於政府的好作好爲，所以不容易被統治。』試問這像小農代表說的話嗎？這能算做小農的『消極反抗』嗎？

五 道家的復古因時與小農何關？

稽先生以爲：

『剛從封建社會中掙扎出來的小農，一方面看，是進步的；一方面看，却又 是反動的。……在受不過封建制度的約束時，他們要進步；在經不起劇烈生活戰爭時，他們又不要進步。他們一方面主張因時，一方面又主張復古。這兩種矛盾思想，在小農們的心裏並存着，而老莊一流的學者恰替他們講說出來。』

稽先生這裏對於小農所說的，都是不着邊際的空話。固然，他又說過：『反因生產的集中，土地的兼併，無限制的生存競爭，使他們的生活更日趨於絕境。』這比較實在。但土地本來不夠的貧農較小農更苦，即中農、大農也不見得比小農好多少，在理這四種農民都應有『這兩種矛盾思想』，而數目不見得少於小農的雇農，以及佔絕對大多數的佃農比他們還要苦百倍，他從何證明道家專替小農『講說』呢？何況他所舉莊子天運、秋水、寓言中因時的例子，絲毫找不出小農的影子來，何以一口咬定這就是他們要進步的證據？至於道家『又要返淳返樸，表現出極端守舊的思想』，和小農更如冰炭之不相容。據稽先生的看法，老莊的理想社會是沒有私產的『村落社會』（歐伯和蔡先生也當然同意這一點），而小農是自有土地的人，私有觀念堅強無比，他們願意共產嗎？據我們的觀察，老莊的理想社會不過是加了一點花樣的周初封建社會。當時的土地大都在封建地主的手中，如詩周頌噫嘻中的『率時農夫，播厥百穀』，臣工中的『命我衆人，庠乃錢鏹』，所謂『農夫』、『衆人』，都是佃農。在西周以及東周的農事詩中，也找不出小農的影

子；我們固然不因此完全否認小農的存在，但數目一定是非常之少的。戰國中期和末期的小農如果夢想回轉到周初去，非使自己變成佃農不可。那不是更苦嗎？所以無論從嵇先生的觀點看也好，從我們的觀點看也好，小農決不願意復古，而他將代表封建地主階級的道家要變不變，要化不化的矛盾思想，作為『正是一般小農在一種矛盾的歷史運命中生活的反映』，完全是子虛烏有的。

六 道家的自然崇拜和性崇拜扯不到小農的身上去

末了，嵇先生又將『老莊的根本理論自然主義檢討一番。』他有時討論自然，有時又討論天，將牠們混在一起。就一般講，自然和天本來是異名同義，故胡適之先生將『自然的征服』（Conquest of Nature）譯做『戡天主義』（詳見後）。可是就老子講，這兩個名辭各有含義，所以他說：『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本義二章）但嵇先生最後指出這是『小農思想的反映』，那當然是指天，而不是連老子都『不知其名』的什麼『道』上面的一種東西——自然。因此，我們下面的批評專從『天』着眼。

嵇先生於徵引老子『有物混成，先天地生。』一段話，和莊子天運『天其運乎？地其處乎？』一類話後，又引荀子天論『大天而思之，孰與物畜而制之；從天而頌之，孰與制天命而用之；望時而待之，孰與應時而使之；因物而多之，孰與騁能而化之。……』與之對比，並作出結論道：

『老莊學說正是『大天而思之』，正是『從天而頌之』，正是『望時而待之』，正是『因物而多之』。他們完全服從自然，「蔽於天而不知人」，和荀子的戡天主教相對照，才格外顯出他們這種自然主義的不健全。……他看「自然」很平凡，可供人利用，並不是一種超絕的勢力。道家却不然了。他們極力贊揚「自然」的偉大、無限、不可測，完全是一種超絕人類以上而支配人類的神祕勢力。……我們應該知道儒家是站在「治人者」一方面，而不是站在「治於人者」一方面的。君相可以造命。參天地，贊化育，是他們的本分，所以他們儘能有那英雄偉岸的魄力，產生出一種戡天主教。至於道家學說，是小農思想的反映。看上面「處世哲學」那一節所述，可知一般小農是如何的微弱無力。他們除下死心塌地，聽憑自然命運的播弄，還有什麼可爲的呢？』

嵇先生這些話完全是斷章取義和矯揉造作的玩意兒，與史實並不相符。老子說：

『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老子本義五章）

這不是和『大天而思之』、『從天而頌之』恰恰相反嗎？他又說：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爲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同書二章）

『道沖而用之或不盈，淵兮似萬物之宗。……吾不知其誰之子，象帝之先。』

（同書四章）

所謂帝，和王弼註的一樣，是『天帝。』老子把商周以來一脈相傳的人格神的天或天帝無上的權威剷除了，因爲天之上還有道，天帝之先已有道，而『王乃天，天乃道。』（同書十五章）『地法天，天法道。』（同書二章）更明白宣佈使天降等，爲道的下屬。嵇先生既承認在『小農中間，原始的思想信仰總該保存不少』，而『老莊學說是當時小農思想的反映』，試問老子怎會蔑視天老爺，提出一個『吾不知其名』的什麼『道』來？

至於解釋荀子的戡天主教爲儒家『站在「治人者」方面』，『能有那樣雄偉的魄力』，也不是探源之論。儒家以孔子爲祖，他是接受商、周的傳統思想，承認天的權威的，所以說：『獲罪於天，無所禱也。』（論語八脩）『唯天爲大，唯堯則之。』（同書泰伯）『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吾誰欺，欺天乎？』（同書子罕）『天喪予，天喪予！』（同書先進）『知我者，其天乎！』（同書靈問）『天何言哉？』（同書陽貨）孟子的思想和孔子大致相同。如『若夫成功則天也。』『吾之不遇魯侯，天也。』（孟子梁惠王）『天之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同書告子）諸如此類，不勝枚舉。這不是『大天而思之』，……『從天而頌之』嗎？依照嵇先生的說法，孔、孟的學說，才真正『是小農思想的反映』！

嵇先生對於孔、孟的天道觀，絲毫不顧及，專拿戰國末年兼統百家，並特創一派的荀子的一段話來代表儒家，顯示其階級性，已經是舍源逐流。他又輕信胡適之先生的意見，以爲荀子這段話『竟是倍根的「戡天主教」』，（中國哲學史大綱三一〇頁）更屬無稽。因爲荀子明明說：

『故水旱未至而飢，寒暑未薄而疾，妖怪未至而凶，受時與治世同，而殃禍與治世異，不可以怨天，其道然也。……列星隨旋，日月遞炤，四時代御，陰陽大化，風雨博施，萬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養以成，不見其事而見其功，夫是

之謂神。皆知其所以成，皆知其無形，夫是之謂天。唯聖人爲不求知天。」
 「皆知其所以成，莫知其無形，夫是之謂天」注：「言天道之難知。」天道既「難知」，而聖人又「不求知天」，試問何能「截天」？（「制天命而用之」只是「……聖人知自然之道不可違，因而制之」（陰符經下篇）的意思，不能算作「截天」。）何況荀子明明說：

「天行有常，不爲堯存，不爲桀亡，應之以理則吉，應之以亂則凶。」（天論）
 他既承認天有常行之道，人只能作合理的適應，可見他原無「截天」的意思。孔子說：「不怨天」，荀子也說：「不可以怨天」，因此，荀子的天道觀和孔子的沒有絕大的差異。至於君相「造命」，固然不是「截天」，即「參天地，贊化育」，也不過與天地並立和輔助的意思，絕不含有「截天」的意味。這樣看來，就是後來的儒家和荀子也沒有「截天」的事。只有道家的老子使天降等，役屬於道，才是百分之百的玄學式的「截天主義」。稽先生稱「道家學說是小農思想的反映」，可說沒有絲毫真實性。

稽先生對於儒道兩家的天道觀既沒有弄清楚，對於老莊學說與小農對天道的「原始的思想信仰」絕不相容，又毫無所覺，那麼，他把老子書中「性崇拜的遺跡」（如「未知牝牡之合而峻作，精之至也。」）「玄牝之門，是爲天地根。」當作「小農思想的反映」，更屬渺茫。因爲在儒家所編的易經中，「性崇拜的遺跡」是更顯明些，如

「男女構精，萬物化生。……乾坤其易之門邪？乾、陽物也，坤、陰物也。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易，辭繫下）

什麼「構精」，什麼「乾坤」（按三三即兩性性器官的記號），什麼「陽物」、「陰物」，不比老子的「牝牡」、「峻」所表現的「性崇拜的遺跡」更厲害嗎？何以儒家這種學說是「治人者」（依照稽先生的意見，儒家代表封建地主階級）思想的反映，而道家這種學說才是「小農思想的反映」呢？由此可以證明他這種主張又是完全沒有根據的。

七 結 論

稽先生於此文束結之後，又順便說明四點。一、二兩點雖未指名，顯係附帶批評我的。一、「不能因某書中常見王侯等字，就說某家代表統治階層。」二、「……如儒家以儒士而代表貴族思想，道家以隱士而代表小農思想。……明白了這一層，則不至專從『士』的身分上來判定儒、法兩家的階級

性。」我以為要批評他人的論證，一個起碼條件是先忠實地概括他人立論的主旨，如東挖一句，西挖一句，斷章取義，自欺欺人地來批評，絕不合於客觀的科學的批評態度，是不能令人心服的。我在行不得也哥中說老子在「寥寥數千字的遺文中，除掉滿紙天子、萬乘之主、上、王、主、王公、侯王外，有三十一次說到聖人，二次說到君子。聖人和君子是什麼？就是精通治術人，即帝王之師，甚至於帝王本身。」稽先生的眼睛不應當只注視這段話的前半截，而忽視後半截。他既看過拙著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批判，也應當記得我並不因墨子滿紙「王公大人」而稱墨子爲封建地主階級的代表。所以他的「因某書中常見王侯等字，就說某家代表統治階層」一語如真爲我而發，可謂無的放矢。至於我說儒家代表自由地主階級，完全是由分析他們的言論而來，並不是「專從士的身分上來判定」，拙著俱在，可以覆按。不知他何以會發出這種議論來？他如果真正高興批評的話，儘可引用我的話駁個痛快，不要歪曲事實，信口開河。

綜觀稽先生十年前的大作（據說是「先秦諸子與古代社會中的一章」），在表面上處處表見他的觀察，去都能自圓其說。可是他的道家出於隱士，代表小農的基本認識，完全錯誤，故此形成的建築物雖高聳天空，却經不起我們的敲推。大家試回憶一下：逃避現實政治的隱士會變成積極指導政治的老子的導師；放浪形骸，長歌渾憤的接輿會變成盡力南畝的農夫；遁世「躬耕」的荷蓀丈人等會挾住道家，代表小農的利益；私有觀念根深蒂固的小農會盡棄所有，追求老莊的村落共產社會；孜孜爲利，爲日不足的小農會體驗到「多藏必厚亡」，安於現狀，不求升爲中農、大農，以至地主；衣食比較無虞的小農會不感覺知識的飢荒，只求「肚子吃得飽飽的，什麼都不去管他」；本受政治壓迫，急思反抗的小農，會明白表示自己的難治，是由於政府的好作好爲；終歲勤勞，不得休息的小農（墨子非樂上：「民有三患：飢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勞者不得息。」），會充分發揚他的意識，痛惡省力的機械，「仍然要守着他那種極笨拙的勞作方法」；墨守商周傳統的天道觀，素認唯天爲大的小農，會叫天老爺降等，屈居連老子都「不知其名」的什麼「道」之下——像這樣的矯揉造作，無論怎樣彌縫、粉飾、裱金、掛彩，令觀者爽心悅目，稱道不衰，但因太不自然，太缺乏真實性，一經暴露原形，便如海市蜃樓，終歸幻滅了！

李季的邏輯與態度

蔡尙思

爲老莊問題而答李季先生

我在求真雜誌一卷三期發表「評李季、呂振羽的老莊看法」，現在同刊四期已看見李先生的「答蔡尙思評我的老子看法」。這是李先生和我第一次的正面接觸。我在這決戰時期，持有兩種武器：一是注重證據，二是注重邏輯，比較偏於證據的重要論文，是同期的「再評李季的老莊封建說——中國虛無主義史略」；比較偏於邏輯的重要論文，就是本篇。這是交戰的李先生、和參戰的學者們、觀戰的讀者們，所要特別注意的。我除了證據最多的「再評李季的老莊封建說」，尙盼李先生能够同我一樣切實的答覆以外，現在特就他「答蔡尙思評我的老子看法」一文中要點，作一次直接的反駁。我在李先生辯論未接近「邏輯」，態度未接近「民主」以前，甚不想再花費工夫，和他作無謂的論戰了！不過我說這話，並不痛恨李先生，不但不痛恨，而且要大感謝他；我自會作文批判人家以來，從未有像這樣的大舉進攻過的。我初看到李先生的「答蔡尙思評我的老子看法」，也曾感覺「非常失望」；繼而思之，却又大喜起來：以爲假使對方沒有弱點，我根本就不會再作文，就使再作文，也是不足觀的。

一 李先生的辯論愈來愈不合邏輯

我把李先生「答蔡尙思評我的老子看法」一文，最不合邏輯的議論，歸納爲五大點，而把其他有連帶關係的重要問題分別附入，仍舊隨時提出證據，此點至希閱者察及！

1. 「尙離近於女性中心說」等於「雞就是公雞說」的亂比

李先生批評我道：

蔡先生說：老子「獨異於周末各家而尙離，貴牝，主張女性中心。」我看了這句話，馬上想起我們鄉間所流行的一個故事，就是：一個頑皮的學生議論語至

「雞雄爲妻而食之」一句，問先生這甚公雞，豈是母雞？天才的先生隨口答道：公雞，公雞！……我以爲蔡先生和誰可解「伯仲之間見伊呂」，不過這種東挪西挪的玩弄兒只配作茶餘酒後的惡資，不能提出於嚴正的學術討論中。老子的尙離、貴牝，都是變態的話，和所謂「女性中心」，真是風馬牛不相及。（「答蔡尙思評我的老子看法」，下文略引公論，概不再註明）

現在試把他不「嚴正」之辭指出給讀者看看！我說老子尙離、貴牝、主張女性中心，是偏於一方面的；而不是雙方面（如雌雄、牝牡、男女）和無方面的（如鴿、獸、人）而李先生却拿雙方面和無方面（如鴿）爲一方面（如公雞亦稱雄雞）的故事來和我說和提並論，「尙離近於女性中心」和「雞就是公雞」根本不相等，便不得相比。這一定要我說：「人就是女性」，然後他的「雞就是公雞」才不致「擬不於倫」，「作針鋒相對的辯論！」於此可見「東挪西扯」，真是風馬牛不相及的，倒是李季自己而不是蔡尙思。我還得「依照他批評我的話回敬」下：「李先生這種說法雖是不大容易看到的千古妙文，但和蔡尙思之說恰相反。」「當我讀這段話時，頗不相信自己的眼睛是在看一個老作家，而且自以爲是辯證邏輯專家的大作，試問這種神經錯亂的說法能達到反駁的目的麼？」「一個老作家而且自以爲是辯證邏輯專家，竟會寫出這樣幼稚可笑的文章，我再將這學術界作家抱悲觀！」

「辱罵的老作家的看法，沒有反駁的必要！」

至於道家有女性中心社會的傾向，我的理由很多：第一、是他們主張原始共產社會，（一切證據另詳「再評李季的老莊封建說」）原始共產社會同時也是女性中心社會。第二、中國古代思想家中只有老莊學派會明言貴男賤女，如「爾筮之說，便可爲老子做佐證，此點我已另詳於前文，不知李先生何以獨不看到？第三、一個人的思想色彩，當會於有意無意中流露到平日的言行來。說「可貴」而論，「尊卑」有時也不在「直言」之下。在先秦諸子中，如上階層的儒、法，最主張男性中心社會，所以到處痛斥女人；尤其是儒

家的易傳，說到天地、乾坤、陰陽、剛柔……之處，便連帶的以天、乾、陽、剛……譬喻男子，提出其貴男的主張。老子一書正和易傳相反；最當贊美、剛……這便可以想見他的還有原始社會的遺風，帶點女性中心的色彩。（老易異點，詳見拙作『中國學術大綱』頁一六二至二六五，張友蘭先生的『中國哲學史』把二者混為一談，殊不正確。）

2. 『最注重禮』就是『單靠一禮的』混談

我原文在司馬光論封建政治：『天子之職，莫大於禮』的前後，說：『封建社會，最重禮教，……儒家最留戀封建社會，所以最注重禮；老子對於禮却最反對，就是最反對封建社會的明證。……』李先生聞後罵癡大發，馬上說：『這真是一派迂夫子的腐談，表見他對於古往今來的階級社會絲毫沒有認識。……禮……法……缺一不可，……禮與刑正是封建社會的兩根柱頭；單靠一柱擎天的禮，能够維持秩序嗎？』李先生混一鼓『與一單』為一談，真是『昏頭昏腦！』我只說儒家『最注重禮』；而未說儒家單注『禮』。『最』是比較中的第一位；『單』是唯一無二，此外無他。而李先生却駁我道：『單靠一柱擎天的禮，能够維持秩序嗎？』他在上期曾說：『老子的階級色彩是最濃厚的。』如照他現在的看法，我就應該反駁道：『除了老子一人以外，就全不帶階級的色彩嗎？』我未嘗以此駁他（或只駁道：『可見儒、法諸家的階級，反是不大濃厚了。』），就是我的合邏輯；而他的以此駁我，就是他的不合邏輯。好比人家說：『近代一部分內閣，以其中的首相為最重要。』李先生聽見，一定同樣的駁道：『難道單有一個首相，就成內閣了嗎？不知還有其他管部的和不管部的各相，都是和首相並重的。』再如人家說：『人生以食為最重要。』李先生聽見，一定同樣的駁道：『難道『人』單靠『食』，就可以『生』嗎？不知還有衣、住、行、男女，都是和食並重的。』這到底那個合事理？讀者自然看得出的。儒家的政治，是以禮為本，認『禮』重於其他的，所以可說『禮治』；法家的政治，是以法為本，認『法』重於其他的，所以可說『法治』。這是事實不可否認的；否認此說的，一定會自以為不論儒、法各家，都是同樣的『禮、法並重。』這才『貴』是一派迂夫子的腐談，表見他對於古往今來的階級社會絲毫沒有認識。』（請再閱看拙作『再評李李的老莊封建說』二、！所引吳虞之說：『儒家禮制，首重等差，以禮定分，以分爲理，凡犯分即爲犯罪，故出乎禮，則入於刑，蓋儒

家所謂法典者，不外禮制之文而已。』）

李先生說：『一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禮記曲禮上）這禮與刑正是封建社會的兩根柱頭。……這是第一點。儒家的禮是狹義的前資本主義時代（與表面不定的中興集權制的時代）的禮，並非封建時代的禮。此時不獨刑已上大夫，並且禮也下庶人了。……這是第二點。『但在事實上，後於孔、孟的荀子，還主張：『禮者貴賤有等，長幼有差，貧富輕重，皆有稱者也。……』由上以上，則必以禮乘節之；衆庶百姓，則必以法數制之。（注謂：『君子用德，小人用刑。』）豈地而立國，計利而畜民。……』（荀子富國）這便可證明儒家正是主張『封建時代的禮』，『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了。李先生的混談，還帶成立嗎？

李先生既然要認『老子為初期封建社會的富有理想的代表，自然反對儒家的禮，但他自有一套禮』，便只好不可憐的舉『居則責左，用兵則責右』，『古事尚左，凶事尚右』一類與封建社會、等級制度無涉的禮為證。他因看見老子主張『復結繩』，和他的認老子為主張刑初封建國家之說相衝突，便很巧妙的說：

一個有理想的人，要創造一種物件，去以某物為藍本，再加上一點別的東西，是常有的事。老子的理想社會，中同一律。他……主張復結繩而用之，這是他於周初封建國家之外所加的花頭，無異畫蛇添足。蔡先生不懂得這個道理，一看見是，便大呼不是蛇，何其少見多怪？

我現在也可以仿他的語氣而對他說：『老子書中涉及後代吉凶之禮，這見他於原始社會之外所加的花頭，無異畫蛇添足，李先生不懂得這個道理，一看見是，便大呼不是蛇，何其少見多怪？』他聽見我這話，除了『無辭以對』之外，恐怕還會有點『作法自斃』。請君入甕，之感罷！李先生如有大本領，請你就老子書中舉出一種比儒家更重等級、更多等級的封建禮制，給我看看，（因為他認老子才是主張封建的，儒家只是主張對而不建的，照此理來講，儒家的禮制尚且那樣多等級；毋廢老子的禮制當然更要重等級多等級了！）才能使我心服！

3. 『講老子的『昏愚論』就要『實行老子的昏愚論』的妄疑

我在『評李李、呂振羽的老莊看法』的第二節第一段『只見片面！』只

根據少數而不注重多數」說：

李先生在『胡適中國哲學中大綱批判』，根據莊子外篇的『天地』所謂『君臣之義明』一段，來推斷老莊的『擁護君主，並要求回到最初的封建時代』；而不知再去看看天地篇的另一段文，及內篇的應帝王，外篇的胠篋、駢拇、在宥、天運、繕性，雜篇的盜跖、讓王等篇的對五帝三王以後的社會，尤其是周代的封建，更不上眼。

此外尚有馬蹄、庚桑楚、徐无鬼等篇。這明明是指材料應從多而捨少，誰也看得出；而我對於愚政府、愚人、愚下民的比較，也同樣的是說李先生只知根據愚下民的材料，而不知並看愚人、愚政府的材料，所以只是片面，而不是整個。但在手法老練，罵癡大發的李先生，却故意裝做不知道的說：

蔡先生解釋老子，何以說出這種缺乏常識的話呢？病根就在他要無中生有。……蔡先生在這個項目中指摘我「只根據少數而不注重多數」，我最初看了，莫明其妙。後來才領略到他所謂少數是指『愚下民』；所謂多數是指『愚政府』和『愚人』。我的揣測如果沒有錯，那又是一種自相矛盾的和極糊塗的分法！……所謂少數多數，完全是無意識的話。……可見他將老子的愚民政改為『愚人政策』，專在字面上出花頭，是徒勞無功的。

這在李先生，不但自己是巧妙的逃避我的批判；而對我又故意的加罪。有『無中生有』的『病根』的、『極糊塗』的、『徒勞無功』的，實是李季而不是蔡尚思。

我說：『道家反而以為愈沒有知識，愈沒有才能，愈沒有禮義愈高尚』，因為現在的教育，分大學、中學、小學各級，採取分數制，所以用來做比方，而說老子的教育，好比『叫大學教授去拜大學生做老師，叫大學生去拜中學生做老師，叫中學生去拜小學生做老師，叫小學生去拜幼稚生做老師。考得全對的，給他不及格；交白卷的，給他一百分』。這是說老子的教育在『爲道』，要減少知識，消滅知識；而和現在的教育在『爲學』，要提高知識，增加知識相反。例如老子說：『爲學日益，爲道日損』，『絕學無憂』，『！不是日益不如日損，爲學不如絕學，愈愚愈好嗎？這就是我那個比方的根據，那個比方是非常正確的，誰也會明白；難道老作家的李先生，反而看不出嗎？莊子主張三王不如五帝，五帝不如三皇，三皇不如三皇以前，（詳見求真第四期發表的拙作『再評李季的老莊封建說』）也就是愈退化愈

好，愈原始愈好，愈昏愚愈好的明證。但在李先生，那種罵癡又大發了，結果罵我道：

蔡先生竟替老子大唱其『昏愚』論，還怕人家不懂，拿現在的教育來做比方，說什麼『考得全對的，給他不及格，交白卷的，給他一百分。』不知他教四個大學，是否實行老子之教？我現在真有權利將他譏笑我的幾句刻薄話，恭恭敬敬地奉還他，就是『研究學問而到了這地步，真令人浩嘆，還有什麼話說呢？』

李先生因我講老子的昏愚論而妄懷疑或責問道：不知我教四個大學，是否實行老子之教？這個駁法，未免太笨！好比李先生講到『某肺癆病者的確是怎樣的死。』我一聽見，便問他道：『不知李先生是否實行某肺癆病者的死法？』這恐怕連李先生也會覺得很不合邏輯了！這才真是他所說『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哩！又我自己抱的是進化史觀，不但絕未表示是老子昏愚論的崇拜者和實行家，而且是老子昏愚論的反對者，既和一般因信仰老子而贊美老子者大不相同，李先生尤不應該『無的放矢！』我講老子的昏愚論是一事，我自己是否實行昏愚論又是一事。正像講人家的死法是一事，而講者本身是否那樣死法又是一事。在邏輯上，二者是不能混爲一談的。李先生到了這時，他所說我上次送給他那幾句刻薄話，也就只好親來領回了！

現在要附辯的有二點：第一、是道家認嬰兒赤子與愚人有關：李先生說：『不過他是教人去學嬰兒赤子的天眞質樸，則所謂歸真返樸，蔡先生連這一點被人說臭了的東西都不懂，竟替老子大唱其昏愚論。』試問李先生：『孩和愚者大真呢？還是大人和智者大真呢？自然是小孩和愚者比較天眞，』李先生連這一點被人說臭了的東西都不懂，竟替老子大唱其智慧論。『我的說這些話，也許他還會硬認這和老子無關；但王弼的老子注裏，不是也明說過麼？』『明』謂多見巧詐，蔽其樸也；『愚』謂無知守眞，順自然也。』這就可見愚與赤子嬰兒還是有關係的了。但在好辯成性的李先生，也許還會藉口這只是注解，不是原文。如果眞的這樣，那我就更進一步再舉老子原文爲證。老子以嬰兒與愚人相提並論：『我獨泊兮其未兆，如嬰兒之未孩（王注：『言我廓然無形之可名，無兆之可舉，如嬰兒之未能孩也。』）！我愚人之心也哉（王注：『絕愚之人，心無所別析，意無所好欲，猶然其情不可說，我類然若此也。』）尚思按：最可惜的是：李先生前文不知引此正確的注解！』沌沌兮。他又以『絕聖棄智』與『見素抱樸』並言，『愚』與『真』有關，實是無可否認的。反之，他說：『慧智出，有大偽』，又是明

認『智』與『偽』相連的。看李先生有什麼本領，再來大倡其『嬰兒赤子』的『天真質樸』與『愚人』的相反觀、二元論。

第二、是道家所要愚的並不限於民衆；李先生說：老子『所要愚的只限於民衆』，『講到聖人，老子更要聰明蓋世。』又在『行不得也哥哥』說：『他的目的是叫統治階級聰明透頂。』這和莊子所說：『三皇之知』是最惡毒最無恥，在上者好知無道會使天下大亂；『至人』是『黜聰明』，『忘其肝胆，遺其耳目』，不但不同，而且相反。此點我已另詳於『再評李的老莊封建說』，不知好辯成性的李先生，還有什麼話說？

4. 只許『比正面』不許『比反面』的不通譬喻（附論『讓他安安靜靜』與『替你們做奴隸』的矛盾）

李先生的『行不得也哥哥』說：

老子苦心孤詣，精思玄妙地說：『治大國若烹小鮮』，如譯成直率的白話，就是不要去騷擾老百姓，讓他們安安靜靜替你們做奴隸罷。這對於民衆，雖也不算壞，但畢竟是從統治階級的觀點和利益出發的。

我讀了這段文字，覺得第一、『讓他們安安靜靜替你們做奴隸罷』，這句話真是『滑』天下之大『稽』！不知如果肯『讓他們安安靜靜』，就不會『替你們做奴隸』，反之，如果要『替你們做奴隸』，就不會『讓他們安安靜靜』，這豈放任主義『與』『愚民政策』的不兩立的。以『放任主義』爲『愚民政策』，何異『指鹿爲馬』，『張冠李戴』？

第二、李先生這話，很容易令人想見反面：『不讓他們安安靜靜』，反得『替你們做主人』了。我上次『姑做李先生的口氣來說點反面話給李先生聽：一定要使老子反而說：『民甚畏死，儘可以死懼之』，像現在的法西斯蒂，才懂得李先生贊美爲『是老子的垂教，雖有助於當時的封建地主，却很無補於後代的統治者，至於代表或同情上層，從何說起』？……』你看了才覺得不合理，但又勉強拿『歐洲上等紳士視爲高過汽車的招搖過市的交通工具』來做譬喻駁我，這才是『絕對不能證明我的話是否錯誤！』（回敬李先生）你看見這話，一定會重說：這種頭腦，真是『一之爲甚，其可再乎？』但我請你慢些大發脾氣，破口亂罵！姑就很淺薄的普通邏輯來看，凡是從正面說得通的，則在反面也多說得通。例如『大前提』凡生物都會死，『小前提』

牛馬是生物，『斷案』故牛馬也會死。這是在正面說得通的。如『大前提』凡非生物都無所謂死，『小前提』泥土爲非生物，『斷案』故泥土也無所謂死。便是在反面也說得通的。再舉老子的話來做例子：假使『善者不辯』，『知者不博』，『知者不言』，是就正面來說；那末『辯者不善』，『博者不知』，『言者不知』，便是就反面來說的了。李先生大罵幾千年前的老子，其實你的頭腦還比不上他呢？試問李先生爲什麼因我的『大說其反話』，便要給你罵爲『不是四個大學教授的大作』，而『是一個三家村冬烘先生的頭腦』？請你快拿鏡子照照自己的面孔，到底像個什麼東西？

5. 李先生治學還應先從普通邏輯入手

我直到現在，才發現李先生連普通邏輯的常識也沒有，至少也是不會應用。他只要開口說話，下筆作文，便會大違邏輯；還配得上高談『辯證邏輯』嗎？奉勸李先生：不要自以爲年紀相當大，資格已經老，……還是快點先從普通邏輯入手吧！因爲如做李先生的口氣來說，就是『就李先生整篇文章看，處處粗疏，不合邏輯』。『誰也明白不合邏輯，曲解而不近情理的不是蔡尙思而是李季』。『李先生對於這點沒有弄清楚，竟有開工夫來笑我，我勸他以後還是多多研究、思索；少說多麼可笑的話罷！』

二 李先生的態度愈來愈遠離民主

1. 只許自己的大罵不許人家的小罵

李先生在答我的文末說：陳先生的『孔子不會革貴族的命』一文，『求真居然登出來，以致我不能不略予答覆。主編先生的用意何在，不得而知；至於我，完全爲的是尊重現在風靡一時的『民主』，一視同仁呀！』試問李先生：難道『求真』只能專登你的大作，而不許其發表別人的意見嗎？如你以爲陳先生是罵人的，所以不應該登出，那末在求真雜誌中，最喜歡罵人，同時也是最長於『一種破口大罵的技術』的，倒是你而不是陳先生，陳先生比起你，真如所謂『小巫見大巫。』不知『求真』的並登學者與青年人的文字，才真是『尊重民主，一視同仁』呢！李先生不許人家批評自己：如對方是『青年人』，就馬上痛斥爲『青年人……！做學問的本領一點沒有學到。』『既缺乏社會科學常識，又沒有歷史常識，也要來趁熱鬧，所以無一處地方

不錯」；（尙思按：「處」即「地方」，我不敢代刪，怕的是他又耍藉口亂罵！）如對方是大學教授，又馬上插斥爲「真是一派迂夫子的腐談」，「他是迂夫子之流」，「完全暴露了他是一個三家村冬烘先生的頭腦」，「神經錯亂的說法」，「這真是——「昏愚」的大學教授的看法和分法，……」這完全是鄉下婆鄉下老吵嘴亂罵的作風。假使我也要像你這樣不民主的態度，便可用你罵陳先生的話來把你罵一頓：「像這樣無理取鬧的漫罵，求真居然登出來。」但是，我不，我決不說這話，我以爲這種罵法，全是一種沒有人格的表现；我倒希望「求真」能够盡量地給李先生大「過」罵「癡」，以便給讀者比較、裁判。

李先生在篇首偽裝純正學者的態度說：

至於譏笑怒罵的語句，……偶一應用，可以宣洩胸中鬱悶，使文章生動，氣勢雄偉。本不必爲整潔，變爲雷聲；不過應適可而止，不能濫用這種武器作制服的工具。……

李先生自己對於「譏笑怒罵」，實是「永久應用」的，而「不止」偶一應用；實是濫用這種武器作制勝論敵的工具的，而不知多用其他正當方法。竊的如對於胡適的譏笑怒罵，可以不必說；近的如對於歐伯、陳振維兩先生和我這些論調，都是愈罵愈無忌憚的。

單據上述看來，已可想見李先生：第一、是「眼高於頂」、**「唯我獨尊」**的一種人。第二、是脾氣火氣大到不可形容的一種人；第三、他在論戰場中的態度，是法西斯的，而不是民主的。

2. 最後的悲哀

李先生又說：他發出第二砲，「招致三位的反攻，聯說摩拳擦掌，準備擄殺的，還大有人在，「衆矢之的」，正是我現在的處境。」這裏所謂「第二砲」，是指關於老孔思想問題的論爭。而求真第四期，稽文甫先生又用「道家與小農」一文來反攻，他的見解多和我相同，而也是大學教授，這在李先生看來，「我不難想像他是在搖頭擺腦，氣憤填膺」（這些話還給李先生）而說：「迂夫子怎麼這樣多！」奉告李先生：怎樣氣也沒有用，怎樣罵也沒有用，任何空論也沒有用，任何手法也沒有用；最有用的只是證據，證據才是「多多益善」的！

三 其他

1. 李先生注重形式的又一證明

此點詳見「求真」四期稽文甫先生「道家與小農」篇末附論（一）（二）兩節。

2. 李先生對於老子時代階級看法的過於聰明

我上次對於李先生的老子時代考，表示同意，只是大體上的。我和他同中有異：一、我說的側重書，他說的側重人。二、我原文是指頭一個看法，是莊子萬言，所說孔老，實不足信。其次，才是有兩個老子之說，我最大的目的是在否認春秋時代有個禮教大師的老子，著此反對禮教的五千言。李先生的說我盲從梁氏的話，和我的原文，是有出入的。我所說的戰國末年，是廣義的，大概的。正如唐代、清代的究竟要分幾期，是沒有一定的。我相信現存的老子一書，一定經過後人修改補充，出現當較晚；不然，何致一本書內，也會很多自相矛盾？（不止如李先生所指的）至於李先生津津有味的說：老子應長於孟子四十歲左右，宣王卒時老子達九十歲左右。『太史儋即老子的舊聞，確實可靠』，這既很像講鬼；而又和他『再論老子與孔子』所說：老子即太史儋，『比孟子約早二十多年』，自相矛盾，真是『昏頭昏腦』！他說：『以信傳信，以疑傳疑，正是史記，可取的地方』，在我正有此意，所以不敢像他的武斷臆說。容後有空，當另作專文發表我的見解！

我認道家的階級，上不如儒家，下不及農家，所以他們的思想不很徹底，這是我看法的慎重。李先生說他們是舊貴族、舊統治者即封建地主，主張封建社會，這是誤認儒家爲道家的。但他却以爲非如此臆斷，不能表示其聰明，所以反來罵我「昏愚」好了！我就把他罵我的話反一反，用以贊美他：「這真是替老子唱「智慧」論的「智慧」的老作家的看法和分法」，聰明的李先生，聽見我的「贈言」，一定是很高興的！

三五八，一二

【附誌】我對於李先生越過學術範圍以外的批評，爲了愛惜「求真」的寶貴篇幅起見，恕不在這裏多發言論。（尙思）

論古典主義戲劇 [下]

冰夷編譯

假使說，在喜劇《塔邱夫》中，莫里哀是展示他的反宗教的態度的，那末，在喜劇《唐璜》(1665年)中，他是激烈諷刺暴露那特權的貴族階級的。貴族階級在那一個時代還利用着政治的力量，擋住在布爾喬亞擴展政治勢力的去路之上。

莫里哀在這一個喜劇中，利用那流傳得很廣的關於那一個專門勾引良家女子的唐璜的傳統，來達到他的純粹的諷刺目的：描寫貴族階級的否定的特點，不事生產，無憂無慮，淫亂放浪，胡裏胡塗，極端自私等等。唐璜以於他那些純貴族的罪惡，甚至於他的父親也出來反對了。他說：『要是沒有德行，門第是一錢不值的。』『我寧可喜歡一個充當脚夫而為端正的兒子，不要一個身為帝王而像你這種品行不端的兒子。』他的僕人斯迦那萊爾以擊唐璜的行為也很激烈：『難道因為他是貴族，您帶着漫得很漂亮的假髮，戴着插羽毛的帽子，穿着金光燦爛的衣裳，掛着火紅的緞帶，就以爲您因此而比別人聰明，一切都可以做而沒有人敢對您說實話了嗎？』

莫里哀想借唐璜的形象來說明，法蘭西的貴族階級已經處在文化和道德淪亡的情況之中，他們無權掌管他們所把持的政權了。

莫里哀對於貴族階級所拘的否定態度也表現於喜劇《暴發戶》中。這一個喜劇中的主要人物是富商朱爾頓，他的特點是極端的粗鄙，愚蠢和虛榮。他的主要目的是效顰和接近貴族，假使可能，更想獲取貴族的稱號。第一步，他先學會外表的貴族的風度，貴族的體態，服裝，教育。爲了這一個目的，他聘請了音樂、擊劍、跳舞和哲學的教師。

這些教師們的自己的教育水準也不很高，但是他們却非常傲慢，目光如豆，而且慾壑難填。他們很明白，他們是對付一個冥頑不靈的商賈，所以他們公然的向他壓榨。這些教師利用朱爾頓的粗鄙，竭力向他誇大他們教授他的那些藝術的意義。據音樂教師說，『沒有音樂，任何國家都不能生存。』一切戰爭，一切紛爭，世界上的一切，都是因爲不了解音樂而發生的。『對於這一切議論，朱爾頓都完全同意，他非常熱心地繼續他自己貴族的

藝術和科學的功課。哲學教師教朱爾頓學習書法，但是却先使他認識初步的音韻，就是單音的發音方法：A, E, I, O, U, P, R. 之類。但是朱爾頓比較關心地的却是實踐的目的：『學會寫情書。』教師問他要用什麼方法寫——用詩呢，還是用散文，——朱爾頓回答說：『散文和詩都不要。』教師向他解釋，說我們祇能用這兩種方法表達我們的思想，這種話在朱爾頓心中引起了天真的驚異：『好啊！我用散文說話說了四十多年了，竟連自己也不知道。』但是朱爾頓並不滿足於學會貴族的風度和藝術，他而且努力和最顯要的貴族進入直接來往的關係。

他維持貴族陀朗特的友誼，他夢幻着想通過他的關係去認識陀里孟那侯爵夫人，非但她的貴族的地位被他羨慕，而且她的美貌也使他傾倒不置。陀朗特伯爵却是一個平常一般悖德的貴族。他利用朱爾頓醉心於一切貴族的事物的心理來遂行自己個人的目的：取了他大量的金錢不還，在他家中設宴款待自己的情婦陀里孟那，似乎是爲了介紹朱爾頓和她認識，朱爾頓交給他轉給陀里孟那的金鋼鑽戒指，他却以自己的名義去送給她。

爲了想混進貴族圈子，朱爾頓決定犧牲自己的女兒劉西爾來達到這一個目的。但是他的女兒是愛一個正直的平民克萊安特的，他也愛她，並且願意和她結婚。克萊安特向劉西爾的父親求婚，但是朱爾頓一打聽出克萊安特不是貴族，就表示拒絕。克萊安特聽了自己的僕人高維愛的獻議，決定採用欺騙的方法來達到自己的目的：他化裝成土耳其人，自稱是土耳其蘇丹的兒子，向朱爾頓表示他愛慕他的女兒的意思，求他答應把她嫁給他。這一次欺騙行爲，有關係的人物都參與：朱爾頓的女兒，他的妻子，甚至於陀朗特伯爵和陀里孟那侯爵夫人。由於朱爾頓的愚蠢，欺騙成功了，他同意他的女兒和土耳其蘇丹的兒子——就是說和克萊安特——結婚。

和朱爾頓及其崇拜貴族的荒謬觀念相對立的是朱爾頓的妻子，他的女兒劉西爾，她的愛人克萊安特和女僕尼柯爾。他們都有着積極的質素：思想健

* 本文在第五期發表者爲中篇，題下排作〔中A〕，多『A』字，特此更正。(編者)

至，有進取心，忠厚正直，把愛情看得很嚴肅。朱爾頓太太對於陀朗特伯爵看得很清楚，她揭破他的欺詐行爲，她直爽地告訴她的丈夫：『這位先生把你變成乳牛了。』她一點也不羨慕貴族的尊榮，她想給女兒找一個『門當戶對的丈夫』，因為這樣的丈夫不會埋怨自己妻子門第低微和尊重她父母的職業與階級。她竭力保護自己家庭的權益，猛烈反對丈夫的靡費，反對貴族來干涉別人的家事，她不怕對他們當面說實話。丈夫責備她，說她不該在大庭廣衆之間這樣粗魯地侮辱貴人。但是她答道：『他們的高貴我也聞得臭透了！我是保護我自己的權利，女人都會站在我這方面的。』無疑地，作者也是站着這方面的。

在平民克萊安特身上，莫里哀也創造了一個積極的形象。他熱烈愛戀朱爾頓的女兒西爾，純粹是爲了傾倒於她個人的品性，沒有任何旁的利害關係和觀念。但是爲了得到朱爾頓的同意，克萊安特認爲是不能隱瞞自己的出身的：『我相信，』他說，『一切的欺騙都會降低一個正直的人的品格。我不想假造我的出身，雖然也許有許多人站在我的地位會認爲是有權這樣做的。我老實說：我不是貴族。』和朱爾頓相反，克萊安特並不以自己的社會地位爲可恥，他尊敬自己的父母：『我的父母是在社會上佔有可敬的地位的。』克萊安特自己確定了自己的行爲的原則：『我有信念，這種信念我永遠不推翻。』

在『喬治·唐登』(George Dandin)和『暴發戶』這兩個喜劇中，莫里哀接觸到同一個主題，就是他起來反對那些傳染着貴族的傲慢心理而竭力想接近貴族和學習他們的生活風度的布爾喬亞代表。

戲劇在這裏反映出一個有趣的變動：致富的布爾喬亞爬進貴族中去，而破產的貴族却想依靠和富商或有錢農民的女兒結婚而來彌補自己有點動搖的經濟。莫里哀要求平民保持自己的身分的尊嚴，不要弄得像插孔雀毛的烏鴉。喬治·唐登是一個致富的農民，他娶了貴族的女兒做太太，爲了自己的虛榮而得到了殘酷的報應。他的太太的高貴的親屬都輕視這『村夫』，他的太太並且給他戴綠帽子，唐登想揭破這一個圓到狡猾的女人的企圖都沒有成功。喬治·唐登仍舊受着愚弄。劇本的寓意，在這一不幸人物的獨白中表現得很明顯：『我的婚姻，對於我們那些想高攀貴族的弟兄，種田人，可以作一個很好的教訓……他們之和我們接近，那是所謂表面的，不過是和我們的錢接近吧了。和錢，他們是無論怎麼血親的關係都可以認賬的。現在我非常明白，自己已有了一切財富，娶一個平平常常老老實實的鄉下姑娘，日子要好

過的多。』

莫里哀的喜劇已經充滿着階級革命的反抗，這種反抗在下一個世紀中形成了第三階級對抗特權的貴族和僧侶的有組織的鬥爭。不錯，莫里哀還沒有打算動搖現有的秩序，他的反抗沒有越出道德和心理的範圍。不過在斯迦那萊爾的話中(見上面)，已經可以捉摸到未來的風暴的朕兆。

莫里哀戲劇的一般的布爾喬亞性質非但表現在他的反抗之中，而且，也表現在他憎恨那整個浮華世界所依傍的虛偽欺詐之中。莫里哀，毫無疑問，是布爾喬亞的思想家，是布爾喬亞美德的宣揚者。

假使把莫里哀的積極的理想有系統地收集起來，可以歸納成一個勤儉、開明而善良的布爾喬亞的平和的家庭生活。家庭，而且是合理而正常地組織成的家庭——這就是社會的道德基礎。丈夫不大拘束自己的妻子，妻子也不惡意地利用丈夫的自由主義的觀念，大家互相信任，婚姻以愛情和自由選擇爲基礎，丈夫爲家庭獲取生活手段，妻子合理地經管家事，不作份外的奔忙，——這些理想就是莫里哀以之來對抗貴族的腐敗與糊塗以及社會道德的淪亡的。

莫里哀反對統治階級的曝露性喜劇的戰鬥性，證明第三階級的影響。是在生長起來了。

布爾喬亞開始確立『民族』的自覺，有許多多形式各式各不相同的社會集團跟着布爾喬亞走。布爾喬亞預備担任革命領袖的腳色了，在一百年之後，和特權階級開始了堅決的戰爭。

二 莫里哀作品的特點

莫里哀的文學風格的一般的特點是由古典主義確定的。

在莫里哀這種受了古典主義影響的形式中，第一點可以提出的是人物形象之合理的典型化。在各種場合中創造出圖式主義的人物描寫。古典主義作家們所共有的這一特點，當時普希金就已經很正確的指出過。把莫里哀和莎士比亞放在一起評論時，普希金寫道：『莫里哀的守財奴就不過是吝嗇；而莎士比亞的夏洛克却是吝嗇，敏慧，機智，復仇心強烈，待子女慈愛。莫里哀的僞君子，當他追求他的恩人的妻子時，是僞君子；接管財產時，是僞君子；要一杯水時，是僞君子。』這種單方面創造人物性格的原則，雖然也沒有喪失掉莫里哀人物形象的生動和表現力，不過這完全是受着古典主義規

律的約束的。

在人物形象圖式化的原則中，產生了把人物清清楚楚的分成兩羣的傾向：肯定的人物和否定的人物。這種分法，我們也可以在莫里哀的劇本中找到。譬如在喜劇『暴發戶』中，我們可以看見以朱爾頓，陶朗特和陶里孟那等等為代表的刻劃得非常清晰的一羣否定人物和以朱爾頓太太和克萊安特等等為代表的一羣積極人物。

莫里哀許多劇本有一個特點：多用所謂 *raisonneur* 的角色，就是那以叙述作者的積極的綱領為主要任務的人物。這些 *raisonneur* 平常總是在台上議論一通，但是却沒有行動。譬如像『塔邱夫』中的克萊昂特。

最後，莫里哀劇本的結構是以結構線路清爽，基本思想明顯和沒有奇思幻想為特點的，這也使莫里哀接近古典主義。

但是，站在古典主義陣地上的莫里哀，同時也很明顯地透露出避開古典主義的傾向，甚至於古典主義理論家布亞洛都曾經注意到這一點。這種傾向首先表現於莫里哀的人民性及其構思的民主性之中。喜劇『塔邱夫』和『暴發戶』清楚地露出了莫里哀的這些民主主義的傾向。

再有，莫里哀之顯露出階級集團的特性也是使他明顯地離開古典主義的。對於貴族的嘲笑和相反地對於布爾喬亞的弱點的寬大，這也都是顯然破壞以貴族為主的古典主義的社會原則的。

再有，莫里哀對於劇本中悲劇性和喜劇性的分別不大顧到，而且不受結構的一致性的約束，這也顯出莫里哀是不守古典主義規律的。莫里哀在許多劇本中，對於時間的一致和地點的一致是很隨便的。

最後，莫里哀的民主主義化的語言比了古典主義理論所規定的要進步。莫里哀不守古典主義規律的這一特徵都可以證明，他在這古典主義風格的内部佔據着獨立的陣地，他一方面是古典主義的正式的擁護者，一方面却是處身在舞台寫實主義的奠基者之列。

即使由於法蘭西勞動人民大眾的饑餓、貧窮和無學還在莫里哀的視野之外和這寫實主義還有着階級性的限制。但是重要的是莫里哀能真實地反映當時法蘭西無數階層的生活狀態，能對法蘭西社會的缺點抱着批判的態度，能對構思取民主主義的態度和以深刻而真實的心理描寫來充實他的人物形象。

說到莫里哀劇本的技术，則應該指出意大利『假面喜劇』(commedia dell'arte)和古法蘭西的趣劇(farce)對於它的影響。從這些樣式中(尤其

是從『假面喜劇』中)，莫里哀借用了僕人和學識淵博的醫生的人物典型以及許多喜劇的手法：化裝易服，攻擊，喜劇性的重復和滑稽的摹倣，旁白(A parts)等等。

化裝易服的手法，譬如說，在喜劇『暴發戶』中是運用得很巧妙的。在第一幕第二幕中，朱爾頓一會兒穿袍，一會兒穿襯衫，在第二幕第八、第九兩景中，朱爾頓試穿衣服的樣子。第四幕第五景中，高維爾化裝成土耳其人登場等等。

滑稽的摹倣的手法在這喜劇裏也有用到，如朱爾頓重復舞蹈教師的命令(第一幕第二景)，摹倣擊劍教師和哲學教師的指點等等。

莫里哀的劇本中也常常可以遇到打耳光(『暴發戶』第三幕第景六中)和偷聽(『塔邱夫』)等等的舞台動作。

這一切喜劇性的技術在舞台上演出時是會產生強烈的喜劇效果的，何況外表的喜劇性的手法常常很容易影響觀眾。

還應該指出莫里哀的一個舞台手法，這是莫里哀自己發明的。那是在喜劇場面中加進舞劇(Ballet)的成分。喜劇『暴發戶』中第二幕第九景朱爾頓化裝的舞劇場面和第二幕第十景中學生舞蹈的場面以及劇本結尾的有名的土耳其儀式等都可以作為這種手法的證明。

糾紛和結局，有時候在莫里哀劇本中僅列於次要的地位。例如，『塔邱夫』中的結局是非常突然的。輕視糾紛、糾結和解決的原因是由於莫里哀看得最重的是人物性格，而不是糾紛。

莫里哀劇本的語言所引人注意的是自然，是有生氣和有人民性。採用口頭材料的方法，在莫里哀劇本中，常常是追求着他整個喜劇形式所特有的喜劇性效果的目的。在這些手法中，第一應該指出的是利用文字游戲(Caricature)，採集別種方言裏的字彙(例如：拉丁文，土耳其文)，原封不動地重復同樣的聲音和字句，以便引起某種喜劇性的反應。譬如說，『暴發戶』中高維爾和克萊安特的『土耳其話』，同一個劇本中朱爾頓的文字游戲：『我用散文說了四十多年了，竟連自己也不知道』等等。一般說來，莫里哀的文字應該認為是徹底而明顯地實行他的偉大作品中所表現的喜劇樣式的原則的。

五 法蘭西古典主義的衰微

●利用同一個字的異義或者聲音相似的字來說笑的一種方法。

在十八世紀的時候，古典主義漸漸地衰亡。偉大的古典主義作家高乃依和拉辛，由一些嚴守着古典主義規律和手法的平凡的摹倣家們所代替了。悲劇對於他們是一種不必觀察生活和研究活人的文學的練習而已。

現在已經沒沒無聞而在當時却是非常出名的劇作家克萊里昂，認為能技巧地把任何題材歸納進合於規律和合於世俗趣味的需要的形式中去的才是真正的藝術。

伏爾泰(J.F. Voltaire 1694—1778)是以古典主義的風格寫他的悲劇的。他是拉辛的崇拜者，他誠心地保護着十七世紀遺下來的某些形式。但是時代的感覺給伏爾泰以暗示，使他覺得古典主義悲劇的形式不是最適應於那向上的階級所提出的新內容的形式。他感覺到，怕向觀眾描寫太過強烈的情熱的表現，祇習慣於表現事情道德的原則——這幾乎揷除了悲劇中的一切行動，把悲劇變成爲頗爲簡單的「五幕談話」。到英吉利去的時候，伏爾泰不得不爲莎士比亞戲劇之粗野的力、緊張的情慾和迅速的行動所震驚；他雖然認爲這些戲劇是野蠻的，但是和這些戲劇一比，法蘭西的悲劇，他覺得似乎是太枯燥和冷淡了。莎士比亞的影響繼續了二十年之久，但是這位古典主義者戰勝了它，伏爾泰仍舊忠於古典主義的規律，他對於在英吉利戲劇和小市民戲劇「影響之下侵入悲劇中去的那些粗野而猛烈的悲壯非常反感。他企圖利用古典主義悲劇的形式來使佈自己的思想。他的『愛狄普』(Oedipe)、『勃魯特』(Brutus)、『梅洛普』(Merope)、『穆罕莫德』(Mahomet)是保衛自由、平等和寬容的戲劇化的政治小冊子。

其他一切摹倣高乃依和拉辛的作家都不值得提起。舞台上的古典主義是完結了，甚至於伏爾泰也無法挽救它，他結果沒有留下一部出色的悲劇。

除了證明法蘭西古典主義的日暮途窮的批評（見本文中盧麟等人對於莫里哀的攻擊）之外，除了建立和增強「悲喜劇」——實在就是布爾喬亞戲劇——之外，同時一方面，布爾喬亞的觀念論者，企圖利用古典主義悲劇的形式，作爲反抗絕對主義的政治鬥爭的工具，雖然他們從前也曾經過了使絕對主義理想化而努力過。伏爾泰在外形上是擁護高乃依和拉辛的傳統的，但是他的構思最有着異國情調（exotisme）傾向的「穆罕莫德」，「中歐極樂」，（L'Opérette de la Chine），「斯吉甫人」，（Les Scythes），而且他作品中的政論性的成分明顯地超過於藝術性的成分之上，這種特點也證明

舊形式是在衰微了。

古典主義悲劇的短時期的復興，在法蘭西大革命高潮時期又顯示出來；這一次的古風的回復，文學之古典主義風格的傾向，都是布爾喬亞所追求的，布爾喬亞「遮掩住他們自己的鬥爭的有限的內容而把他們的熱情集中在歷史悲劇的巔峯上。」（卡爾·馬克思：「路易·龐拿帕特二月十八日政變」）。由此產生了索倫，雷米葉，塞尼葉等人所寫的那些和雅各賓黨人同死滅的政論性和煽動性的悲劇。「剛剛創立了新的社會機構……就消失，那從死亡中復活的古代世界——勃魯特，葛拉古弟兄，護民官（tribunes），元老院議員（senator）和甚至於凱撒。真正的布爾喬亞的指揮官現在在辦公桌子之前去了。他們爲生產財富和進行競爭的事務所吞食了，他們忘記他們搖籃旁邊也有了古羅馬的暗影。」（馬克思語）十九世紀時復興古典主義悲劇的企圖（龍薩爾）是有着一切摹倣的特點的。

六 古典主義戲劇在西歐其他各國

法蘭西古典主義戲劇所完成的周期性的發展和它對於其他各國古典主義戲劇所起的重要影響是最完全的。

在英吉利，古典主義的樣式表現得比較不大鮮明，那地方，對於古典主義樣式的發展，沒有相當的社會基礎；沒有那同時依賴於貴族和布爾喬亞的絕對主義君主政體。王政復古時代的英吉利戲劇是摹倣性的：德萊頓（J. Dryden 1671—1700）和奧特威（T. Otway 1652—1685）的悲劇是高乃依和拉辛作品的改作。十八世紀，在不列顛古典主義悲劇的領域中，也沒有什麼獻出什麼特出的東西，雖然愛狄生（J. Addison 1672—1719）的『卡更士死』比了他的先驅者們的作品要獨立些。比較完美的英吉利古典主義作品是在喜劇的領域裏（威契里 [W. Wycherley 1670—1716] 受了莫里哀『厭厭者』的感應而作的『正人君子』，康格里夫 [W. Congreve 1670—1729] 的『爲愛而愛』 [Love for Love]），十八世紀時則有謝里頓的『造謠學校』 [The School for Scandal]）。

在意大利，古典主義戲劇是用在維護布爾喬亞戲劇的鬥爭工具（高更尼 [G. Goussier] 的喜劇），在兩個世紀交界的時候，則是用作爭取政治自由的鬥爭工具（亞爾菲埃里 [V. Alfieri 1713—1803] 的悲劇）。在經濟上比較落後的德意志，古典主義的作品興起過兩次。不過第一

的明顯的豪傲的嘗試還是反抗巴洛哥和封建主義殘餘的（高特瑟德 J. Gottsched 1701—1766），那時候哥德（Goethe）和席勒（Schiller）那些在藝術上有着高度完成的戲劇是被德意志的研究家們隨便拿出來當作真正的『古典主義作品』去和法蘭西的舊古典主義對抗的。這種戲劇表示，那沒有成熟的德意志布爾喬亞，讓出『狂飈突進』的陣地而向開明的絕對主義的理想投降了。

A 古典主義戲劇在英吉利

假使說，十七世紀的特點是封建主義與商業資本之間的鬥爭，是兩種文化的衝突，假使說，全部創作領域之中，——戲劇也包括在內，——封建君主的意思還佔着優勢，假使說，給宮廷社會的要求和趣味以貢獻的是莎士比亞和羅普·德·魏加那樣的才子，那末，十八世紀時，歐洲到處顯出古典主義的衰落和布爾喬亞趣味在戲劇中獲得明顯的勝利。十八世紀是最偉大的一次布爾喬亞革命的準備的世紀，是以自己的批評和諷刺來撼動和深入那貴族與僧侶的特權階級所依賴的基礎而多方面地建立第三階級的意識形態的哲學家和詩人的世紀。

反抗封建主義宗教觀念的意識鬥爭最早發生於英吉利。伊麗莎白女王死後（一六〇三年），開始了她的承繼者們和國會之間的鬥爭。這鬥爭是以革命和一六四九年查理一世被處死刑作結的。布爾喬亞勝利了，來了清教律主義（Puritanism）統治的時代，劇場都閉了，舊的愉快的英吉利暫時死滅了，直到一六六〇年，王政以查理二世（Charles II）的登基而重又得勝利的時候，劇場的鬥才又大開，復活了享樂的宮廷生活。在節慾主義時期之後，英吉利社會髡髮竭力想補償他們不得已而過的禁慾生活，他們盡情地宴飲逸樂。國王對於戲劇表演也感到很大的興趣。像在法蘭西一樣，戲劇成爲宮廷社會所愛好的娛樂和豪華燦爛的宮廷的表現者，所以英吉利在莎士比亞之後也經歷過一個古典主義的時期宮廷樣式確立的時期。法蘭西古典主義悲劇對於英吉利戲劇是有着很強烈的影響的。莎士比亞雖然還繼續演出，但是他常常被改成法蘭西古典主義的風格。

這個時代的偶像是宮廷詩人德萊頓他在政治上是最無主見的。在王政復古時代，他寫過『聖潔』的頌詩（*Hymn*），他說，像這樣高雅而有教養的時代，有着這樣文爾雅的國王和優美而聰慧的宮廷做模範，已經決計不會驚服於舊時英吉利悲劇作家們的粗野作風了；他說，假使有人想把莎

士比亞和瓊生的時代稱爲英吉利文學的黃金時代，那末祇有這樣說法才是對的；當時的觀衆對於爛賞就很滿足，因爲他們還不知道有穀物。德萊頓是攻擊莎士比亞的。他劇本的每一頁上，他說，都可以找到文法的錯誤或者沒有意義的話，莎士比亞的情節大多是由可笑而毫無聯繫的插曲而成，他有許多劇本是以偶然得難以使人相信的事情做基礎的，有許多劇本文體很低級，它們的喜劇性都引不起我們的哄笑，而它們的嚴肅的部份却倒很引起我們的興趣。德萊頓對於這兩點很憤慨，莎士比亞的劇情常常在一分鐘中要轉移到幾百英里之遠的地方和幾十年之遠的時代去，而且一個劇本中常常結合着三四個劇情。德萊頓是站在法蘭西古典主義的規律——有名的三一律的基礎上的。

查理二世向戲劇要求那種支配着路易十四世宮廷的典雅拘謹的宮廷作風。舞台上出現的應該是神祕，王公和大將，他們應該記得，在他們說話和行動的時候，總是有『皇上』在場的；非但是他們的服裝、假髮、時髦的劍、用鯨骨撐開的女裙和扇子，而且他們的心臟的行動也都要服從掌禮官的監督。

德萊頓是這一類悲劇的演出者。但是英吉利的古典主義悲劇從來沒有達到過法蘭西古典主義悲劇水準的高度。德萊頓很熟悉高乃依，拉辛與布亞洛，但是他的摹倣純粹是表面的。舞台的效果、戰鬥、英雄的奇蹟、崇高的感覺、悅耳的詩、外表的優美，這一切都無法補償他所缺乏而爲高乃依和拉辛戲劇所特有的深刻的思想的内容。

B 古典主義戲劇在德意志

一 初期的德意志戲劇

十七世紀是歐洲戲劇非常興盛的時代，是先以莎士比亞、羅普·德·魏加，後以高乃依、拉辛、莫里哀等人的名字顯著的世紀。但是這一個世紀沒有在德意志戲劇史上留下什麼顯著的痕跡。德意志，大家知道，這時正遭着大難。上半世紀，國家爲那以三十年戰爭（*Thirty Years War*）的名字著稱的混亂局勢弄得筋疲力盡了。這一次大傷元氣的戰爭，摧垮了國內的文化生活，把許多地方化成了荒蕪之區。

訂立了威斯特法倫（*Westphalia*）和約與結束戰爭之後，德意志分裂成幾百個以大大小小的專制君主和全能的王公侯爵爲首的小領地。這些首領在自己國內是有着無限的權力的。他們的宮廷是文化的中心。荒淫而虛榮的君

主們不惜化費金錢來度窮修極奢的生活和供養自己的情婦，爲了這種用途，他們向被壓榨的下層民衆斂取最後的一分錢。在戲劇、文學方面，在一切的藝術方面，繁榮着藝術保護制度。虛榮的君主們把學者和藝術家們看作宮廷的裝飾品。作爲難能可貴的理想的是優美的凡爾賽宮。任何人都想成爲小路易十四，以漢諾威公爵爲例，他說：『我是我自己國內的皇帝。』十七世紀德意志戲劇所處的境况之可憐是不難了解的。

生活沒有供給藝術以嚴正的題材。戲劇所賴以支持的營養品大多是從法蘭西食桌上取來的殘羹。劇目主要是以法蘭西古典主義作家的翻譯劇本或者他們的沒有生氣的摹倣之作所組成的。舞劇 (ballet) 和意大利歌劇 (opera) 常常爲糜費的王公貴族們以極度豪華的形式演出，但是藝術和思想的價值極微。不錯，劇目中有時候也有莎士比亞和西班牙作家的作品，但是，在整個十七世紀時代，提不出一個值得注意的獨特的德意志的劇本。

十八世紀上半葉，德意志戲劇的這一個總的風貌仍舊沒有多大的變化。如貴族宮廷，有幾處地方是結合着大城市的，他們仍舊是那些繼續在貴族觀衆的其他娛樂中佔有一席地位的戲劇的保護者。甚至於十八世紀下半葉，德意志戲劇已經因萊辛格、哥德和席勒的出現而得到了世界性的地位，已經出現了藝術成就很高的國民戲劇，但是在有許多城市中，甚至於像在德萊斯頓 (Dresden) 和慕尼黑 (Munich) 等處，還是繼續盛行着意大利的歌劇和滑稽戲與法蘭西的喜劇。法蘭西的優伶們仍舊很時髦，而當時德意志的戲班子和德意志的戲劇藝術却在窘迫的境遇中。優伶們的地位很低微，甚至於能清苦地維持經常演出的劇場也不多，當時的優伶，大多是從一個宮廷到另一個宮廷地流浪的。

二 萊比錫學派——高特瑟德

嚴格地可以稱爲所謂德意志古典主義時代的是萊比錫 (Leipzig) 學派。

十八世紀下半葉，萊比錫是對於戲劇藝術有着嚴正見解的學園。當時萊比錫受着文學獨裁者高特瑟德 (Gottfried 1700-1766) 的支配。高特瑟德是當時最有教養的人物之一，他是信服和追隨亞里斯多德和法蘭西古典主義作家的。在他支配的時期中，沒有什麼特出的藝術鉅作。在高特瑟德領導之下的戲劇也仍舊是法蘭西古典主義戲劇的反映。同時，從文化的意義方面說，萊比錫學派受患於高特瑟德的專制的成分要多於戲劇與舞台藝術中的任何獨特的現象。雖然如此，該學派在德意志戲劇史上還是起着相當積極的意義。

高特瑟德爲了整頓德意志戲劇而進行過堅決的鬥爭。他反對舞台上的粗野和恣肆的作風而擁護『規律』，他的工作無疑地會做到許多技術上的改善。從法蘭西古典主義作家那裏借用來的亞歷山大詩體，雖然對於德意志優伶們的那種不受拘束的自然演技是非常困難的，但是它却促進了語調和節奏的感覺的發展，它使優伶們遵守吟誦詩句和句讀的要求以及清楚地讀出腳韻等等。造型藝術和舞蹈所起的作用很大。法蘭西式的演技，優美的波浪形的動作，高貴的姿態，情感表現中的莊嚴的動作，均勻的步態，——這一切都帶着人的性質，鬚髯是遵從着一個看不見的舞蹈教師的指示，但是另一方面，它也琢磨着優伶的藝術，促進着表演能力的多方的發展。非但是誦讀法，動作姿勢，而且還有人物在舞台上分佈的地位，服裝，佩着時髦的劍和手拿三角形帽子的主人公，穿着撐開的裙子和手握手絹飾非德兒或者白萊尼克脚色的女主人公（扇子在非常悲慘的情勢中常常顯得很不方便）——這一切都是爲了不脫離法蘭西宮廷禮儀的規範。當然，德意志生活的內容是容納不進學院派的法蘭西悲劇的範圍中去的。貴族保護時代的德意志戲劇並不是有機的現象，而不過是人工的栽植而已，所以是產生不出什麼耐久的萌芽的。

七 古典主義戲劇的劇場技術

在劇場技術方面，古典主義繼續脫離那笨重地散放在廣場上的中世紀神祕劇和流浪戲班子的表演，脫離那由英吉和西班牙公共劇場轉向把表演移入宮廷觀衆廳的設備方面去的過渡形式，而更往前向固定的劇場發展。把全部戲劇形式的遺產容納在劇場建築的屋頂之下的這種基本要素就是應用遠景 (Perspectus)，也就是發明在舞台範圍內的後部和兩側面畫景的方法。舞台上畫景的新形式因此引起了幕帷和人工燈光等等的出現。這發生於十六世紀下半葉和十七世紀初葉時代。這裏也完成了使意大利文藝復興和古典主義時代脫離神祕劇傳統的那一特點。這裏也奠定了那把演出中的繪畫原理和戲劇中的文學的描寫相結合起來的劇場組織的原理。小型劇場是封建領主或者保護藝術的大銀行家們（像佛羅梭薩的梅狄西 (Medici) 等人的所有物。這種劇場是供給它們的主人及其接近而圈子也不大的客人的，他們的座位嚴守着『門第』的高下而按等級排定。這一類劇場漸漸變成按照階級排定座位的劇場，在基礎上這種劇場到我們這一個時代也還保存着，而且到現在才經歷到了重要的變化的過程。

近十年來科學新發展概觀 (六)

李毓鏞

青黴素的發見，完全是出於偶然的。遠在一九二九年，夫列明 (A. L. Fleming) 正在倫敦聖馬利醫院從事於金色葡萄球菌的試驗。有一天偶然有幾碟球菌的培養基被工人遺忘在棚外，以致有青黴的孢子侵入培養基，而在培養基中萌發為菌絲體。夫列明注意這幾碟培養基，發見當菌絲的範圍日漸擴大時，細菌的範圍，就日漸縮小。於是他就把青黴的孢子另外培養在肉湯中，提取青黴的分泌物做試驗。據夫氏研究的結果，青黴的分泌物能阻止格氏陽性細菌的生長，並且對動物沒有毒性。可惜夫列明雖然發見了青黴素，但因為青黴素的提煉很困難，而且青黴素的性質又極其不安定，所以除提煉少量，以供防腐以外，就把牠擱置在一邊，沒有加以重視。到了一九三八年，牛津大學的謙因 (Ernst Boris Chain) 和夫洛賴 (Howard Walter Florey) 兩人，預備對抗菌物質，作一番有系統的研究，而在抗菌物質中，第一種就選定青黴素。他們克服了很多的困難，才提煉出少量純粹的青黴素，後來提煉的方法漸趨完善，美國遂加以大量的製造。

現在的青黴素，都是從天然的物質中提煉出來的。所以要製造青黴素，第一步先得培養青黴。青黴可以培養在釀酒用的深桶或水槽的培養液裏面，或者培養在扁瓶或燒瓶中培養液的表面。培養用的媒質，成分並沒有限定，不過有一點可以注意的，就是為避免葡萄糖轉變為葡萄糖酸，影響培養液的濃度而破壞青黴素起見，碳的來源，最好要用乳糖。又培養液中的細菌也能够破壞青黴素，所以在應用以前，培養液必須放在高壓蒸汽滅菌器中經過嚴密的消毒。孢子的懸浮液，在培養液消毒後滴入。在攝氏二十四度的溫度之下，經過二十四小時，培養液的底部即有細毛狀的青黴發生，約經二三日後，就自此長出白色乾燥的菌絲。普通在第四五日菌體得結成濃厚皺縮的一片。表面乾燥作青綠色，背面黏滑作櫻黃色。這兩種顏色日久就漸漸褪去。培養液的氫游子濃度，隨着青黴的生長而變化。起初原在匹埃去值六至七之間，在乾燥的菌絲發生時，可以降低到匹埃去值三，但從此以後氫游子濃度就又復上昇。當青黴發青的時候，氫游子濃度已達到匹埃去值五。終青黴一生，培

養液中最高的氫游子濃度，大約為匹埃去值七。少有超過八·八的。青黴當發青的時候，開始把青黴素分泌在培養液內。青黴素的濃度，到培養的七至十日，而達到最高峰。提煉的手續，先要把培養液經過過濾，然後用有機溶劑如醋酸戊酯等和磷酸緩衝劑作交替的振搖。在用有機溶劑提煉以前，先用磷酸或其他酸類把氫游子濃度減到匹埃去值二。但青黴素在此種氫游子濃度的媒質中，連室內的溫度都不能忍受，所以這一步手續，必須在低溫下迅速的舉行。用上面這兩種方法交互提煉多次後，就可以把液體導入一種玻璃管，使純度不同的青黴素在此處因為吸着作用而分離。最後把原料放在低溫下來發，就得到乾燥的青黴素。青黴素本是無色無味的粉末，但因精煉的困難，往往帶黃色，所以品質的優劣，還可以由顏色的深淺來斷定。青黴素的成分，是一種含氮的有機酸，分子式或即作 $C_6H_7O_2NS_2R$ 其中的 R，因青黴素的種類不同。青黴素性質不穩定，易溶解於水，並溶解於醚，氯仿乙醇醋酸戊酯等中，很容易為熱、酸、鹼和氧化劑所破壞。和鉀、鈉、鋇、鈣、和銀等化合物而成的鹽，也易溶於水，而不溶於有機的溶劑中。性質很穩定，不過容易潮解而為高溫所破壞。青黴素和磺胺類藥物一樣沒有殺菌或溶菌的作用，只能限制葡萄球菌、鏈球菌、肺炎球菌、腦膜炎球菌、淋病球菌、白喉桿菌、炭疽桿菌、枯草熱桿菌、氣壞疽桿菌、惡性水腫桿菌、梅毒螺旋體等各種病原的生長。其和磺胺類藥物所不同的，第一是藥力比磺胺類藥物強得多，比磺噻唑約高三百倍，比磺吡啶約高五百倍。其次青黴素不妨礙體內正常的生理作用，並且不受膽汁等所影響。青黴素因為易為胃酸所破壞，所以不能口服，又因為排泄的速率很快所以也不宜於靜脈注射，所以最好的方法是由肌肉作連續注射，使其在身體內能够停留較長的時間。除此以外，也可以作錠劑、軟膏，吸入劑等施用。目前重要的生物性的抗菌物質，除青黴素外，還有螺旋菌素。螺旋菌素為一九四〇年魏刻曼所發明，成分為一種醇類，其功效和青黴素略有不同。近年醫學家並想用化學法克制結核麻瘋等病，但迄今還沒有獲得完滿的結果。

殺草的藥品，以前都用石油或氨酸鈉。但是前者是燃料，而後者又是一種火藥的成分。不但殺草的效力都不大，並且在草葉乾燥之後，還有引起火患的危險。最近發明的殺草劑，却是可以促進植物生長的生長素。因為生長素只有在少量施用的時候，方纔能够改進植物的生長，殺或用量過多，就足以使植物組織進行反常的生長，至於全體發生腫瘤，葉部膨漲破裂，使植物因不能營正常的生理作用而枯死。殺草新藥的效用，因為植物的類別而不同。適用於殺滅禾本科植物的有氨基甲酸的衍化物。適用於殺滅闊葉植物的有「二四貳(2,4-D)」。「二四貳」是一種白色的粉末，成分為二氯代苯氧乙(2,4-dichlorophenoxyacetic)酸。商品的名字叫草滅(weedex)或草了(weedone)。「二四貳」雖不溶於水。但可以先溶於溶劑，再把溶液和水造成乳濁液，以供噴霧之用。和「二四貳」相近的還有「奎農茶(TCP)」，成分為三氯代苯氧乙(trichlorophenoxyacetic)酸。「二四五奎(2,4,5-T)」，成分為二四三三氯苯氧乙(2,4,3-trichlorophenoxyacetic)酸。專門殺滅使人發生草粉熱的豕草的，還有奇四一〇(GH10)和奇四一一(GH11)。前者的成分為五氯代苯酚(penta-chloro-phenol)。這是毒性較弱的一種。只能絕滅花粉的生產力，而不能盡除豕草的莖葉。後者的成分為二硝基二次丁基苯酚(dinitro secondary butyl phenol)。却有很强的毒性。豕草經噴射，即至於莖葉及花種枯萎，同時花粉的發散停止。二者都溶於火油，都可用壓力機噴射。同時都能傷害五穀和許多的作物。可說是最大的缺點。

抵抗昆蟲的藥品，起初只有奎寧一種，後來化學家又合成糖奎(pilismoguin)和亞德布令(atehrin)以代替奎寧。最近發明的治瘧藥品，最重要的有兩種。一種叫帕盧德令(paludrine)，係大戰中英皇國寇特(F. H. S. Curd)所發明。成分為對氯苯基丙基縮氨基二脈(N-p-chlorophenyl-N-isopropyl-biguanide)。不但沒有副作用，並且能消滅人血中的惡性瘧蟲，使失去傳染的作用，而打破瘧蟲的生活史。另外一種叫做埃斯埃恩七六一八(SNT718)，此藥原來為德國亞伊奇工廠所發起，成分又四氨基噻林(4-aminogui noline)。後來美國改變其成分為二乙氨基甲基丁氨基噻林(2-ethylchloro-4-(4-diethylamino-1-methyl-butyl)amine quinoiline)發見其有很大的功效，就加以大量的製造，這就是埃斯埃恩七六一八。

提到殺蟲新藥，誰都會想到風行一時，而俗稱「抵敵體」的「貳貳叁」(D.D.T.)。『貳貳叁』本在一八七四年時為瑞士的蔡得勒(Zeidler)所合

成，至一九〇〇年始有人用以代替樟腦丸之用。自從一九四二年，瑞士的穆勒(Muller)首先發見「貳貳叁」的殺蟲性。此物遂引起世人的注意。「貳貳叁」於一九四二年獲諾貝爾獎。當時的實驗，一方面對於日本除蟲菊來源的觀察，一方面因為從事深入的研究，需要大量的殺蟲劑，所以由農藝部把製法加一番改良後，對於大量的製造。「貳貳叁」是兩個分子的氮本和一個分子的氮醯，以硫酸造成的縮合物。成分為二氯代聯苯三氯甲烷(dichloro-diphenyl trichloro ethane)。商品的名字很多，除了我們熟知的「貳貳叁」以外，還有奇阿羅丹(neoard)埃恩可西得(neacid)，奇埃恩比文(GNB-A)埃斯比坎耳惟伊(SBLY)等。「貳貳叁」是一種白色粉末狀的結晶，略帶粘性，微帶有芳香。性質極為穩定，縱使暴露於日光之下或貯藏於極熱處，也都不到變質。但當空氣的溫度較高時，容易凝成小塊，但也並不減低殺蟲的效力。「貳貳叁」熔點在一七〇到一八〇度之間。在常溫之下不揮發，殺蟲的効力能够維持數星期之久。結晶不溶於水，只能溶於大多數尋常的溶劑中。溶解的難易因為溶劑的種類而異，最好的溶劑是火油，汽油和松節油。此外，在溫度高時的溶解度比在溫度低時大些。「貳貳叁」的藥效，為麻痺蟲類的神經系。中毒的昆蟲，肢體動作牽動，繼之發生顫動，最後徐徐麻痺而死。其死的經過，長者要經好幾個小時。「貳貳叁」的製品，分粉劑、油劑和噴霧劑的三大類。粉劑係和黏土、滑石粉及硫黃等混合極細而成。油劑則用二甲苯或火油等溶劑溶解而成。噴霧劑則為油劑在水中造成的乳濁液，或者再加粉質。噴霧劑所用的油有煤油、環己酮、和夫果益等。為增加殺蟲的速率起見，其中常加入糖醇酸二甲酯及醇糖酸二甲酯或除蟲菊等。市上再的空氣膠(aerosol)就屬於這一類。因為藥劑侵入蟲體的第一步成功與否，全看藥品和動物體接觸時的物理狀態而定，所以油劑和乳濁劑的效力比粉劑要大些。「貳貳叁」的殺蟲力量雖高，但以中量而論，既不刺激皮膚，也沒有毒害人畜之虞。不過對鱉、水蚤、魚、蛙等也都有毒性。前次大戰中發明的殺蟲新藥，除美國的「貳貳叁」外，還有英國的加美森(γ-benzenehexachloride)。商品又有六六六(666)之稱。加美森的殺

蟲效力比「貳貳叁」強五倍。但是氣味難聞，而且揮發性較強，所以沒有「貳貳叁」的持久。按帝國化學工業社在二百分區域中試驗的結果，據說可將土中的反跳甲蟲完全殺死。

最近一年以來，新發表的殺蟲新藥，還有不少。其中成分和「貳貳叁」相近的有「貳甲貳叁 (DMPF)」，「貳貳叁 (DEPF)」，「貳貳貳叁 (DPDF)」和「貳貳叁 (TTE)」。前面兩種是用甲基和乙基代替「貳貳叁」中苯核上兩個氮分子而製成的化合物。「貳貳貳叁」則為二氘代二苯三氣甲烷 (difluorodiphenyl-trichloroethane) 的縮寫，為美國布老得洛 (H. L. Broadlow) 根據德國舊有而散在各處的方劑而製成。「肆貳完」是四氣代二苯三氣烷 (tetrachlorodiphenylethane) 的縮寫，為地庫尼歐 (C. C. Deonier) 和瓊斯 (H. A. Jones) 兩人在「貳貳叁」的雜質中發見的化合物。以上這四種新藥效力都比「貳貳叁」強些。成分和「貳貳叁」不同的有「貳貳 (DD)」和「貳貳貳 (DDD)」和「貳貳貳 (Velsicol 1068)」。貳貳的成分為二氣代丙烷二氣代丙烷 (dichloropropane dichloropropylene) 可供殺滅叩頭蟲的幼蟲咬根蟲之用。每英畝用量約需四百磅，於播種前三星期在地下穿孔施用。未耳西醇一〇六八為美國未耳西聯合公司所製造，是一種氮化的碳氫化合物，每一個分子係由一〇個碳原子，六個氮原子和八個氫原子 (C₁₀H₈N₆O₈)。所組成，所以有一〇六八之稱。據寇萊斯 (C. W. Kearns) 等的報告，這種藥物的蒸發力，在加美森和「貳貳叁」之間。噴射在壁上的物質，比加美森持久，而比「貳貳叁」容易蒸發。至於殺蟲的能力，因昆蟲種類不同。如對於瘧蚊的毒性和加美森及「貳貳叁」相同，對於蚜蟲及甲蟲幼蟲的毒性為「貳貳叁」的兩倍。對於家蠅的毒性，有「貳貳叁」的三四倍，對於蟑螂的毒性為「貳貳叁」的四倍對於蚜蟲的毒性為加美森的三至五倍，而為「貳貳叁」的五至十倍。

殺蟲藥雖然能殺蚊，但不能驅蚊，所以要保護人體便不為蚊蟲所螫，另外需要一種驅蚊劑。大戰中通用的驅蚊劑，最強的要推辟瘧酸二甲酯，有效的時間，不過八九十分鐘。後來美國海軍醫學研究所 (Naval Medical Research Institute) 製成埃恩埃爾亞爾伊四四八 (N.M.R.I. 418) 和埃恩埃爾亞爾亞伊四〇七 (N.M.R.I. 107) 兩種驅蚊劑，有效的時間前者平均為二百八十九分鐘，後者達五小時。最近聽說美國如特章 (Rutledge) 大學發明一種驅蚊劑叫做六一二 (G12)，成分的三乙基三醇 (3-ethyl hexanediol-1,2,3)。這是一種無色黏稠的液體，微有金縷梅的氣味，在極度的環境下，不會起變化，並且對人類的皮膚沒有刺激性。有效的時間，竟達到二十小時之久。

殺鼠的藥品，以前美國都用紅海葱 (red squill)。但到前一次大戰的

爆發，使紅海葱的來源斷絕後，因為其藥劑的缺乏或富於危險性，所以該國的科學發展局 (OSRD) 積極鼓勵設法新藥的發明。大戰中曾經試驗成功的毒藥，共有安塔 (ant) 和安塔 (ant) 兩種。安塔係約翰霍布希斯 (John H. Schuch) 所發明。在前一次大戰之前，里夫脫曾在實驗室中研究各種味覺和食物選擇的關係。其中有一部分的研究，是要用鼠類做試驗的。試驗藥品中的苯硫脲 (phenyl thioea)，本是一種有名的苦味劑，但曾長時間的在人類中試驗，絲毫沒有毒性。不料某一天里夫脫將此物放在老鼠的舌上，第二天這些鼠都死了。後來里夫脫在多數同類的化合物中，選出一種最有效的藥品，這就是安塔。安塔原名為亞耳發硫脲，(alpha-naphthyl-thioea) 是一種灰色的粉末，無臭無味，幾乎不溶於水。普通係用亞耳發硫脲和硫酸銨化合物而產生。安塔對於兔和小雞無毒性。但對鼠類的毒性為硫酸銨的二倍，或三氧化砷的一倍以上。其功用為使鼠類因肺部發生水腫而死。安塔可以散在水面、水果、根莖等表面，或混在麵粉和六穀粉中，使鼠類中毒。只是怕此物略有苦味，容易為鼠類覺察罷了。安塔對於人畜也有毒性，且其解毒藥還沒有發見。但此物不溶於水，所以只須把胃中的毒物洗出就可以沒有危險。

南非洲的土人，在很早以前，就知道當地有一種大戟科植物，俗名叫做毒起泡 (xiblaar, *Tithipitulum cium xum*) 的。是一種有效的毒鼠藥。據南非科學家馬賴斯 (J. C. S. Marais) 的調查，毒起泡所以能夠毒鼠，全在於其組織中含有氫硫酸的緣故。所以他提議製造同樣或類似的化合物以供殺鼠的應用。美國密爾頓魚及野外動物研究所的客耳姆巴刻 (P. R. Kaimbach) 首先並沒有知道馬氏的研究，却在二千零八十種的藥品中獨自試驗出一種毒鼠藥。成分含氫硫酸鈉，簡稱曾一〇八〇。一〇八〇有很強的毒性，只須五毫克的成分，就可以殺死體重一任克的鼠。一隻體重僅及半磅的老鼠，只須吞服針頭大小的物質，不須萬分之二英兩，就可以在二十分鐘中斃命。一〇八〇最大的優點是易於溶水，這不但便特別的氣味，容易因稀釋而至於不可被鼠類所覺察，並且在老鼠為患的區域，只須在一加倫水中加三分之一英兩的一〇八〇，就可以除盡一切的鼠類。一〇八〇因為有極大的溶解力，所以對人類少有危險性，一個人服下六英兩的藥品方才引起中毒，假使誤服少量，能隨時排出出來，不像許多毒藥那樣的積聚於體內。一〇八〇的

第一卷第四期目錄

時事評論	論昆明李聞被刺事件	鶴泉
	寫在巴黎和平會議之前	海明
	菲律賓獨立之透視	康君
戰後一年	印度問題之真相	陳人白
	*『密勒氏評論報』一封讀者的信(M.A.·李)	劉少嚴
	意大利之現狀	康君譯
	道家與小農	嵇文甫
	答蔡尙思評我的老子看法	李季
	再評李季的老莊封建說(中國虛無主義史略)	蔡尙思
	社會形式發展史中婦女地位之變遷	碧雲
	敘述第一國際成立經過的一個文獻	唐虞世譯
	論古典主義戲劇	冰夷編譯
	小甲長的舊夢(小說)	謝少翁
	近十年來科學新發展概觀(四)	李毓鏞
	印度二月暴動之回憶(特約通訊)	李文陽
	崇明之行(地方通訊)	唐德
	讀者意見	程元宇等
	編者答覆	編者

並且不像目下許多殺鼠藥品一樣的能由皮膚而侵入體內，所以我們可以自由動手操作。一〇八〇的缺點在除對魚類無毒外，對人類和豬狗家畜也有毒，所以只能供給碼頭、倉庫、衣店等處專門管殺鼠的人員去使用，而不能普遍的發售。

材料來源：

(22) Taliaferro, W. H., *Medicine and the War*,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44.

(23) New York Academy of Medicine, *The March of Medicine*, Columbia University, 1945.

(24) Gray, G. W., *The Advancing Front of Medicine*, (white), essay House, 1941.

第一卷第五期目錄

時事評論	從『周報』被迫停刊說起	海明
	尼赫魯上台與印回衝突	康君
	巴黎和平會議之檢討	海明
論評	論當前經濟危機的嚴重性及其解救之道	陳人白
	論利息的支付所及於物價的影響	郭大力
	日本屈服後的局勢及其前途	劉少嚴
	*日本無產階級之弱點及其出路	張大軍
	與唐虞世先生論維新運動	李季
	爲『古史辨的解毒劑的解毒劑』進一解	歐伯
	再答李季先生論老孔思想	盧森堡著·子規譯
	第一次世界大戰與社會民主黨	盧森堡著·子規譯
	*盧森堡的人生觀	盧森堡著·子規譯
	法蘭西大革命及其歷史的研究	唐虞世
	論古典主義戲劇【中】	冰夷編譯
	近十年來科學新發展概觀(五)	李毓鏞
	教育的愛(小說)	謝少翁

(25) Galdston, I., *Behind the Sulfa Drugs*, Appleton Century, 1943.

(26) Harris, G. C. M., *Antagonism in Micro-organisms*, *School Science Review*, XXVIII: 101, pp.87-100, 1945.

(27) United States Office of War Information, *Penicillin*, 1944.

(28) Science Service, *Science News Letter*, XLVIII, XLIX, 1945-1946.

作者附誌

此文以後尚有「合金」、「農業」、「醫學」、「工程」、「航空事業」等多篇。因牽涉範圍較廣，搜集材料，頗費時日，故自下期起暫停刊載，待材料搜集就緒，再陸續在本誌刊出，伏祈讀者鑒諒。

投稿簡章

- 一、本誌宗旨在發揚自由研究學術之精神，故採取絕對公開態度——凡關於各種學術思想：如哲學，社會科學，自然科學文藝理論等，以及中國歷史發展法則，中國社會經濟性質，農業經濟，土地問題，各國社會政治經濟史及其現狀之研究並文藝作品等均所歡迎。
- 二、賜稿請以一萬字為限。如有必要須超過此限度者，請先向本社接洽。
- 三、賜稿務必繕寫清楚，並加新式標點。譯稿請附原文或指明出處。
- 四、稿費概用現金。從優奉酬。
- 五、凡稿件本社在必要時，有權修改。如不欲修改者，請在稿末註明。
- 六、來稿經本社揭載後，版權即為本社所有。作者如欲保留版權，請預先聲明。但本社將來出版彙刊時，仍得採入。
- 七、稿末務請註明最近通訊處。
- 八、來稿請寄上海南京路六六號本誌編輯部。

本誌外埠經銷處

南京	各	大	書	局	桐城內
安徽	各	大	書	局	仁和路一二七號
蘇州	各	大	書	局	琉璃廠一五五號
杭州	各	大	書	局	王府井
北平	各	大	書	局	舊法租界濱江道
天津	各	大	書	局	江漢一路三號
漢口	各	大	書	局	陸家山路（六眼井段）
南昌	各	大	書	局	伯陵路一〇二號
長沙	各	大	書	局	太平路二二八號
廣州	各	大	書	局	武成路四四六、七號
潮州	各	大	書	局	
香港	各	大	書	局	
昆明	各	大	書	局	
重慶	各	大	書	局	
成都	各	大	書	局	
寧波	各	大	書	局	廣西南甯城內

求真雜誌 第一卷 第六期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十月一日出版
每月一冊 全年十二冊 每月一日出版

本期定價式千元

編輯者

求真雜誌編輯委員會

發行者

上海南京路六六號 求真雜誌社

印刷者

上海中正中路六四九號 中國科學圖書公司

總經售處

上海山東路二二二號 五洲書報社

本埠

各大書店報攤均售

▲不許轉載▼

廣告價目表

等級	地位	全	面半	面四分之一
超等	封底之外面	十七萬元	九萬元	
特等	封面之裏及正文首篇之前	十四萬元	七萬元	
普通	正文之後(插頁)	十萬元	六萬元	三萬元

- 一 廣告費請先惠付
- 二 廣告概用白紙黑字如用彩印價目另議
- 三 連登多期價目從廉

利 通 行

LEE TONG & COMPANY

專營手工業製成品出口

代理英美各廠產品入口

== MANUFACTURERS & EXPORTERS OF CHINESE THINGS ==

行址：上海漢口路四五五弄卅七號
HOUSE 27, 455 HANKOW ROAD, SHANGHAI.

電報掛號 三 LEETONGCO. 三 電話 九六五四六
CABLE ADDRESS 三 SHANGHAI 三 PHONE 96546

行 輸 運 富 華

HWA FOO TRANSPORTATION CO.

電

話：

九 九
七 六
七 五
二 四
二 二

專
運

工 廠 鍋 爐
方 棚 引 擎
重 大 機 器

承
接

代 客 報 關
水 陸 運 輸
起 卸 工 程

事務所：漢口路四五五弄五號